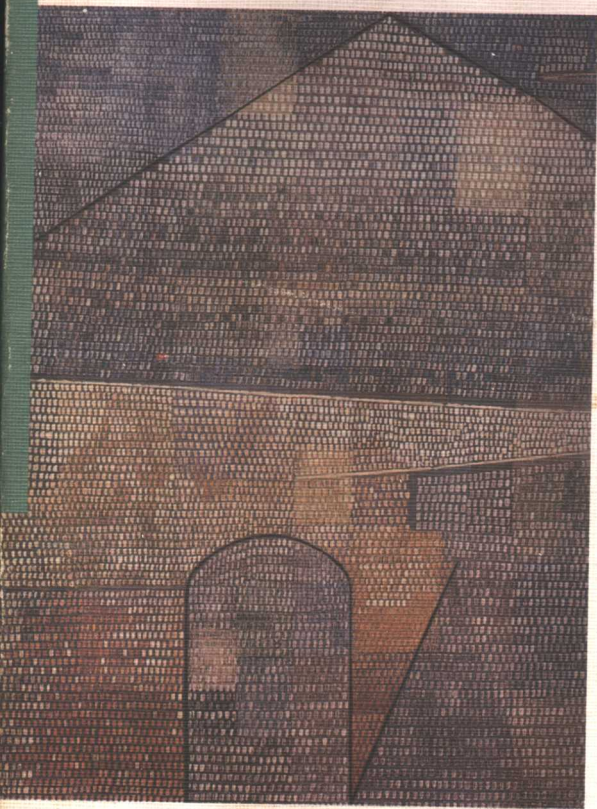


李书磊 著

泰山·仙人掌丛书

我观世音

泰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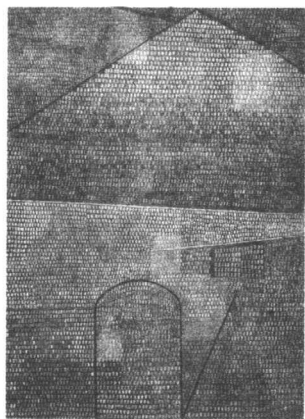
I267.5

4

李书磊 著

泰山·仙人掌丛书

我观世音



泰

山

出

版

社

泰山·仙人掌丛书

我观世音

著者/李书磊

出版/泰山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127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格/850×1168mm 32K

印张/8.625

字数/179 千

版次/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80634—098—X/Z·21

定价/13.50 元

泰山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直接与印刷厂调换

自序

这里收集的是我 90 年代的一部份日记与书信，日期是原有的，标题是后加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乃出于一个文人为写而写的莫名的习惯；书信是旅行时写给我的妻子杜玲玲的，以报告见闻、减解旅愁。这次将它们以文章的形式出版，主要是因为它们并不像文章，保留了较多真实而真切的东西，有阅世之趣的人或可读而会心，将来有治史之志的人亦或可从中发现一鳞半爪的有别于正史的社会材料。出版此书同时也是对我近十年来人生经历的一次清点。90 年代以

来,我一直摆脱不了一种时过境迁的隔世感,我想通过编订此书将其掸而去之。我们突然间进入一个陌生而又不定的世界与时代,也就陷入了迷惘与惶惑之中。时到如今我想该是我们消除异己之心,将此时此世视若命运、据为己有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在流放和流浪的心境中度过一生。说到陌生,或许每一代人对自己的时世都是陌生的,或许人生本来就是佛家所说的他乡;既是如此,那就让我们对陌生的一切安之若素吧,让我们对陌生的一切生出一种斤斤计较、不依不饶的亲近之心吧。人世漂至何处,何处即是家园,且让我们定心宁神地锄荒理秽,肩负起垦植之责吧。而且洪水当前,严峻的生存考验就迫在眉睫,惶惑已是奢侈,徘徊即为逃避。

将此书取名为“我观世音”,并非是僭称菩萨闻声救苦的慈悲,并非是想砸菩萨的饭碗,而是我太喜爱“观世音”这词的本义中所包含的谛听世音、谛听万家忧乐与万象消长的无限情怀了。这是诗人并史家之心,是文者兼武者之志,有情而无情。我的祖国与民族仍在经历着痛苦的再造,而人类历史本质上乃是一次神秘而诡异的行旅,叩寻出路、衡量意义、修正人生正是人永远的使命。所以,必观世音。

最后向促成此书出版的曹文轩、于景明、葛玉莹先生致谢。

1998年8月23日于大有庄

目 录

自 序 (1)

日常阅历

1993年11月14日:偶读魏野
..... (1)

1993年12月6日:采访知青 (4)

1996年4月16日:书后闲评 (8)

1996年6月22日:朋友会面 (13)

1996年8月1日:晨光 (17)

1997年1月28日:写史心得 (19)

1998年1月26日:一种主义 (24)

1998年1月28日:隔膜 (27)

1998年2月3日:昨日运动 (30)

1998 年 2 月 7 日:路见	(41)
1998 年 4 月 30 日:闲读	(44)
1998 年 5 月 3 日:张曼菱	(45)
1998 年 5 月 4 日:校庆	(48)
1998 年 5 月 7 日:会议	(50)
1998 年 5 月 9 日:杂志	(53)
1998 年 5 月 11 日:柯克海默与周 熙明	(55)
1998 年 5 月 19 日:斥李希光	(57)
1998 年 5 月 21 日:闲记	(61)
1998 年 5 月 26 日:雕刻时光	(63)
1998 年 6 月 10 日:书目与人言	(65)

1998 年 6 月 11 日:书目(上)	(70)
1998 年 6 月 12 日:书目(下)	(73)
1998 年 6 月 15 日:览书忆旧	(76)
1998 年 7 月 10 日:人作为困兽	(79)

再入日本

1997 年 11 月 18 日:伊势物语	(82)
1997 年 11 月 19 日:东京入境	(86)
1997 年 11 月 20 日:古本大学	(90)

- 1997年11月22日:江户 (95)
- 1997年11月25日:神保町 (100)
- 1997年11月26日:墨田 (105)
- 1997年12月1日:合宿 (108)
- 1997年12月2日:带广 (111)
- 1997年12月4日:日本民生
..... (114)
- 1997年12月7日:芽室町 (120)
- 1997年12月9日:温泉与和服
..... (124)
- 1997年12月10日:襟裳岬 (129)

也走运河

- 1997年8月14日:通县 (134)

1997年8月15日:张家湾	(142)
1997年8月16日:杨村	(150)
1997年8月17日:杨村——三汉口 ——杨柳青	(159)
1997年8月19日:静海	(167)
1997年8月20日:杨柳青·青县· 沧州	(176)

北上南下

1996年6月14日:大同石窟	(183)
1996年6月15日:书记与厂长	(185)

1996年6月19日:鸡鸣山 (190)

1996年9月21日:上海重游
..... (194)

1996年9月23日:衣着与故人
..... (199)

6

.

山水人民

1993年8月10日:河边生意
..... (204)

1994年4月30日:浮生半日
..... (224)

1995年8月23日:秦皇岛 …… (230)

回乡琐记

1990年1月23日:回乡 …… (232)

1990年1月24日:敝乡风(上)

…………… (237)

1990年1月26日:敝乡风(中)

…………… (247)

1990年1月29日:敝乡风(下)

…………… (258)

日常阅历

1993年11月14日：偶读魏野

买得全宋诗编委会内部印刷的《全宋诗样稿》，中有魏野卷。魏野多有佳句而少有名篇，是有才情而无境界。然其佳句、其才情多有可喜之处，使我平添了几分对中国古人的尊重。魏野不是大诗人、不是名诗人，竟也有这么多动人的、使人喜悦的丽句，可见古代之有人、有言，实远胜于我等的估计。这提醒我应该一字一句地细读古人的诗句，尤其是对无名诗人、无名作品。对于古代，读大诗人的名篇只不过是欣赏，而兼读小诗人的作品才真正称得上了解。细观古人情感的痕迹，必多有可观处。

“茅堂自歌咏，何必向丹墀”（第1页），“空看新雁字，不得故人书”（第2页）等，作为古语可以征引。是平常句子，在古诗语境中很平常。但在现代语境中却显得很有味，古色古香。

“郡阁烟光里，人家霁色中”（第2页）使人想起张爱玲的

一篇散文《论写作》，说申曲里有套语曰：“东华朝门武官走，西华朝门文官行；武官骑马安天下，文官持笔定乾坤。”张爱玲说这唱词“思之使人泪落”。这里面确实有一种感人的东西。是一个民族（我们民族）兢兢业业、惨淡经营以求生的艰难与努力感动了我们，是一个百姓（我们自己）祈求天下清平的痛苦而渺小的希望感动了我们。所以张爱玲说“思之使人泪落”。魏野的这两句诗所描绘的这种如此和谐、如此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的图景也使我有所感。

“门冷僧长住，官清道更孤”（第2页）出语冷而隽，似愤似叹。

“养拙住山村”（第3页）中“养拙”比“养晦”使人喜悦。“养拙”有一种天性的质朴与无为，是无机之语，无可防可畏之处；“养晦”却深藏机心，是想作暂时退却以求东山再起之志，有战略意味，隐含一种不言的杀机。

2
“临事知闲贵，澄心觉道尊”（第3页），乃真经过人的话，乃真有风格的话。“山鸡形状鹤精神”（第30页），本来是吟鹤，很严肃庄重的，但不知怎么总给人一种滑稽感，使人想起成语“沐猴而冠”。此成语用意恶毒，无甚情趣；而“山鸡形状鹤精神”可持以赠人，是一种抑中之褒。

“琴怜徵外声弥澹，酒爱筇中味更醇”（第3页），古人观察、感受与表达的无微不至使我们惊异，使我们对他们的感知真切起来。

魏野还多写呈官府的诗，远没有自咏诗可读。盖因呈诗往往多用心计而少用感情，没有写诗本应拥有的自由感。魏氏呈诗多夸赞官僚的质朴与平易，这大概是他最推崇的官德了。“语稀如学浅，仆少似官卑”（第14页）是写给“望高虚两制，权重带三司”的朱学士的。另有呈赠陈知县：“少作长安

幸，寻常似隐夫；琴书家惯有，杖印客疑无”（第21页）。赠陈使君：“忧民如有病，见客似无官”（第22页）。不一定他呈赠的官都有这种美德，无奈他这应酬诗已成了一种套路，有枣无枣三竿子。呈官是虚应故事，应酬归来面对真实的自我却又认真起来。《和臧奎秋夜书怀》一诗写道：“林中独坐欲中霄，落叶纷纷触坏袍。月影渐移恐韵急，华露初上鹤声高。四时催老秋偏感，万事萦心夜更劳”（第5页—第6页）。应酬是相互应酬，伤心是独自伤心。由伤心而觉出了诗人不得已应酬之可悯，由应酬印证了诗人伤心之缘由。

除了伤心与伤怀，魏野还有言志诗。所言是隐者之志，对村居生活颇为自得（参见第3页“成家书满屋，添口鹤生孙”句）。这是他为自己的生活找到的寄托。由此我发现了他这位隐士（或许还是许多隐士）基本的人生状态：应酬官僚以求身安，夸耀隐逸以求心安。得同时对付社会和对付自己。

“小雪飘嵩岳，微冰结汴河”（第12页）。中国地名出现在诗句中使我有动于衷。那么大的嵩山却飘着小雪，那汴河上也才结起微冰：这具体而细微的描绘显得是十分地真切。这诗句唤起人对中国土地的无限感情。

我喜爱的诗句还有：“闲闻啄木鸟，疑是打门僧。松色浓经雪，溪声涩带冰”（第7页）。“叟喜栽花活，童夸斗草赢”（第11页）。“洛水垂廉听，嵩峰凭几看”（第22页）。

我比较喜欢的诗篇是《登原州城呈张贲从事》：“异乡何处最牵愁，独上边城城上楼。日暮北来唯有雁，地寒西去更无州。数声塞角高还咽，一派泾河冻不流。君作贫官我为名，此中离恨共难收。”（第24页）惟结尾显得苍白单薄，不见境界，使这诗成为精神上的残篇。

1993年12月6日：采访知青

4 .

近日随北京电视台采访回城知青。星期天采访几家知青饭馆。位于西苑的是“老插酒家”，“老插套餐”1元5角，是一个小黄面窝头，一碗咸菜和一碗玉米粥，吃起来非常妥贴。老板黄兴的巨幅油画肖像是头部特写，竖在饭馆正堂。“老三届食乐城”在市里，老板是下放到山西运城的插队知青。厅堂有浩然的题字。问为什么是浩然，说是“我们这一代都是读浩然的小说长大的”。说有的知青在这里喝着喝着就哭了起来，老板就出来陪着聊天。和平里有“黑土地酒家”，虽也有很多插队时代的饰物却显得不太地道，服务员也较冷漠，盖因这里的老板是一个白白胖胖的青年人，不是插队知青，他不过是把知青当成了生意眼，缺少那种亲切感和质朴感。老三届食乐城的经理助理也是老三届。“我也流过汗，也流过血，也流过泪。当然现在谈恋爱也流泪，但同我们不一样。流过汗，流过血，

可现在统统都不算了。他妈的不算了就不算了吧”。他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工作,收入很低。

和我们一同采访的是法国女人胡克丽,北京大学的外教。她对知青有兴趣。胡克丽恨基督教。我遗憾中国人没有宗教,她不以为然:“你们虽然没有宗教,但你们有歌呀。边走边唱。没有哪个民族像你们这样爱唱歌。”“你知道我在中国最想做什么人?我只想做一个人,就是江青。”“你们也认为外国人长相都一样,这是没有知识的表现。外国人也觉得中国人长得都一样。”“我常常和电视对话,电视说‘你好’,我也说‘你好’。电视说‘再见’,我也说‘再见,明天见’。我很寂寞。”“有时候中文翻译外国的东西很好玩。有一次我看电视看一部美国片的中文版,‘Kiss my ass’翻成‘亲我的屁股’。其实这是一句很厉害的骂人的话,意思是‘滚你妈的蛋’,‘亲我的屁股’意思是‘我才不让你亲我的屁股呢’。我骂人时有时就说‘亲我的屁股!’”“你也相信缘?我很信。我同中国就有缘。我小时候家里就叫我‘中国孩子’,为什么叫我‘中国孩子’我也不知道,后来问家里人,他们也没人知道。当时我就想 35 岁时我一定要学会说中国话,那时我 3 岁,认为 35 岁已经是很老很老的了。我没到 35 岁中国话就学得很好了。班上的同学甚至都认为我一半是中国血统。”胡可丽的加入使采访知青变成了国际行动。

今天中午去十里河采访一户回城知青的家。他们是运城地区回来的。男主人个头不高,带着我们颠颠地走。这次采访的计划是在知青中选一些混得好的,也选一些混得惨的;因为他是选定的“混得惨”的代表,我们背后叫他“苦主”。苦主家有两个孩子,住一间租来的平房。苦主有很多话要同我们

说。他说：“我去年底才办回来。回来时我提了两桶陈醋回来，在北京站出站时被检票员叫住。我懵了：‘我有票哇，我犯什么错误了？’检票员说：‘你说你犯什么错误了？’我还是不知道。检票员说：‘告诉你吧，超重。罚款。’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我在黄河边上转了一圈，一圈转了20多年，我把多少东西都丢在那里了哇，现在我就带回来两桶醋还算是超重。要说这醋，对我还真是很有意义。一个这是山西特产，带回来送人也好看；再一个醋也救过我的命。我刚到乡下的时候第一夜烧煤炉就弄成了煤气中毒，是老乡用醋把我救醒过来的。”“还有留在那里的。就留在村子里种地。有一次我在路上就碰上这么一位，他说他不回来了。种地挺好，就这么着了。回来，两个孩子也养不起。”“有一个知青1974年跳河死了。他有病，治不好，怕连累他媳妇儿子，就自己跳河了。他媳妇是当地人，也从此就没有再嫁，说要把北京人留下的孩子抚养大。”

苦主的妻子已经显得苍老，同她1980年穿着婚纱的照片判若两人。一说她就流泪了。“我现在没工作，倒是想吃苦哇，我不怕吃苦，你给我个吃苦挣钱的地方呀。这辈子算是完了。”“现在谁能挣钱？是年轻的，思想开放的女子。我们第一是思想不开放，就是思想开放也晚了，老了。”“现在的小青年也看不惯我们，说你们这辈子扔那儿不就算了，还回来添什么乱呀。大部分人很同情我们。坐火车，孩子买不起票，查票的一听说是知青，就不说什么了，走了。”

正在交谈，房东女人，一个40多岁的胖女人推门而入。“你们看我是不是有点癩？”她说着就在屋里走了几趟，仔细一看，果然是癩。“你们知道是怎么癩的？让医院给治癩的。”说

着她就控诉医院做手术时怎样把消毒管留在了体内，怎样动了3次手术才取出来。“有人告诉我应该告他们，也有人对我说算了，老百姓告医院告不赢的。”这人神道却善良，她给这家知青定的房租是最低的房租。这是我们常见的人民中的一员。

1996年4月16日:书后闲评

8

1.《中国当代名人随笔·汪曾祺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好文章必得有学问、有思想,但有学问和思想的人未必能把文章写好,要写好文章还得有才情。汪曾祺的文章好是大家公认的。我最佩服的是他对名物,尤其是对于草木丰富而详尽的知识。读他写西南联大的一组文章,看他对昆明四季植物细致入微地娓娓道来,很是羡慕。我自己比较孤陋枯燥,但对这样渊博的通儒却心存崇尚。在昆明吃过一种菌,我凭音记作“牛干菌”,这次读汪曾祺的文章才知是“牛肝菌”,恍然悟出“牛干”之不通。这次阅读还知道了昆明叫得很响的缅桂花原来就是白兰。汪曾祺还写到昆明的杨梅:“昆明的杨梅很

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火炭梅’。”“火炭梅”这个名字简直太好了,好得让人垂涎。汪氏写草木当然不是博物学家式的炫耀,在他笔下这异乡的草木同遥远的岁月、同逝去的青春和生命连在一起,微微的伤怀之中表现出了一个心灵的活泼与充实。生命如果可以这样经历、回忆和记述,那生命就真是值得经历、回忆和记述的。我建议大学各科尤其是中文系应兼修植物学;倒不是附议“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古训,而是说这样可以使人心有所容、情有所寄,使人脱去汲汲与戚戚之厄。

2.《清代文字狱案》

张书才、杜景华主编,紫禁城出版社

这本书展示了清王朝对知识分子、对文化所犯下的罪行,每每令人发指。在“康乾盛世”中,文人一罹文网,即以大逆律论,被凌迟处死,家族中16岁以上男丁皆斩,不满16岁的男丁及女人发与戍边军官为奴。而所谓的“大逆文案”,固然有些是真正的反清者,但为数很少,多数都是清朝的顺民,写诗作文糊里糊涂地就犯了皇上的忌讳,因为谁也不知道这忌讳到底是什么。更有一些文字狱的苦主干脆就是因颂圣得咎,把皇上不当外人,跟皇上掏心掏肺,结果反使龙颜大怒,即是鲁迅所说的“隔膜”。我想古人说“伴君如伴虎”的意思不仅是说虎性凶暴,而且还指虎性难知,你不知他什么时候就发了脾气;如果仅仅是凶暴的话,“伴君”对那些决心事君的臣工(也即奴才)来说是不难的。

最使人难以接受的是,不少文字狱犯压根就是精神病,疯癫之中写下些白字连篇、粗俚不堪、谁也不知所云的呆话,结

果也都以逆罪杖毙于市曹(还算开恩)。皇上知道他们是疯子,但也并不放过他们。没有比这种行径更显示清皇室的空虚、无聊与暴虐的了,这罪状说到天边都不得开脱。

我一直推断,清末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必欲打倒清帝而后快、坚决革命而不改良,大概是同文字狱有关的:这样罪过的王朝真是可杀不可留。章太炎以疯狂的热情(被称为“章疯子”)搅坏了清朝的江山,他就是看了纪录文字狱的《东华录》冲冠而怒的。在章太炎、邹容等的呐喊中,康有为孤单的保皇舆论遂成梦呓。现在有论者认为改良比革命妥当,殊不知当时当地再妥当的理性都敌不过人们“与汝偕亡”的恶毒的决心。历史往往是由情绪和道义感而不是冷静的算计推动的,治史者不可不察。而且,文字狱作为康乾朝维护统治的举措竟成为清朝后来覆灭的种子,亦见出了残酷而有致的“历史的诡计”。

3.《朱子语类》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

对朱熹的人品学问或有微词,如《二刻拍案惊奇》中就说他心胸狭窄,同一个歌女治气,必欲把一个弱女子置于死地;清儒也挑出他的许多硬伤。就在《朱子语类》中也有一些荒诞不经的话,如认为冰雹是蜥蜴所吐,并言之凿凿。虽然如此,你仍可以看出朱熹是一个爱学问如生命的真学问家。《宋史》中说他潜心学问而不愿做官,说他在政治迫害下仍从容讲学,证诸《语类》方知不是溢美。《语类》中对经典中的一句话、一个提法都会反复地切磋琢磨,理解到入微的程度,并有的放矢地纠正门人的许多误见,是一个多么学识渊博而又诲人不倦

的老师啊。而在我们今天的苏式学制下,这种老师已经很少见了。中学里从主题思想讲到段落大意的教师自不待言,大学里教授按学期讲授的大课也终难脱囫囵吞枣、言不及义之讥,难收细雨润物之效,只不过雨过地皮湿而已。这样的学制不能满足我们的求知问学之心,反而养成了我们读书为文的许多恶习。相形之下,古典的书院是我向往的地方。朱熹的一首诗写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而这样的学问风尚大概也只有书院才有,也只有书院才会孕育《朱子语类》这样的书。

4.《美国的诗歌与散文》

(*American Poetry and Prose*)

[美]诺·曼·弗斯特(N. Foerster)编

荷顿·米福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mpany)第四版

这是一部美国文学总集,“散文”的意思在这里是“非韵文”,包括小说、戏剧,不单指抒情散文之类。这部书编选得好不好我不知道,我不是研究美国文学的,没有比较过;我只是很喜欢其中的很多作品而已——但这却并不是我推荐这部书的原因。我推荐这部书乃是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一本书很流行,叫做《美国读本——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黛安娜·拉维奇编,三联书店1995年)。《美国读本》选择的是美国历史上最动人、最光采的文章,确实都是很有价值的文献,但这本书展示的只是美国的一个侧面: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纯洁和美丽的一面,里面收的文字往往带有表演性(有不少干脆就是讲演),用它进行正面的思想教育倒是一本好教材,然而却不足以称为表现美国真实历史与生活的“美国读本”。假若我编

一本书,从《论语》起,选入的都是陶渊明的田园诗、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之类,直到当代的《东方红》,你能说这些不是“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但要作为供了解中国之用的读物,取名为《中国读本》,则“吾不敢也”。我知道在《二十四史》、《水浒传》、《红楼梦》中还有许多另外的事实和故事。

所以我要推荐这部《美国的诗歌与散文》,因为这部书不是为了宣传目的而是为了文学目的而编的,能使我们更亲切也更真实地了解美国和人类。我觉得这部书倒是差不多可称作《美国读本》,但愿有心人能把它翻译出来。

1996年6月22日：朋友会面

上午 11:00 左右,电话铃响,是韩毓海,说《中国青年》杂志的杨晓声在他家里,“是我们现在动身到你家去呢,还是你到我家来?”听口气,这一面是非见不可了,我提议,干脆我们都去海淀的麦当劳。自度囊中,已近月底,也只有麦当劳堪吃了。12:00 我来到海淀麦当劳,见里面人声鼎沸,坐无虚席,柜台前也挤了好几层的人。韩、杨二人夹在人缝中东张西望,一是找我,一是找座儿。座位终于没有找到,韩毓海感慨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真是太成功了。无奈之中我们来到斜对面的鸿宾楼,一个小姐在门口发湿毛巾,杨晓声先走进去,没有领毛巾,又被小姐喝回。引领小姐把我们引到一张空桌前,韩毓海不肯坐,说没铺桌布,小姐说马上铺来。韩毓海又说桌上有饭粒,小姐乐了,说观察还挺仔细。我介绍说韩毓海是个作家,爱好观察。提起作家,韩毓海前不久还作了一篇长文叫

《北大：魂兮归来》，就登在杨晓声的杂志上。文中暴露了北大的学术黑幕，激怒正在换届的北大党政班子。有关人士纷纷猜测此文有什么背景。最后发现是韩某所作，大家的愤怒更大了，原来是一个不关政治的局外人把一群政治老手运动了半天，这真是哪儿跟哪儿呀。有关方面下令各报刊不许转载，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亲自出马解决。《中国青年》杂志主持工作的副总编本来已决定扶正，此事一出只好延后了。韩毓海、杨晓声（是该文的责编）二人把事情闹了个鸡飞狗跳，他们俩现在反倒在这里平静而愉快地喝酒，一脸无辜，真是多情反被无情恼。使我想起阿 Q 刚调戏完吴妈，又赶过去看热闹。韩老弟将文章以“郑煜允”的笔名发表。郑煜，字允荣，是个古代《茶经》的校者，毓海将其名字相拚取为己用，真亏他想得起来。用笔名写作给韩毓海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使他可以把平时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尽情的烩于一勺，了无顾忌。他对国情知之不深，不知道在中国不可能真正埋名。果然不多久就被验明正身，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不过韩毓海好像对此并不在乎。此人太不懂也不讲政治了，反倒使那些太懂政治的人对他的忌恨、算计和担忧无处着落。此一段情节也堪浮一白。

韩毓海刚从日本回来。说日本议员正在选举。“在电视上看到你的熟人海江田万里议员啦，一家公司请许多名人品尝一种食品，海江田也在被请之列。他在镜头下吃得很香，还不时地夸赞‘哟希哟希’”。日本的政客也真是不易。说还有一个日本议员参与《大地之子》讨论，认为那个日本孩子在战时的中国能够活下来不是因为中国人善良，而是因为日本孩子生存能力强，“如果他没有足够的生存能力，那么，让他去死吧！”这话遭到了舆论的谴责，该议员又在电视上向公众悔过。

我倒觉得这议员的话才是日本公众的心里话，谴责与悔过云云不过是对于当代文明不得已的让步而已。

下午 2:00 时，我来到二十一世纪饭店参加刘海扬的“开卷有益”节目。这节目原设在北京有线台，叫“读书现场”，现转移于卫视凤凰台，改成现名。“开卷有益”俗则俗点，但比“读书现场”好些。“作案现场”“事故现场”说起来都顺口，“读书现场”却不伦不类。我来到饭店大堂，却不见如约而来举着牌子迎接的人。又等了一会，转了一圈仍然不见，我觉得有点不对了。遂打电话回家，请玲玲查看昨天刘海扬来话的记录，一查才发现约的是今天下午 4:00 而不是 2:00 点。一般下午有活动都是 2:00，难怪我记错。为了打发这两个小时，我想找一家书店逛逛。找了半天，这附近只有饭店和商店，竟无一家书店。踱进 1 里之遥的燕莎商城，在 4 楼倒是有一处卖书的，卖的却是英文的 bestsellers，50 元 1 册，太贵了不能买。中文书也有几本，是关于中国文物古玩的港台书，翻看了一下发现知识贫乏、见解幼稚，亦作罢。这时我想能在楼下报摊买一张 China Daily 也好哇，但商城竟无一处报摊。好容易在马路沿子上见一推自行车的报贩，却只有《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晚报》两种。

买了报纸回到二十一世纪的路上，一眼瞥见马路对面一个大院的门口挂着“收藏品市场”的招牌，立时大喜。自从在山西悬空寺受骗买了几件假古董之后，我对旧物竟有了兴趣。进得院来，见有几条由小店铺分隔成的街道。一家小铺是个女老板，30 多岁的年纪，眼睛很亮，下巴却很凶。一个青瓷碗我问她价钱，她说是明瓷，210 元。我没有买，问她明瓷一般

是什么价。她答曰：“没准儿，好的无价，最普通的不过几元钱。”她还说：“如果当时就值钱，是有名的官窑所出、富贵人家所藏，那现在也值钱。如果当时就是老百姓家的东西，不值钱，那现在也不值钱。什么时候都是老百姓的东西最没价值。”我听这话不顺耳，遂不与复言。店铺林立，摆的东西大同小异，我也分不清真假优劣，来来往往瞎看了一通而出。这两年蔑视下层人民的意识开始浮现于社会，使我愤懑。

1996 年 8 月 1 日:晨光

晨 3:00 起床。风闻今日有地震,又闻说地震多发于凌晨,且先躲躲看。来至户外已可见微微的白亮。不是灯光,校园所有的路灯在晚 11:00 熄灭;是自然的亮光。这同我往年的经验大不同。去年 8 月去北戴河早 4:00 上车,当时觉得伸手不见五指地黑。今天是浓阴,竟这么亮,颇可怪。

3:20 许,在湖边山坡柏荫下的长椅上闲坐,可见出柏树枝叶清晰的姿态。东南方天际有暗红色,是城市灯火;东北方向的天际则呈现银白的晨亮。近处草中有虫鸣,约是蟋蟀,响亮成阵,已近于秋声了。远处传来鸬鹚孤单而凄凉的叫声。忽听见有重物入水的微带沉闷的响声,想如果是鱼跳水必定得是条很大的鱼。

4:00 许天下起雨来,信步来到湖边木亭子下。摸摸柱子,纯木的柱子给人以可亲的感觉。对面的湖岸、水中的水榭

朦胧可见，同四周的柳树、杨树及阴沉的天空一起映入水中。天越来越亮，水中的一切反却变得模糊了，直到有一刹那间一切都突然地透亮而清晰起来，甚至能看见湖水的绿色了：此刻已近 5:00。湖中水纹忽生，很大的弧形水纹，显见得是一条鱼在向我们游来，游到近岸，却又改变了主意折向左面。又有尖形的水纹向右，速度很快，玲玲说可能是一条水蛇。

燕子在近 5:00 时开始三五成群的飞过，接着出现的是叽叽喳喳的麻雀。背后的树上有喜鹊在叫了，而飞得很高的显而易见是乌鸦。一只蝙蝠在亭子檐边乱撞，众鸟醒了，天也就亮了，蝙蝠当归了。

1997年1月28日：写史心得

关于客观性。将历史客观化的过程是一种漫长的努力。原来编《图片中国百年史》写图片说明，将“牺牲”改写成“阵亡”或“遇难”，将“党和国家领导人”改写成“中国资深官员”等等，读来好像是把历史成功地中性化了，但在写目前这部“1942年的文学史”时才发现那只是一种浅层次的、表面的中性化。毕竟一张张图片说明要求的篇幅是短小的，且彼此之间可以是分立的，不需要一种庞大的、贯通的体系或逻辑。而真正写整体的、连贯的历史的时候上述个别词汇变动的方式就很难奏效。首先是中性词汇极其有限，不足以组成历史的丰富而完整的图景；且所有的中性词汇都是些一些弱词汇，在色彩、冲击力、表达力上都无法同非中性的、有价值倾向的词汇相比，因而中性词汇构成的世界只能是非本质的世界。非本质的也就是非真实的。从这个角度看，以中性词汇追求真

实的努力往往堕入这种目的的反面。其次,在词汇问题之外,还存在着建立历史框架、逻辑与线索的问题。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历史价值观或立场或称历史判断,你就无法书写出历史的连续性,这时候所有的历史材料对你来说都毫无意义,叙述就无法建立,因为材料本就无法取舍。因而所有以客观、中性为目标的历史写作到最后都不得不绝望地发现,你仍然是依照你自己既有的价值立场来选择并组织材料,你会沮丧地发现,堆满于案头的材料,如果不成为你的例子、成为你历史价值的论证,就不能进入你的书写,你重构客观历史的努力也将成为泡影。

不过,这里面也存在着缝隙。你的材料搜集往往很难整个地改变你的历史观,甚至你阅读中的理解也必须依赖你既定的历史观才能成立。理解力说到底只是历史观的外化或另一种形式;但是,丰富的材料搜集又往往在依赖你整体历史观的同时修改你历史观的细部,哪怕是极其细微的部分;你不可能在接触到大量的新材料之后没有任何历史观的变化,完完全全地无动于衷。这样,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自我改造过程,即你的历史观的改变是不可能一下子完成的(如果一下子完成那就说明原来你的所谓历史观并非真是你的),但却又是渐渐地在完成着的,可能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之后(比如说10年)你会吃惊地发现你的历史观(价值观)已经同原来完全不同了。

然而,这种转变不过是从一种历史价值观(历史框架)转向另外一种的过程,并非是由主观历史转向客观历史的过程,实际上或许你掌握的材料越多你就越陷入困惑或谬误,因为你不可能准确地知道哪些历史现象体现了历史本质,或许体现历史本质的是你原来掌握的简单现象而不是你后来掌握的

复杂现象。谁知道呢？

因而个人写作者追求客观性的努力往往是虚妄的。那么存不存在客观性呢？或许存在。它或许存在于历史写作的整体之中。所谓历史的客观性或者说是客观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也只能是现有的所有主观历史文本的总和——简单的总和。

关于必然性。对当前现实的估价和评价取决于一种历史哲学，即我们到底对历史的必然性（也即历史的合理性，必然的必定是合理的，因为凡是必然的都是因为它能不可替代地解决当时的问题，而解决问题就是一种合理）信仰到什么程度。如果相信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那些我们在情感和倾向上强烈否定的历史现象（即恶的现象）。如果这样，我们会发现恶往往是解决历史难题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框架中判断的有效性取决于一个前提，即我们必须首先为历史设定一个目标，只有在这个目标下才能判断一种事物是否合理和必然（是否顺应于这个目标）。对于中国近代来说，这个目标就是现代化。在现代化的目标下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政党甚至敌对政党及其政治的合理性，因为它们都是为了解决各自的问题而出现的。国民党以前的思想和政治革命解决了现代观念的启蒙问题，但没有解决现代化过程的操作问题，所以国民党的军政取代了议会民主的北洋军阀；国民党有效地完成了城市和上层社会的动员与整合（有效地在城市和知识分子中建立了新秩序），但因为阶级局限未能完成乡村和最下层的革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之后建立了真正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和中央政权，并且能够在政治高压下通过剥

夺乡村完成现代化(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这种计划体制的非自然性质,决定它只能是赶超型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而不可能是通向成熟现代化的最后方式,因而这种体制也必然要经历一种自我扬弃的过程。这种扬弃甚至在这种体制鼎盛时期就埋下了伏笔,甚至正因为它的鼎盛才种下了扬弃的种子。如没有该体制的高度强化不可能出现“大跃进”和“文革”,而“大跃进”和“文革”的夸张性又是该体制衰落、形成有效反弹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文革”的巨大破坏和由此造成的经济与政治的难以为继,就不可能有市场体制的顺利出台。

22 所以在这种历史观下,一切都是命运的,都是合理的,都是由要解决当时问题的努力自然促成的,因而表面上的恶中都隐藏着真正的善,如果我们把现代化目标设定为一种善的话。所有的弯路都是不得不走的,走弯路是为了更坚定的走正路,从这个意义上弯路即正路,而那种坦直的所谓正路才是真正的弯路。

关于外力。其实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没有真正的外力。没有外力,所有能形成影响的外力都即刻化成了一种内部因素。现代化看来是西方外力强加给中国的,但实际上在1840年英军同清军交战的那一刹那,现代化就成了中国的内在需要,现代化需要就成了中国社会的内部因素。西方的压力作为外力(姑且说它是外力)如果永远存在、不可摆脱(事实正是如此),那么它对中国来说就不再是一种外力而成为一种内部因素,对它的应对就会在中国的机体中自然化。将现代化内化入中国的机制是人类共有的求生与求强的本能。面对生存

威胁必然要求生,面对欺压必然要求强,这是人的自然、生理定性。有了永远的求生本能,在 1840 年英国与清军交战的那一瞬间,现代化的逻辑就已经加入到中国社会中成为它的内部需要。

1998年1月26日：一种主义

24

李洁非兄在《中华读书报》上的专栏“雅侃文化人”我经常读，常对这“雅侃”生些腹诽。洁非太不世故，不知道公然以“雅”这样的美辞自称是危险的，常会使路人不平，对他的文章生出拔刀之心。这是洁非自讨苦吃，且由他去；我这次读完他的专栏文章《〈三国〉别解》（1997年12月17日），感兴趣的不是“雅侃”，而是对他理解的“文化人”有些异议。

洁非在文中把诸葛亮当成了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把关羽、张飞在博望坡对诸葛的敌意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并以廉颇看不起蔺相如的故事佐证之。他的本意是要指出中国古代虽曰崇尚读书但实际上是轻视知识分子的，他要为知识分子张目；但他观察历史事实的眼光有些糊涂，因而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首先把诸葛亮看作文化人就是错把“满朝文武”的“文”当成了文化的“文”。实际上朝中的文武都是官员，

都是实务者，诸葛与关、张在本质并无不同，他们都与从事知识和精神生产的文化人或称知识分子相区别。而且要说轻视知识分子，诸葛亮就是一个最轻视知识分子的人，在《三国演义》舌战群儒一回中他痛斥那些“青春作赋、皓首穷经、下笔千言但胸无一策”的读书人，见出他根本就否认艺术、学术和写作的独立价值。这种见识在中国古代是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人确实重文，直到了“敬惜字纸”的程度，李洁非说古人重武轻文确实有点冤枉他们了（实际上古代倒是真有点轻视武人）；但古人之重文重的是实用之文，是德化与谋策，等而下之者重读书只是为了晋身，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与文化的价值已相去甚远。所以那时候读书人年少时很受尊重，因为他是“宰相根苗”；而一旦变成老秀才，失去了做官的可能性，就成了受人轻侮的“酸丁”与“措大”。古人骂“穷酸秀才”并非像洁非所说的那样不相信“知识就是力量”，而是太相信知识就是力量（Power）了。

中国的这种传统用一个外来词概括就是 Anti - intellectualism。这个词有两个含义，一是反对知识分子，一是反对强调理智与智力活动。这两层含义是互相关联的，反对纯粹的思想与智力活动往往指向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因为这种活动是知识分子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将一切知识与文化实用化的传统是一种典型 Anti - intellectualism，因而这个概念对我们具有镜子的功效，国外对这种思潮的研究也应该成为我们进行文化自省的借鉴。遗憾的是国内很少看到这方面的介绍，就连这个概念本身也没有一个很准确的翻译。周穗明、翁寒松译成“反知识主义”（三联版《思想家》第 58 页），陈振祺译成“反唯知主义”（商务版《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第 129

页),都执其一端而未得全貌,“反唯知主义”的译法还似乎赋予了这种思潮一种正当性,因为“唯”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略带贬义。这也难怪译者,汉语中确实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对应词,这说明我们的文化中根本就缺少对这种倾向的反省,当然也就更证明了这种倾向的严重。我想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意译,不如干脆仿“英特纳雄耐尔”故事将其译为“安提英特来克梯尔主义”。

近日读旧杂志,发现《代达罗斯(Daedalus)》1962年夏季号有怀特(Morton white)的文章《Anti-intellectualism 反观》,文中将该主义者反对知识分子及其工作的战略分为三种:一是消除,二是围堵,三是侵入。消除战略是认为知识分子和知识界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必欲焚书坑儒而后快;围堵是将知识分子的影响限制在学院围墙之内;侵入是闯进知识分子的工作领域,用非知识分子的标准改造学者与学院。在怀特看来消除虽激烈但却少见,围堵虽常见但却缓和,最危险的是侵入。关于侵入怀特举的是一些非理性论者用情感和直觉代替理智的例子,这些论者坚持说情感不仅是达到真理的途径而且还是惟一的途径。我想中国传统中,对知识与文化的实用化改造,也算是侵入之一例。清退这种侵入,建立起知识与文化的独立品格,或可看作是当务之急。——在这一点上我与李洁非同志。

1998年1月28日:隔膜

艾文·安格尔(Irwin Unger)的《运动:1959—1972年美国新左派历史》(*The Movement: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ew Left 1959-1972*, Dodd, Mead & Company, 1974)第57页记载马尔库塞(H. Marcuse)1962—1963年间曾伙同一批学者在学生民主协会的大会上讲演,其中有我们较熟悉的古德曼(P. Goodman)、波特(P. Potter),这批大学教授对大学生们激烈地抨击大学。他们指出大学已成为美国社会邪恶的同谋,要求大学进行彻底的自我改革。教授们的本意或在于唤起一场针对大学的学潮,但学潮真的兴起之后针对的却不是大学而是整个美国社会,当时学生们起而行之的是到民间去发动群众。安格尔认为:反大学的学潮之所以没有搞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学生们对于教育建设还没有足够的知识与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因为大学还没有完全丧失其旧日的可敬形象。

在我看来原因还要更复杂一些,涉及到学生与教授之间角色、利益关联及兴趣的不同。

虽然同居大学,教授与学生同大学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大学是教授安身托命之所,是教授生存的空间与事业的归宿,大学的体制与政策直接关联着教授的得失也就直接地牵动着他的喜怒哀乐,可以说大学是教授的首要环境。教授且都已成年,已经历了比较深刻的社会化,过程,而所谓社会化,往往就表现为人对某一个社会单位加入的深度。大学就是教授的单位,对于某些沉缅于书斋和象牙塔的教授来说,大学甚至是他全部的社会,教授已成为大学的一部分,这两者一体难分。同时人到了当教授的年龄自然野心已敛,目光也已收缩,因而大学就成为教授首先关怀的对象,大学的问题就成为他首先关注的问题,他改革大学以使其顺遂自我的愿望比他革除贫民窟或工厂弊端的愿望要迫切得多。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人对人类的改善大都是从对自我的改善开始的,虽以超验关怀自命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教授或称知识分子本身是一个利益集团,其思想与行为必然先要满足其集团利益的需要然后才谈得上去做人类理性与良知的守夜人。这种行为方式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进一步地看来它还是必要的,因为你无法信任一个没有利益的人,利益是人为的制约与规范力量。大学是教授的利益环境同时也是他们向社会分利的渠道,安得不令其萦怀。人们对知识分子往往以圣贤相责,殊不知在现代真正的圣贤只能是世俗的圣贤。

与教授相比,大学生们的角色要模糊得多,大学是铁打的营盘,学生只是流水的兵,学生与学校没有长远的关系,因而也不会产生深切的关心。学生在大学里主要居于被动的、受

教的地位,他不是学校里积极的功能性角色,他加入不了学校既成的利益结构,他与这种结构也不发生深刻的互动。学生尚处于社会化的过程之中,他还没有获得固定的社会角色,所以他更倾向于以整个社会乃至人类的代表身份思考并且发言,更易于被一些理想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美丽观念诱惑并俘虏。他有时也会为校园中的事故所扰而有所动作,如鲁迅所谈及过的北大的讲义风波,梅贻琦之前的清华大学也曾发生过驱逐校长的运动,但这都是学生偶一为之的非本质行为,校园中事只是他的客串。学生们血气方刚,心气正旺,胸怀正广,即使关心政治,他关心的也多是国家和世界的大政,岂以区区校园琐政为意。于是教授和学生之间就出现了沟通与对话的尴尬,教授们津津乐道或痛心疾首的校务在学生听来都隔膜得很,教授对学生改革大学的期望也难免使学生生些腹诽,被当成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马尔库塞本是一个对资本主义社会有广泛研究的文化批判家,但他对学生发言时仍难脱一个教授关心大学的积习。他对学生进行的反大学的鼓动没有奏效,他并非为鼓动学生而作的社会文化批判却成为 60 年代后期美国新左派学运的思想武器,被尊为与马克思、毛泽东并列的“三 M”之一。马尔库塞承认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这样成为学生的旗帜(三联版《思想家》第 79 页),亦可看作教授与学生隔膜之一例。《运动》一书的作者安格尔在论史时对这种隔膜很隔膜,或同他自己的教授身份有关。

1998年2月3日：昨日运动

30

一般说来大学生们热衷于校外政治而轻视校政，但有时他们也会对学校开战，尤其是当学校阻碍他们参与校外政治的时候。1964年秋冬至1965年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潮，其肇始和主要目标就是反对校方对在校园参预校外政治的禁令。学潮被学生自己命名为“自由发言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 简称FSM)。安格尔的《运动：1959—1972 美国新左派历史》(多德、米德及其伙伴出版公司1974年纽约版)，对这场学潮有较长的记载，读来不禁心潮澎湃。伯克利学生领袖杰克·魏恩伯格说过“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任何人”，其意或指青春已逝的人不可能再理解和同情青春。这话虽多有言中却并不尽然。我在读安格尔书时30已过，FSM爆发的1964年恰是我的生年，但在阅读中设身处地，30年前美国西海岸那场学潮仍对我产生了深刻的

触动。30岁或许意味着青春的逝去,但并不意味着青春记忆的泯灭:FSM中教师们的表现也使学生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作为一场运动,FSM使美国的大学和社会生活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从而成为一个重要而丰富的文化史与社会史个案:大概事物只有在运动状态才最能展现自身,才最有戏也最可观。出于文化与历史的兴趣,我忍不住要对FSM的个案作一些较仔细的细节的辨析。因为安格尔是一个严肃得有点枯燥的历史学家,他的史纪只有情节而缺少细节,所以我又翻阅了1964年的《时代周刊》,想找到些描绘性的记录。在1964年的《时代周刊》中找到两篇有关文献,一篇是12月11日的《带着爱入狱》,另一篇是12月30日的《何时何地发言》。读完这两篇记者文章我发现安格尔的史书不惟省去了细节,对一些有趣而重要的情节他也时有删减:他虽严肃却不太严谨。《时代周刊》并且还配发了4幅照片,使我们对现场气氛有了更真切的感知。现以安格尔的《运动》为本,以《时代周刊》为辅重述一下FSM个案:以寄情怀。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沙特门外有一处条状地带属于校产。这块地方宽26英尺,长60英尺,傍着本克劳弗特林荫道,止于一家《电讯报》社,因而这地方又被称为“本克劳弗特——电讯报条地”。这块小地方一直是伯克利分校的海德公园,学生们的言论与活动多在此举行,校方从无严重的异议。但1964年9月15日情况出现了变化,学校的学监凯瑟琳·托尔女士在这一天约见了各学生组织的领袖,通知说从下周开始禁止在此举行涉及校外事务的集会与传单散发活动。这项禁令激怒了学生,他们认为这严重违犯了关于言论自由的第一宪法修正案。12月17日大约18个学生团体的代表会见

了托尔学监,要求她收回成命,托尔拒绝。12月18日学生组织联名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在条地放置集会桌讨论一切政治事务的权利。12月20日各学生组织举行联席会,议决如果校方死不让步即以纠察、静坐并援引不服从权利对付之。他们同意等第二天同托尔学监的约定会面后再作行动。第二天托尔给的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说法,她说学生们可以利用条地主张某些政治事业,但不得为这些事业募捐,同时也不允许鼓动特定的投票,不允许鼓动直接的社会与政治行动并为这些行动招募人员。

学生们于是行动起来。当晚约有百名学生在校部斯帕劳尔大厦门前静坐守夜。次日官方的学生组织加州大学联合学生议会开会,投票通过向加州大学董事会提交的一份请愿书,也要求改变禁令以使一切请愿、鼓动和招募在条地上自由地进行。随即伯克利分校校长爱德华·斯特朗出面发言,重申托尔学监的立场,这一重申不久又得到了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柯尔的公开首肯。在这种局面下,学生组织不分激进派、自由派甚至也包括保守派采取了一致的态度,他们警告将以纠察和游行行动来抗议校方对自由言论的僵硬拒绝。——在这种压力下校方终于作出了有限的让步。斯特朗校长宣布学生可以在条地上为任何事业作宣传,但却仍不允许为校外的政治行动募人或募款,任何组织只有立誓遵守这一限定才能获得在条地集会的正式许可。学生们士气正旺,斗志正坚,让步既没有使他们动心,限定也没有使他们罢手。9月29日,学生集会桌未经许可就摆到了条地,校方立即作出反应。校人事处长 A. 威廉姆斯率校内警察通知学生他们已卷入非法活动,校方将移走桌子。第二天桌子没有移走,但校方通知参与此

事的5名学生于下午3:00到校部斯帕劳尔大厦威廉姆斯处长的办公室面谈纪律处分事宜。下午3:00,学生们来到斯帕劳尔大厦,但不是5名而是500名,不是面谈而是请愿。学生请愿的总领头人马里奥·塞维奥,是哲学系21岁的活跃分子,高个红发。他递交了5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称他们都对非法集会桌负有责任,请求与被控的5名同学一起受罚。时至下午4:00,威廉姆斯处长要求原来的5名学生与这次游行的3名骨干一起见他,这一要求未获满足。对峙持续到午夜时分,斯特朗校长出面宣布上述8名学生均被停学。宣布后不久学生们倒是投票决定自动撤离斯帕劳尔大厦,但并非是向学校屈服而是因为他们实在有点困了:他们在投票撤离的同时还决议要为反处分和自由发言斗争到底,不胜不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1日,一位已毕业离校的学生杰克·魏恩伯格回到伯克利校园为校外的一个政治组织筹募基金,当即遭到了校园警察的逮捕。校警们不敢轻易对请愿的学生动手,但对这位来趁热添乱的前学生没有客气。不过,当警察将魏恩伯格带上警车时,发现警车已被数千学生团团围住。警察带着他们的犯人被困在车中,一困就是32个小时;这期间学生们也没有让警察消停,他们对警车敲打推搡,将车顶当讲台,跳上去轮番讲演。警学对峙惊动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整个加州,持各种观点的学生领袖、大学职员和政府官员纷纷奔走宣言,或支持或反对或鼓励或警告,各不相让;在斯帕劳尔大厦,守卫的警察还与趁机进来抗议的学生屡起互殴。这种局面眼看要酿成大乱,学校当局情急之下不得已与学生订立城下之盟。学校同意不对魏恩伯格提出指控,同意组成学生、教师和校部三方联合委员会来审议校园政治活

动问题,同意将前述8名学生的处分问题交由一个教师委员会讨论决定。学生则允诺暂停抗议,在这种妥协之下围困警车的学生撤退,警察获释。

在以后的几周中校方对匆匆定下的和约有点反悔了,它试图有所修正。对魏恩伯格确实没有起诉,但地方检察官却暗示早晚要办了他;讨论学生处分的教师委员会迟迟未能组建;至于审议学生政治活动的三方联合委员会,校方坚持说12名委员中的10名应该由它任命。这实际上使和约名存实亡了。自由发言运动的领袖们对校方的言而无信感到愤怒,他们提出了抗议。10月16日柯尔校长在抗议下让步,他同意将三方委员会由12人增至18人并增加学生委员的名额,同意讨论学生处分的教师特别委员会完全由教师自选。但学生与校方的不信任已经形成。11月9日,由于对三方委员会的开会程序不满,学生领袖宣布撤销他们暂停抗议活动的允诺。校方当即也以解散三方委员会作为回应。第二天学生们又在条地上举行未经申报的政治集会,这一次连相对稳健的研究生们也加入了;校园警察遂即记下了75位参加者的名字。

11月17日,讨论学生处分的教师特别委员会有了决定,他们建议将8名停学学生中的6名复学并删去停学记录,而塞维奥及另外一名学生领袖阿瑟·高德伯格则需将6周的停学处分记入档案。学生们遂即向校董事会递交请愿书表示异议。校董事会出面调停,但它的所谓“调停”比特别委员会的建议更激怒学生。校董事会的意见是8名学生全部一起复学,并一起将停学处分记入档案,塞维奥和高德伯格且须留校察看一年;同时塞维奥、高德伯格及其他几位指挥围困警车的

学生还必须到校董会接受关于围困事件的审查。

学生们将校董会的决议评为“惊人地无理性”。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代表了他们被校方行为所激发出来的日益激进的观点。宣言否定了校长和校董事的神圣性,指出大学只是学生与教师的大学,校长和校董事不过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如果他们适得其反成了障碍,则必须坚决清除之。宣言最后警告说现在校董事会已切断了所有沟通的途径,到了学生们采取适当措施来捍卫自己权利的时候了。

学生们果然言而有信。12月2日中午,数千名学生在斯帕劳尔大厦前集会,被校方衔恨至深的学运能手塞维奥手执话筒发表演说。他把包括大学在内的整个社会比作一台机器:“当这机器的运作变得如此地丑恶,使你心生如此的厌憎,你不能加入这种运作,即使仅仅出于策略你也不能。你不得不做的是将你的身体放进齿轮中,放到轮胎下,放到杠杆上,用你的血肉之躯去制止这架机器。”塞维奥的讲话使群情激动。闻讯来参加集会的流行歌手琼·贝斯引吭高歌,这位被加尔默罗大学开除的叛逆戴着珠宝十字架、弹着吉他唱起的是黑人民权运动歌曲《我们必将战胜》:“当你斗争时你要心怀爱情,你一定会成功。”且说且唱、爱恨交加,约千名学生冲进了4层楼的斯帕劳尔大厦,将校部变成了造反营地。学生们挤满了走廊、厅堂和天井,他们弹着吉他,跳着舞蹈,玩着滚球,还放起了卓别林的喜剧电影。到了晚饭时,女生们还把一个房间当成厨房,做三明治分发。造反成了青春的节日。

学生们在运动,警察也开始了行动。晚6:45,校警进入大厦,宣布如果学生们不在15分钟之内撤离将被逮捕。15分钟后,警察锁住楼门,许出不许进,但并没有真的动手捕人。

凌晨 1:00,大厦内的灯被熄灭,学生们也就就地宿营。凌晨 3:45,当静坐的学生睡梦正酣时,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宣布要采取行动了。此时大厦周围已布署下 600 多名警察,他们随着布朗州长的命令突然进入,直扑顶楼,自上而下一层接一层地逮捕学生。学生们没有抵抗;警察将塞维奥带离的时候,这位学生领袖高喊:“这简直太好了!太好了!”颇有殉道者风。共有 814 人被捕,被捕者被带到久候于大厦后门的大巴士上,或操或拖。FSM 组织公布说警察曾棍击、脚踢、用种种粗暴方式对待许多学生,警察则坚持说没有暴力,又称即使有也不多。学生被带走,女生关进城市监狱,男生被投入桑塔里特监狱农场,那里的犯人对这些背着吉他、留着胡子的难友侧目而视。

36 12 月 3 日的逮捕行动后舆论对学生们是一片谴责之声。加州大学校友会谴责学生的行为并赞扬布朗州长的断然处置,许多州的报纸也抨击学生的“非法战术”。掌握着大学钱袋的州立法机构更是急于要对大学中的反抗力量采取行动。柯尔校长对学生们的责评颇有代表性,他说学生们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工具;他这样扣帽子也并不奇怪,早在斯帕劳尔大厦静坐事件之前,他就断定学生中的活动分子是非德尔·卡斯特罗和毛泽东之徒。面对逮捕和责难,FSM 组织号召并开始组织总罢课。

被捕的学生不久倒是被取保候审,保金是 85000 美元,出自一个教师组织。不过校方的态度仍无松动。12 月 7 日,柯尔校长在校内露天的希腊剧场主持由全校师生参加的万人大会,重申了学校的立场。就在柯尔校长讲话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情节发生了,这个如此戏剧性的情节不知何故安格尔

的史书没有记载,而《时代周刊》(1964年12月18日)则有详述:柯尔话音刚落,刚刚从监狱里保释的塞维奥不知从何处突然现身,跳上讲台去抢夺柯尔面前的话筒。在万人注目之下一个警察扑过去掐住他的脖子,又一个警察冲上来扭住他的胳膊,他们拖着挣扎不已的塞维奥离开会场。《时代周刊》在报道旁还配发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柯尔校长在讲话;他头顶秃得厉害,戴着素边眼镜,面目看起来从容而宁静。他大约是刚宣布完什么事情,站在他身旁的两个和他同样秃头、学校官员模样的人物在鼓掌。另一张是两个警察奋力地拖拉在地上打挺的塞维奥;警察没有照见脸,只见制服、腰间的手枪和用力的腿。塞维奥仰躺在地上被拖拉着,衬衫的钮扣已被扯开,露出了那学生特有的瘦削的身体。一个不知什么媒体的记者不嫌忙乱,追赶着将话筒伸到塞维奥的面前。塞维奥没有发言,但会场上学生们却在一声声地高呼:“我们要塞维奥!”几分钟后塞维奥被释放并被允许上台讲话,他没有多讲,只是发出了集会抗议的号召。按他的号召,近5000名学生又一次聚集在斯帕劳尔大厦抗议。

12月8日,伯克利分校教师的官方组织学院议会开会讨论校内局势,参加者超过千名,是历次教师大会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教授们率全体教员这一次坚定地站到了学生一边,会议以824:115通过决议,对学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不为12月8日之前的任何事处分任何人;校园政治活动只有在妨碍大学的正常功能时才可以被限制;不得限制任何自由言论和政治鼓动;将来对学生的任何与政治活动有关的纪律处分都必须由学院议会决定。会上一位教授列维斯·费厄提出一项保守一点的修正案,希望在不限制任何自由言论与鼓动

一条后面加上条件从句“如果不指向即刻的政治强迫和暴力”，但这项提案以 737:284 的票数被否决。就在教师们开会之时，3000 名学生在外面通过扩音器收听了全过程。当费厄教授的修正案被否决时，屏声静听的学生们热烈鼓掌。当教师们疲惫地走出会场时，学生们用欢呼迎接他们。FSM 的领袖们兴高采烈，他们以 FSM 的名义发表宣言，题为《幸福的学院议会会议》。塞维奥担心投票支持学生的教师会受到校董事会的迫害，宣布学生们将成立一个“捍卫八百名爱国者委员会”。

38 不过，学生们高兴得还有点早，实际上学院议会对校务只有建议权，决定权还在校董事会和校长；12 月 17 日校董事会开会，认真地听取了学院议会的建议之后很干脆地投票否决了它。校董事会并且重申自己对于违纪学生的处分权，重申不许在校内从事校外政治的旧规。FSM 领袖们马上表示坚持不接受校董事会的立场，但决定在即将到来的圣诞节之前不采取行动。

伯克利的气氛又一次紧张起来，学生与校方陷入僵局。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问题的最后解决竟出奇的简单与迅捷。1965 年 1 月 2 日，校董事会任命环境工程学院院长马丁·莫伊森为伯克利分校的新任校长，换掉了原来的斯特朗。莫伊森上任伊始，立刻发布关于学生政治集会与言论的新规定，新规较旧规有了相当大的放宽。1 月 4 日，学生们已开始按新规集会，为校外的政治事业宣传并且募捐；此时此举已成合法。校方通过换人的方法处理危机，使旧规以人去政息的方式自然废除，虽最终对学生让步但又保住了面子。至此，FSM 的初衷已达，余下的任务就是在法庭上维护斯帕劳尔大

厦静坐行动中被捕的 814 位学生的权益了。

关于新左运动的另外一本书, P. Jacobs 与 S. Landau 的《新激进派:报道与文档》(*The New Radicals: A Report with Documents*, Random House, 1966, New York), 对 FSM 也有论述。这本书的作者认定 FSM 是学生们对自由派当局的反抗(Revolt against liberal bureaucracy)。当时加州大学的校长柯尔是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中国曾翻译出版过他研究教育的著作《大学的功用》(江西教育出版社), 90 年代初我曾经拜读过, 其文章温文尔雅, 一如我在《时代周刊》上看到过的他本人的照片。但他所代表的以自由、民主、温和为旗帜的自由派, 在学生们胆敢对现存秩序挑战时, 其坚决镇压的鹰派面孔立时显现。Jacobs 与 Landau 的书中收录了几首 FSM 运动中学生们唱的歌谣, 现选译两首, 存以玩味。

其一

加州大学的校长
你脑子像死木头一样
你已经把自己逼到墙角
并且已把自己捆上
但是在黑夜的掩护下
奥克兰警察的警灯闪亮
你以此来证明你的正确
以此来加重你说话的份量

其二

在学期的第一天
学监对我说
这里属于大学
在学期的第二天
学监对我说：
不许胡乱张贴，这里属于大学
第三天说不许发展成员
第四天说不许募集金钱
第五天说不许提民权
第六天说不许成立组织
第七天说不许号召行动
第八天说不许示威游行
第九天说你将被开除
第十天说军队将进驻
第十一天说没准儿我们可以交易
第十二天说我们的话就是法律

1998年2月7日：路见

“电话铃声闯入美梦”：这是我小时候读过的英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一篇文章的开头，这样的开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起这句话我总能感到那种繁忙、紧张而又充满希望的明朗的生活气息，那是我少年时所向往和热爱的。今天早上9:15那把我从床上叫醒的电话铃声又使我想起这句话，但却没有美妙的联想，因为昨天晚上睡觉太晚，觉缺得厉害。我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关上电话，拿起听筒就听见了声音：“喂，我是胡锦涛。”是孟繁华。我太熟悉他的声音了，他给我电话总爱冒充敝校校长。“有什么指示？”“你马上起来洗脸，然后打辆面的到西单“半亩园”来讨论文化问题，我也叫上了汤姆和毓海11:00来。”汤姆是旷新年，因念书时被英语外教用一个倒霉黑人的名字命名，遂得此外号。老孟是谢冕老师的学生中年纪大的，我们公推他作为师兄弟聚会的召集人。

我走到党校大门口通往香山的公路上打“面的”。走到大道上才发现阳光很明亮，很透明，沿着路望去能望得很远很真切。很奇怪只有在人车稀少的大马路上才能这样清楚地看到天晴得多么好，清楚地看到树梢和行人脸上的阳光。我很喜欢这种大城市郊区才有的感觉。在城市郊区空旷的、夹着密树的柏油道路旁等车使人想起异乡和故事，想到俄罗斯小说或法国电影中的某个场景。不过风很大。

玲玲和我在一起，她要出外买包包子的菜。“面的”经过万泉河路，路西的林地里挂满了白色的废弃塑料袋，使冬天本来很俊秀的树枝显得有点滑稽，无数的白色塑料袋在大风中猎猎飘扬，宛如树林的自嘲。路过有名的朝阳屯饭庄，招牌中的“阳”字格外地大而且墨色鲜艳，仿佛是向人暗示这里有利于阳物，使我想起此饭庄风传的艳名。路边的标牌五花八门，以饭馆最为诡奇。一家饭馆店名下还写着一句话：“别忘了接头暗号——脆豆腐。”好像文章的副标题。豆腐不知怎么个脆法。把饭馆打扮成地下活动的联络站来招徕顾客，也见出了邓小平时代政治开放、经济搞活之一斑。苏州桥附近有一个专卖豆腐的大饭馆叫“淮南王豆腐宴”，这次路过注意到已经改作“淮南豆腐宴”，革去了“王”，大约是前些时扫荡“不良文化”的成果。

11:35 我来到半亩园，是一家连锁快餐厅。左等右等未见老孟踪影。12:00 我叫了一份辣牛肉面和凉盘海带，12:20 吃完，仍未见老孟，遂离去。可见嘴上有毛者也常办事不牢。正好此地近琉璃厂，可得浮生半日闲去逛旧书店。先顺道至西单中国书店购得《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1—8 册。出门乘 15 路公共汽车走两站至琉璃厂。下车先有半大的外地

男孩围上来问要不要古董。琉璃厂有东西两街以马路相隔，有过路天桥，但路中间无隔离栅，故天桥形同虚设。东街有海王村书店、中国书店（长厅），西街有来熏阁、古籍书店、中国书店读者服务部。其实这些店都属中国书店，所售图书品类相近。我串店购书，直到钱罄。归家后接老孟电话，告说他同汤姆在西单过街通道等候我半个小时。他不知凭什么认为我非走他守候的通道，其实我走了旁边的另一个通道。

1998年4月30日:闲读

早上迟起。醒后在床上翻读王安忆《乘火车旅行》中关于文学理论的部分。中午看一部美国科幻VCD光盘,因为盗版画面多为剪影且时时晃动。听说许多盗版者就是在电影院看电影时用录像机对着银幕摄下,所以不少盗盘中还有影院的人声。下午4:00许来办公室,晚饭后又来。读陈平原夫妇所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校史拾零”辑完。书前有陈平原序,陈序辨证了不少流行的谬见。陈平原见识略高于胡适而文风作派似之。晚上眼睛不适,或因看盗盘所致。省钱而费眼,买盗盘者亦赔本。现在盗盘流行不全是因其价廉,或者更因合法光盘因种种限制(包括意识形态限制)未形成市场,想买正盘无从买起。

1998年5月3日:张曼菱

1日上午10:30从党校出发,到首都机场接山东教育社从深圳印刷厂运来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系”丛书,20套凡220册。“系”而且“总”,难逃好大喜功之讥。其实若老实一点,就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选年史系”就挺合适。出版社押书者是其印制科科长吕祥齐,我在出港口,举着写有他名字的大信封傻等。先出港者是从广州来的航班,15分钟后才是深圳来的CA1306。从南方城市来的航班每见艳丽照人的小姐联袂而出,不知这些在南国营生的小姐们进京何干。吕祥齐终于等获,他一个人倒腾这么多书也实在不易。拉书归途中按谢老师嘱送一套至北大中文系展览,在五院遇系友接待站,领校友卡一枚。在北大图书馆南门口依次见返校参加百年校庆的研究生同学吴秉杰和钟友循,他们并未见老。同至谢冕先生家拜师。在谢家未谈数语,张曼菱不速而来,有她出席聊

天就只能成为讲演会了。她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演说近年来的遭际。她在小说、影视两栖操作,写一部小说即亲手改成电视剧并亲自筹款执导。谈起来我才了解她对北大为什么如此有感情。按她的性格在别处是众人皆曰可杀的,而北大却偏能容忍她、保护她。孙玉石先生推荐她的小说在《当代》上发表,谢冕先生在她毕业时给她写了份量很重的推荐信。季羨林先生在我们念书时任副校长,也曾不遗余力地保护她。当天晚上我们陪同她去拜访季羨林的助手李玉杰女士,70多岁的老太太神情硬朗,谈话铿锵。她说“自从张曼菱在北大胡闹开始,季先生就一直保护她”。李玉杰个人也很欣赏张,说对她有“叔伯之爱”,即同类之爱。李说自己年轻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敢闯敢为,但限于时代环境终于也无所成,现在看见张曼菱这样觉得是找到了替身。张曼菱说,1979年云南大学学生听她在北大竞选人民代表时的讲话录音都要受处分,而她在北大讲演却没事儿。说她刚入校不久系主任大向找她谈话,将同学们告她的罪状一一核实,诸如口出大言说要出人头地、半夜在水房唱情歌、声称只愿同男生谈话不愿理女生、同各系男生轮流交朋友并深夜不归、一场舞会换了8个舞伴,不一而足。核实完毕后向主任表态说这些统统不成问题,问题是这些不成问题的问题无一遗漏地被反映到系里,说明你群众关系也太差了吧。张曼菱倒是老实地承认了这一条,并自告奋勇地帮大向找到了群众关系之所以差的原因:自己爱喝茶,却很少打水;洗脸毛巾拧不干,滴湿了下铺的枕头;从云南带来一张狗皮褥子,狗毛往往落下铺一床。向主任听完说是了是了,这正是问题所在,回去将毛巾拧干、狗皮褥子换掉、勤打水。张曼菱说如此循循善诱而不整人,使她领略了教育家的

风范。——这是前话。1日晚张曼菱和我们从李玉杰家出来正是10:00许,来到电教中心附近时张曼菱非要打手机给孙玉石先生问安,一边说一边走,竟一脚踩空摔倒在地。因保护手机致使肩膀着地,一时间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吴、钟与我赶紧拦车送往海淀医院,做心电图、量血压之后未发现问题,只是大夫抬她的伤臂时她就觉得头晕欲睡。大夫赶紧安排吸氧输液,盖怀疑是低血糖。之后大夫仍不放心,叫了急救车让送到北医三院作CT。急救车一路呼啸到三院做完CT、输完液体后已是凌晨2:30了。真乃无妄之灾,怎能想到校庆第一天就在医院渡过。好在有惊无险,CT报告单上说未见异常。2日上午我打张的手机,她已经伙同同学走在拜访老师的路上,说她早上九时已到电教报告厅给讲演的季羨林先生献过花了,献花获得满堂掌声。就在她前晚坐在医院过道的一张轮椅上输液时我们都劝她第二天大睡一天,她坚持说一定要去给北大校庆献花。2日上午、下午我在家读书一天,读《启明星》校庆专号和张曼菱随笔集《曼菱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晚同韩毓海及其姑表哥嫂晚饭,饭后在北大校园散步巧遇吴晓东、孔庆东,同至西门外酒吧喝酒至11:00时。3日娄哲峰来,他现在我家乡当乡党委书记,是北大80级哲学系学生。北大的学生如果都能有当乡党委书记的决心和意志那可真是百事可为了。哲峰谈乡下事。

1998年5月4日:校庆

今日是校庆高潮。北大校园转播着人民大会堂欢庆会的实况,挤满了各代校友,从鹤发到童颜。各种各样的活动在各处教室、办公室、广场紧锣密鼓地开场收场,大卡车拉来拉去的是整箱装的盒饭。树荫与屋檐下都有人席地而坐,路上行人如鲫。我们本科班同学在北大图书馆南门聚齐,东走走西坐坐了无着落,连吃饭都找不到地方,最后出西校门步行到西苑找饭馆,因周围交通管制。一个班的队伍东游西逛之后人数越来越少,不断有人因故或托故离去。离去的都是混得比较得意的人,较为失意的同学们东西徘徊不忍离开母校,相互之间依依不舍,直到晚上不得不散时方散。在图书馆系门口看见史老师,依是坐在轮椅上,一脸失神茫然的表情,宛若20年前。晚10:00玲玲出差回,又带她去北大逛,已是拆景卸幕的残景了,整个校园与白天鼎沸的热闹相比更显得寥落,一地

乱纸。将以千万计的银子如此地放了鞭炮，真不知道此时的北大校长、书记是该轻松还是该惆怅，抑或该警惧。北大为迎接校庆盖起了不少大楼，旧房子也粉刷一新。在不少大学校长的概念里，办大学无他，盖房子而已。想起数十年前梅贻琦先生有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如今不少大学校长有钱即盖大楼以图立杆见影的“政绩”和热闹，选师资则没有求贤若渴之心，对大师更毫无延揽、网罗之意，一任庸人当关，闲汉充斥。若大学里培植学术和文化都成了不足挂齿的闲事，若大学校长都换上了乡镇企业老板急功近利、过今儿没明儿的脑筋，国家还到哪里去寻虑远者。

1998年5月7日:会议

50

5日上午请李晓涛、张曼菱及其同行吃饭。下午开始接待“百年中国文学”研讨会。会务人员先住进大有庄胡同里的绿杨宾舍,而并非会务人员的杨匡汉先生因记错开会日期也先行到达,在党校大门口因无人迎接而兴师问罪。5日进住的多为同龄人、丛书作者,大家谈话至深夜。萧夏林兄与会,带来了他新编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书,该书收集了关于蔡元培的资料,中有钱理群的序和旷新年的跋。钱序与旷跋多有锋芒,是檄文风格,为造气势不由得夸大了蔡元培的学问人品及其意义,不能当成学术性的史论来读,盖因针砭时弊的用心太切。钱序中颇有启发意义的一处论断是说新文化运动是本世纪惟一的一次“民间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独立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凭借知识自身的力量,成为时代的主导,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历史的进程”。但钱先生仍把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概括为民主/专制的对立并以此来衡量一切人与事的价值。我问他怎样看待西方学者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他回答说,他不管历史的真实过程如何,而只考虑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如何行为,如何发言,他要不受束缚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不管是否全面,他相信他的这种姿态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而妥善、全面的战略与操作是政治家的事情。或许。但作为一个学者若不设心去细察历史进程而一味地发扬主观战斗精神,是仅执一端而不及其余。不过钱理群或可如此,他对现代文学材料掌握的扎实可以中和其主观性。旷新年最近的文章也很冲,多极端言论,人以为偏激。旷新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天天住在办公室中,号“无居斋”,偏激正得其宜也,怎可要求其冲淡平和,不能用高楼华屋中人的标准要求他,他想不成为文化战士安可得乎。但他也有危险,若长此以往作这种尖锐的战斗而不同时注重涵养与积累,就会成为声嘶力竭、徒发虚火的王彬彬了。关于学术讨论,我们新近发明出一种有效方法,即将重要文章一字一句地朗读,听众中有异议、有评论者随时打断展开讨论,这样能使议题集中、有效,能涉及学术、思想的细微之处。字怕挂起,文怕朗读,朗读之中毫发毕现。6 日晚与钱理群老师谈至深夜。7 日凌晨 4:00 许忽生腹疾,巨痛,下泻上吐,乃平生所觉第一苦病。同会的萧夏林、尹昌龙也有此疾。追想起来乃是 6 日中午吃坏了。7 日上午陪尹昌龙入校医院治疗。我是痢疾,尹是肠炎,我比尹严重,但尹脸色腊黄,一副难活之相,只好由我照顾。7 日上午因看病而未与会。7 日下午研讨会结束后回单位参加会,我传达、解释三期腾空住宅分配方案与名单后党总支、工会改选。坐在那里

忽觉目疾,其症是定睛看近处(屋内)的任何东西都有刺伤感,坐在会议室中有一种类似幽闭恐惧的狂躁,听着上届总支委员一一总结工作时不宁之极。约一小时后平复。或因长期疲劳及腹泻导致的虚弱所致。晚早睡,身心皆安。

1998年5月9日:杂志

周五上午在家静养,颇有休息之乐。生这种苦后之病或是一种福气。下午4:00至办公室,读《北大旧事》至227页。晚归后读《动物世界》巨蜥与山狮两则。周六上午亦晏起。周六下午同玲玲至城中丽莉家看岳父母。在彼处读王清平为丽莉的书写的序,甚好,中引博尔赫斯《对时间的驳斥》一文颇引起我的注意,并翻各种新杂志。《当代》二期上有戴煌的右派回忆,被罗织、被朋友揭发、被妻子背弃诸种情节无甚新鲜处,读之兴味索然。这真是不幸者加倍的不幸;当他向后人倾诉自己的不幸时,他的叙述就自然地被同传奇故事甚至艳词丽曲等量齐观,就成为文本而必须同小说家言争奇斗胜,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即使关心也未必能理解,即使理解也未必能体味在文辞背后曾有过的真实而朴素(只能以朴素状之)的漫漫痛苦。而且某种苦难的普遍化会使其成为一种被广泛传播的

知识，它在反复的叙述中早已失去了对人的震撼力而变成了陈辞滥调，它因此也就失去了严肃性，化为祥林嫂式滑稽的絮叨。所以说对痛苦的记忆与重视只能是个体性的。这就需要不幸者有过人的力量：他要能够独立承担苦难以及因之引起的一切内心痛苦，他还要同时能够宽谅世人与后世对其经历、遭际的漠视、歪曲乃至嘲笑，同时他还必须有能力在这一切不利的境况下实现复仇，执行人生与历史的正义。读《十月》上杨绛的两则短文，《记章太炎先生讲掌故》和《临水人家》。《临水人家》写一个赴比利时学工的留学生娶回一个比国太太，终因有中国男人传统的软弱、中庸与欺骗本能而致使家庭毁灭。想起张爱玲《半生缘》也写一个学工归来的留学生亦是身体力行中国传统道德，不过他言而行之的是传统美德。大约上半个世纪的学工者多在文化上保守，因袭传统道德者众。而所谓美德、恶德或者也不过仅仅是字面之别，本质上乃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而成表里。读《中华散文》上贾平凹的《进山东》，发现其半文半白的文字虽有区别于当代文风的个性，但难免又入古人的陈言俗套之中，缺少状述当代生活的鲜活、丰富与真切。他真是何苦，为避今人之短而远取早已被今人克服的古人之短。晚 11:00 时归家。玲玲念里尔克诗：“越遥远的东西越能给我们帮助”；“王冠上的黄金总是渴望重新成为矿石，因而王冠必须打碎。”新闻上说河北迁安一棵大槐树自燃，从电视中看围观的村民表情肃穆、如见神迹；澳门黑社会为警告警方而大肆焚烧街头无辜的汽车。

1998年5月11日：柯克海默与周熙明

10日早5:00被电话吵起,是在湖北当阳被扣住汽车的小同学来京求援。7:00至门口接他们到颐北旅馆住下。这事我也没有什么办法。8:00至办公室读书。中午请他们吃饭,买颐和园门票请他们逛景散心。下午继续到办公室读书,至晚9:00回家。读《北大旧事》至357页。读柯克海默的文章若干段落(Otto Kirchheimer: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mpromise)。他认为垄断时代的政治谈判与妥协角色由个人与政府变成了权势集团与权势集团,个人的呼声与利益只有在与权势集团重叠时才能得到部分表达。而到了法西斯时代,社会由间接统治(即经济权势集团通过政府与政客统治)变成了直接统治(即政府、政客与经济权势集团合而为一,垄断变成了国家垄断)。是否确当,尚无考辨。读《北大旧事》感觉到北大的自由传统不仅是一种精神,而且可看作是可

以入世界教育史的一种大学制度。傍晚在办公楼西附楼前的小树林散步——杂木林：有松、玉兰、枫、黄栌、柿、柏、柘、丁香、杨等，不知当初造园者为谁，有这样丰富悠闲的耐心。

11日读周熙明为其专著《在历史中》中所作自序。这是我今年读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写作、实践、当代、古典在文中获得了丰富而真切的意义。周文最见出哲学叙述的力量与光明。在哲学的光辉中，许多被学科与历史细节所模糊或遮掩的真相豁然大白，真理以其朴素而鲜明的形象现身。而且哲学叙述有一种不容辩驳的完整性与自足性，即使它的命题与叙述有缺陷它也带着一种浑然与凛然，在这一点上其本质是诗的。在当代有哲学背景的学者中，周熙明与胡平是我所读到的为数不多的有哲学智慧的。下午，至北图外文新书阅览室检索书目，在大众传媒类中发现不少有意思的新著。闲时应将此室的社科人文类书籍一本本地翻来。

1998年5月19日：斥李希光

这三日抓紧时间备课，电话线也天天在我入办公室后拔掉。较为仔细地读了几本有关大众传媒的书。《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虽是刘康一年前相赠，今天才读。此书中两位名列封面的主要作者李希光、刘康所撰章节较为糟糕，而其他几位无名人物所写部分较多可取之处。李希光的第一章逻辑简单而偏执，只看到美国的歪曲而不看到中国本身的花脸，仿佛美国传媒是在丑化一个无双靓女，大有凡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味道，宛如 20 年前的文章。他这样的文笔实是帮倒忙多矣，受害的中国经他这么一辩护更少人同情，受害愈甚。而且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知耻，然后才是好面子。好面子首先也应知耻。听见人说坏先是要反躬自省，不要一听人骂就跳脚相还，即使不图个人邀宠也颇失大国之风。美国传媒或许的确正在对中

国妖魔化,或许确实不安好心,但平心而论中国也多鬼蜮,所以中国人听邻人之责最好能先生些正己之心,毕竟中国首先是为中国人存在的而非为美国人存在的,中国人首要的事情是将中国的事情办好以谋自身的幸福,而不是争取(还往往是不择手段地争取,包括粉饰,即过分地为自己涂脂抹粉)美国人以及其他洋大人的叫好和夸奖。在李希光这样的人眼中仿佛中国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换取美国人的 OK,仿佛美国人必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徒,如若不然他就会无可安慰地心灵受伤。中国人不是妾妇不需要频频地对别人说“不”;中国人也不是自甘弱者将喜怒哀乐寄托于国外友好人士的“友好”上。中国人要作的是自己的人,要做的是自己的事,你外国人友好更好,不友好也罢,我不因你不友好就不学你的长处,也不因你友好的赞扬就听风是雨地顺竿爬,就去更小心地掩盖自己的短处。中华民族经过百年的嗔痴之后是到了恢复自己不卑不亢、我行我素的主体性的时候了。的确海外传媒的歪曲会在海外损害中国一些利益,但这种损害不会比我们自掩己短所带来的损害更大。中国人要有闻过则喜的圣贤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应在人对人的关系中体现,也应在国对国的关系中体现。我们要尽可能地以圣贤责己,要相信以公正公平之心待人待己的道理是有普遍适用性的,要相信诚信可行之于蛮貊而虚诈不行于乡里的古训。同时还要懂得不去用圣贤责人。外人有公心是值得夸赞的,没有公心而只有私心也属正常,如果外人出于私心歪曲了我们,我们尽可能地去申辩、去陈明事实就是了,甚至——在我看来——申辩都不用申辩,有申辩的功夫和用心最好用来做几件自我改良的善事,用不着去义愤填膺地发火,更用不着去捶胸顿足地撒娇。鲁迅

50年前曾嘲讽过某女士“以脚报国”的丑态，而今天李希光同胞比某女士还不如，其文过饰非的心机更深。鲁迅曾说过要警惕说中国好话的外国人，凡说好话必不安好心，必是想让中国保持旧状，变成一个大古董供其玩赏或者变成一个大筵席供其享用，总而言之说中国好话者往往是想吃中国人的肉的，而说坏话者却毋须防。鲁迅的话放在今天世界如此复杂的语境中或许有点偏颇，但作为一种逻辑却要比李希光的逻辑正确得多，高尚得多，有益得多。刘康写学界反华力量的一章也十分蹩脚，他把余英时看来十分学术化的观念都斥为邪恶，实为不文。书中最有信息量的是关于好莱坞电影的一章。读韦尔伯·施拉姆(W. Schramm)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金燕宁译，华夏版)。读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版)，介绍颇翔实。读《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版)。

19日上午给理宣班讲课。中午睡约一小时，竟生奇梦。梦见坐着一辆挡风玻璃炸裂的旧汽车行走，路过的皆是间伐过的树林，林中多树桩，睹之颇憾痛。来至一处小屋，似家似旅，忽有××先生来访。××仍是大而秃的脑门，佩着眼镜一派智者形象。他先是很窘促地坐在床沿上，我赶紧将其让至沙发。他对我说话，有四个字清晰而且缓慢，他说：“要兼生死。”我在梦中听言而悟，认定这是在点化治学之道，并立刻联想及同时还要“贯中西”、“通左右”。而后惊醒。贯中西、通左右、兼生死，醒后细想这话的确隽警。贯中西说的是知识，通左右说的是立场，兼生死说的是情怀。贯中西的意义已不待言，想来对我有深启的是通左右与兼生死。不右不足以深察历史委曲，不左又不足以保持批判锋芒与思想活力。青壮年往往执着于生而淡忘死，而没有对死、对彼岸的深切关怀就没

有包容与从容,就没有对大千万象的皈依,就没有真菩提。所以说要“通左右、兼生死”。斯言可以铭记。梦见××先生或非偶然,他的确是曾给我重要启示的人。90年代初在一次教师会上,他述及他的老师对他的教诲:“在中国因为文化落后,学者出名很容易,稍有长处即会成名星。但也因为文化落后,要有真正的成就很难。年轻人不可以因自喜而自误。”因布施如此的善缘,我一直对该先生抱有好感。

整理杂志,见1996年《太平洋学报》上刊有李慎之评亨廷顿《是独特的,而非普通的》的文章,读后惊讶其见识何等锋利真切如此,真是失敬失敬。

1998年5月21日:闲记

玲玲真是很有几分眼光。21日晚在“雕刻时光”咖啡屋看电影《镜子》(苏联塔可夫斯基导),看后她认为表现了俄罗斯人不为生活所动的浑厚。“不为生活所动”恰道出俄国文学与艺术的精神异秉。人世巨大的苦难与细琐的磨损都不能真正伤害他们的灵魂,他们始终保持着对森林、河流、土地、历史与天国的亲近与热爱,可以说只有这些永恒而伟大的东西才能真正触动他们。这种精神气质远非敏感而脆弱的美国化了现代人所能理解。读俄罗斯小说,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总见他们不经意的寥寥数笔就带出了土地与大自然雄浑的气势与气氛,虽译成汉语仍无减弱。读法国一位院士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写的小说《我父亲的光荣》(周国强译,安徽文艺版),能把十分平常的童年经历写得充满小说眼,读来时时解颐,可见叙述本身那种无法替代也不可剥夺

的无比的魅力。常陷于思想与理论的人必须时常读这样的文学作品方能润泽灵魂,化解枯燥与僵硬。不弄理论的人倒还可以不读文学,弄理论的则必须读。日前刘英来电话,约在城中一家粤菜馆叫顺峰楼者吃饭,叫的石头鱼、琵琶虾云云,结帐居然 1700 元。刘英现是法国一家银行的驻北京代表,一副纯粹的商人模样,连对上菜倒茶的小姐都彬彬有礼,时时言谢。他打车必打桑塔那以上,以合自己的身份。谈起大商人冯仑,他认为冯太招张了,不像一个正经的商人。他的自我定位倒也确切:“商人是什么?商人就是一只工蜂,就是得兢兢业业地为社会也为自己积累财富。”说东南亚危机对西方银行在亚生意影响很大,摩根银行一直以不裁员著称,这次其在香港办事机构一次裁员 100 多,都是上班以后直接领到总裁室谈话,当场通知解雇,当场由保安监送出楼,连办公室都不让进,个人物品由同事转交;盖担心在电脑植入病毒。经济危机使资本家残酷起来。危机总使人变得残酷。

1998年5月26日：雕刻时光

读旧杂志,《时代周刊》1981年10月5日。中有两文读来真切,一是关于密特朗总统国有化的报道,一是关于美国中产阶级华屋梦的 essay。密特朗所代表的社会党既不同于苏东共产党,也不同于北欧社会民主党,较前者在政治上缓和,较后者在经济上激进,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华屋之想作为美国梦的一部分在 Lance Morrow 写来生动有致,其不乏华丽的文风并没减弱表现的丰富。晚至“雕刻时光”同玲玲喝茶,读塔可夫斯基写的自述《雕刻时光》。该咖啡屋老板台湾人庄仔称第一喜欢纯咖啡,第二喜欢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所以开一咖啡屋以“雕刻时光”命名。这里陈列了颇丰富的书,可以在喝茶时翻看,所以很吸引我。老板庄仔谈吐文雅,虽是电影学院出身但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时髦艺术家,倒是他家中养的一只杂种波斯猫灵活敏捷且我行我素,其眼神和举动都

很有戏。陈列的《雕刻时光》一书系台湾版，谢天谢地还是横排，被主人认真读过，行下有不少划线，书页有不少批语，但细一看所谓批语都是摘取书中的原句，没有一句是自己的话。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在书上批语的人，竟有这样死心塌地的读者。今夏酷热，这里因安有空调成了我与玲玲常来的地方，在这里读书、校阅稿子。咖啡屋赠送的名片背后印着一个法国作家的话：“我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咖啡馆确有妙处，没有图书馆阅览室那种肃杀的安静，人进出、高声私语使人感到与人生气息的贴近，奇怪的是这里的人声并不妨碍读与写的专心。看书喝茶中，肖夏林从窗外走过，看见我在此就进来招呼，他从东四到北大还书。真是不期而遇，他第一次知道还有个去处。谈起北大，他认为北大校园害了北大人，过分优美而人工化的风景使北大学生沉溺于旖旎的浪漫之中，心灵变得小巧甚至小而不巧，错将未名湖当成真正的海；而且湖区过分卑湿、盆地化，距辽阔与高远相去远矣。他认为北大校园对学生的塑造还不如人大校园，人大校园虽平常但至少还能给学生提示一种真实感。或切中北大弊症。因建议他搞一本北大人批评北大的文集，取名就叫《另一种北大观》。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黄晴宜在党校学习，晚饭由在校河南同乡宴请。黄一派知识分子的和气，他曾是省农科院院长。

1998年6月10日:书目与人言

至校图书馆外文阅览室读书,进门就闻见浓重的陈年书库的气息,颇觉神定。

65

从架上取得 John Tomlison 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去年在日本购得 Edward W. Said 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因字小而未及阅读。Tomlison 此书属介绍性质,故其副题为“一本批判性的入门书(A Critical Introduction)”。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概念已走出学术界,成为弱国政治与外交斗争的武器,可见其对于文化现状的否定与批判意义。Tomlison 在伯莱德福特(Bradford)大学读批判理论出身,现为诺廷汉工学院(Nottingham Polytechnic)的高级讲师。他重点分析了传媒帝国主义,并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相关问题,包括民族性、资本主义文化、现代性、发展与文化命运都作了讨论。关于文化命运专门有一节

“作为文化命运的现代性”。出版者是品特出版社(Pinter Publishers, Lodon, 1991)。

另有一书《拉丁美洲通俗文化手册(*Handbook of Lat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由 H. E. Hinds, Jr. 与 Charles M. Tatum 编辑。其中所列通俗文化的类目有：流行音乐、民间信仰、喜剧、电视、运动、图片小说、电影、节日与庆典、单面卡通、报纸。从 Robert M. Crunden 的《美国文化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American Culture*)》中可以窥见文化史的写法。作者的设目见其史观，他似乎是认为美国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个由狭及宽、由分到合的过程：一、地方文化(1630 - 1815)；二、局部文化(1815 - 1901)；三、北方民族：从宗教到资本主义民主(1865 - 1917)；四、国民文化(1901 - 1941)；五、世界主义文化(1941 至今)。“地方文化”中讲及波士顿、费城与弗吉尼亚三个城市与地区。“局部文化”中有专节论文化民族主义(1815 - 1865)，并论及宗教对文学与政治的压迫。第三部分以思潮演进为线索，“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进步主义”，“从反社会达尔文主义到实用主义”，其名目颇诱人。战后部分有论“美国理想的恢复”(1954 - 1965)与“保守霸权”(1969 - 1992)的节目，惟独省去了轰轰烈烈的新左运动，不知作者何意。

印度记者 Dalpat Singh Mehta 著《大众传媒在苏联(*Mass Media in the USSR*)》，由苏联进步出版社以英文出版。既为苏联所出，当亦属王婆卖瓜者流。在封三上果然印着出版者的话：“西方‘自由’报刊、广播与电视经常指控在苏联没有创作自由、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这果真吗？在此书中 D. S. Mehta 讨论了苏联大众传媒的基本原则并介绍了其报刊、出

版社、通讯社与广播电视。Mehta 重点论述了创作自由，苏联记者是怎样理解它的，他们是怎样理解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建设性角色的，而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常是苏联传媒的焦点。”此书的有用处或在于介绍了部分背景线索。同样是传媒研究，格拉士高大学(Glasgow)传媒小组的《坏新闻(Bad News)》第一卷则对欧美各大传媒的节目与内容分时段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堪称真正的研究。此书由著名的 Routledge & Kegan Paul 出版社 1976 年出版。日本人 Taichi Sahaiya 写的《知识价值革命(The Knowledge - value Revolution)》由东京的 Kodasha 国际书店 1992 用英文出版，日文版刊于 1985 年。此书副题是“未来之历史”，有点故弄玄虚。写未来知识价值革命将带来一个全新的社会，或略近于今天所说的信息社会。其见识多平平，不过最后一章却有点惊人。他预言社会主义将被知识价值革命击败，社会主义文化面临大崩溃，因为社会主义乃是建立在工业社会的假设之上的，不能适应新的 Knowledge - value society。他并且推算出 90 年代将是一个新的后冷战时代。今天看来，他似乎是言中了一些东西。其中所提社会主义与工业社会假设的关系尤值得注意。

下午 4:00 半，天忽大暗似夜，户外三步之外不辨人面，长风呼啸起，有暴雨将至。赶紧收拾笔砚返回办公室，盖无伞，惧雨也。

傍晚动身至中国青基会送课题论证书。归时乘“面的”，司机 1950 年生，生得粗壮面黑，是个话多之人。录其言语以备思省，有时下里巴人的街谈巷议能给沉缅于书本与理论的人提供一种生动的印证或校正。

“……今天北大西门口也停着一车武警。不知是什么事。国家大事我也不想问,我也不想知道,知道了生气。有时不知道心里还平衡一点,知道了心里不平衡。过去听新闻,虽然里面有很多假话,但听起来像是真的;现在虽然真话多了,焦点访谈,但也不想听。……我这一茬人亏透了。1960年挨饿差点没饿死,什么坏事都赶上了,最后还赶上××下海,××下岗。我原来在工厂、机关都干过,最后落到副食品公司。公司已被个体挤垮了。八几年时,我一个朋友约我下海做生意,我媳妇不干,说你就守着共产党这碗饭踏踏实实地吧。现在我再问她,她也没词了,说你好歹得干点什么呀。这不借了钱,买辆出租开。一天倒稳挣100多块。当初我们是怎么给共产党干的呀,毛主席说:上山、下乡,我们就干它10年。现在小50了,身体什么毛病都出来了,共产党那点恩情都没了:劳保没了,病也不给瞧了,大病统筹也都没了。我那做生意的朋友,见天吃喝玩乐,把看这个(示意方向盘),拿着这个(比划手机),搂着这个(指小姐)。得,咱也别羡慕,谁让你当初胆小呢。……为什么很多做生意的现在不太坑人了呢?因为他坑人已经坑够了。甭管是坑共产党,还是坑老百姓,他当初都是靠坑人发财的。现在他有一定财产了,不愿意再去冒险违法了。当然他也小小不然地违一点,但不会大违了。……老百姓现在不关心政治。甭管你胡耀邦、赵紫阳还是谁谁,只要你让老百姓生活提高,就拥护你。原来挣两块五,现在挣四块,说你好;原来挣四块,现在你让挣两块五,你玩操去。……别看毛泽东让干活,大家都还不骂毛泽东。那时候人有人性啊,看见老头、老太太摔倒,赶紧上去扶起来;现在,躲得远远的,生怕沾上。那时候干部和老百姓距离没这么远啊,现在两极

分化。……我这人乐观。我这茬人已死了不少了,前两天又死俩,小金子(不知何人)也死了。老天爷要收我这茬人啦。我今天不想明天的事,明天烦人事明天睁开眼睛再想。”

我一直保持与出租司机聊天的习惯,并从中获益不小。他们的话不管对与错都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就是我所研究的文化与社会本身。

1998年6月11日:书目(上)

70

下午 2:30 入外文阅览室。所选座位正对着两排书架的夹隙,阳光从西窗晒射进来,经过这夹隙正好达到桌边,读书可受日光接济。

Janet Wasko and Vincent Mosco, edited:《信息时代的民主传播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Garamold Press, Toronto, and Avlex Publishing, New Jersey. 这本讨论民主与传播关系的书其主题正中下怀。大众传媒从来号称是民主之剑,但亦被人攻击为控制之锁,对这个问题的仔细辨析颇费周折。信息时代以来问题更加复杂化。该书的理论部分有“传媒与社会参与”、“传播领域中的批判学派”专节,大约就是从利弊双向来谈论传播与民主关系的。而第二部分“信息时代技术”则有 Giovanni Cesareo 执笔的《隐私与密秘:社会控制与信息体系中的民主展望 (Privacy and Se-

crecy: Social Control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Information System)), 将社会控制分解为权威控制民众与民众控制权威两种对立的形式, 并分析了这两种形式在信息时代的实现及其困难。最后一部分是“传媒与第三世界”, 谈论了马来西亚、秘鲁等个案。同类书中的另外一本, 《民主与大众传媒(Democracy and the Mass media)》也是一本论文集, 由 Judith Lichteberg 编辑,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版期早于前书两年(1990 年)。其文题大同小异, 惟第一篇《自由派限制个人权利? ——接近规范缘起与原因反观(Liberal Constraints on Private Power?: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s and rationale of access regulation)》看起来颇有新意, 其作者叫福尔摩斯(Stephen Holmes), 观其名姓似能发人所未发者。

传媒道德, 正像《新闻与传媒中的道德问题(Ethical Issues in Journalism and the Media)》一书(Edited by Anolrew Belsey and Ruth Chadwick, Rout 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2)所说的那样, 是一个从来有之的问题, 因为传媒从来就与自由、民主、真相、客观性、忠实、隐私这些基本的伦理问题密不可分。这本书所收文章有三篇值得注意, 一是 Bruce Hanlin 的《业主、编辑与记者(Owners, editors and journalists)》, 论述传媒的所有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编采人员并进而影响新闻质量。二是《妇女与报刊(Women and press)》(Teresa Stratford 著), 作者为女性, 见出女权之眼无处不到的厉害。三是《有些事情比真相更重要: 战争报道中的道德问题(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truth: ethical issues in war reporting)》(Kevin Williams 著), 未及浏览, 望文生意大约是为战时新闻限制辩护的。福克兰群岛与海湾战争中英美的新

闻限制颇招争议。如果可以为了打赢战争而限制新闻,那就说明新闻真实与客观可以不是绝对的,可以服从于某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个缺口即使小如蚁穴,也否定了真实、客观性这个大堤的基础,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说是一个 All or Nothing 的问题。战时新闻限制在现实中难以避免是一回事,而从伦理上肯定其正当与必要又是另一回事。并非所有人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事都有伦理上的合法性。

1998年6月12日:书目(下)

昨天中午在“金师傅”牛肉面馆等饭时翻读 L. Z. Habson 的《First Papers》是一本砖头样厚的小说(Random House, 1964),是上周末在北大东墙跟碰见,对此人此书并无所知,只因见是兰登书屋所版,即以 11 元买下。这部布面小说的开头即写一个文人(an editor, lecturer and teacher)因自己设计自己的房子而与妻女大起冲突的情节,恰着我现时的恼处。关于房子的选择我正与玲玲争执,各不相让,最后成为为争而争。我想大概愚夫愚妇就是这样造就的吧。

早起 8:05 进外文阅览室。可以一直看到下班,今天无杂事纷扰。有一种天长地久的从容与愉快。Imagologies: Media Philology, (Routledge, New York, 1994),这本书是一本奇书,没有正常论著的形式,全书花里胡哨地印着各种形状的字母与图画,时时夹杂着两位作者 Mark C. Taylor 与

Esa Saarinen(从照片上看后者亦男性)的通信。折叶的评论说此书一反学院传媒批评以否定为主的传统,力图建立传播学的新概念与新词汇,并说它对教育的前景、知识分子在电子传播时代的角色问题有创见。有无创见不得而知,因为此书虽然空白辽阔,但正文部分字号却太小,令人怀疑作者实际上是畏人细读而以小字拒之:我对小号字的确畏之如虎,能躲就躲。只是浏览了一下 Mark 写给 Esa 的最初的一封信,叙述为此书寻经费的最初过程:“我去找我们发展办公室的主任,我讲述了你的兴趣以及电脑中心人们的热情。他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这将花多少钱?”看来全世界学院管钱的人都是一丘之貉。这封信旁边的黑地上用白字印着一句格言(黑纸白字):“I'm what I buy”,却是挺隽永。书的封底用不小的字也印着一句格言(却是白纸黑字):“Where would Socrates hold his dialogues today? In the media and on the net。”这倒是给今天传媒写作者以鼓舞与提升。

74

多人编辑(M. Gurevitch 等)的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2)介绍了众多的文化与传媒理论。其中 Tony Bennet 的章节对米尔(J. S. Mill)的介绍颇详切。米尔最大的担忧是政府的民主形式可能会带来一种新的专制类型:多数专政,即主导性(多数)的意见与情感会将自身强加给少数异见者,会阻止所有与自身不和谐的个性的形成,会逼迫所有个人依据它的模型时髦化。米尔在《论自由》(*On Liberty*, 1969)中强调有别于阶级、地区与职业的“个人性”,他认为个人性已被市场的发展、被民众教育、被新的传播方式与手段所模糊了,他甚至认为民众教育与大众报刊并非启蒙的工具而是降低下层人民智性水准、培养

道德与文化庸人的方式。饶有兴趣的是,米尔还认为在这种新的专制的实施中“大众”自己远没有那些自我满足、处于浅薄陶醉之中的中产阶级尽力、得力。这本多人著作还以成组的文章讨论了昨天读到过的主题:传媒所有者对传播的控制问题,其中也涉及到大公司对传媒的影响、传媒与文化依赖。

1998年6月15日:览书忆旧

76

据说买旧书的诀窍是勤逛,隔三差五地到旧书店走走才能撞上奇书。我逛得不能算勤,但昨天在玻璃厂,一本即使不能算奇也至少可以称妙的书还是被我撞上了:是 *Aspects of the Novel* (汉译作《小说面面观》) 在美国的初版本。这本书是福斯特(E. M. Foster)1927年春在剑桥三一学院克拉克讲座上讲稿的汇集,而我购得的版本也正是纽约哈克特、布雷斯及其伙伴出版公司1927年所刊。至于这是不是全世界最早的版本就难以确证了,因为我曾见过葛林先生对此书的一段摘译,他注明是译自1927年的伦敦版(见外语教学与研究版《司各特研究》)。伦敦版我没有见过,不知其详;但纽约版标明是原始版权,想来它不应晚于伦敦版,至少也应是两地同时出版吧。这书在中国无论如何算是珍本了,但标价只有30元。店主的心黑是不用怀疑的,店中3册《人世间》的合订本

他就敢标价 4000 元；他之所以这样轻易地饶过我，大概是因为他不了解这书的译本曾在中国多么风靡、不了解此书的价值吧。

这本书在 80 年代曾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学界，在批评圈子里更有“开言不谈福斯特、纵读小说也枉然”之势。当时流行的是花城版苏炳文译本。译本用纸很薄，所以书是小册子的模样，读者没有压迫感，而封面上福斯特吹胡子瞪眼的漫画像，更使人觉得亲切。该译初版于 198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就达 81000 册。其时批评界之所以着迷于此书我觉察到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它恰逢其时地提供了对小说进行有效分析的新手段。数十年间批评家们惯于对作品进行单调的社会政治评论（这被美称为“社会学批评”，颇为社会学家见笑），至此熟而生厌，陈词滥调在重复了多年之后已面目可憎，大家都想开始一种纯文学批评和真正的意义解析，用行话说是“真正进入作品，不要再在作品外围打转”。这愿望当然很好，但老一套要想革除谈何容易，在你没有切实掌握新的分析方式之前它照例依然故我。不得已沿用老调却又不信服它，文章也就写得形神皆散，死样活气。更尴尬的是那些坚决不愿再弹老调却又找不到说新话途径的批评家，拿到一部小说大有“狗咬刺猬无法下口”之恨，只好痛苦地沉默。福斯特一来情况就大变了，他的书不仅指示了幻想、预言、图式与节奏等全新的小说评论角度，就是对人物、故事、情节这些大家早已熟知的小说要素也有别开生面的发见。“我们曾给故事下过这样的定义：它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事件的。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果关系罢了。如‘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去’便是故事；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伤心而

死’则是情节。”(苏译本第75页)。这些话都新鲜得很,使人不禁豁然开朗。一个英国人20年代的话,于60年后才作为惊人的福音在中国文学界发聋振聩,真让人感慨文化传播的艰难与诡异,细想起来真是亦喜亦悲。当时我们阅读中完全忘记了,甚至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竟是二几年的书。

80年代批评界着迷于此书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对于小说的许多分析恰恰切中了中国当代小说的突出症状,给批评家准备了进行文化批判的利器。我们知道文化批判乃是8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大特点。比如福斯特把小说人物分为“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他称“扁平人物”是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是按一个简单的意念被创造出来的;而“圆形人物”则充满了丰富性乃至复杂性,给人以真实感和不断的新奇感。中国批评界在阅读中自然对这两种人物加上了强烈的价值判定,对“扁平人物”的鄙视与谴责顺理成章地成为对“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对“三突出”原则乃至对整个文化专制主义的揭露与声讨。那真是一个以文为兵的奋斗的年代啊。

奋斗的年代也往往同时是粗疏的年代。苏译本没有附英文的版权页,因而我们不知其所依的版本。纽约本中的著者说明没有译出,说明中言之凿凿地说,这个系列的讲座是1927年春的事,而苏译本的“编者的话”中却说成是“1926年秋至1927年春”,想当然耳。*Aspects of the Novel* 译成“小说面面观”也有问题,novel专指长篇小说,福斯特定义为“5万字以上”。将novel概译成“小说”,是抹杀了短篇小说(short story)、中篇小说(novelette)以及长篇小说本身各自的文学特性,可以说明那时候对小说的认识还处于混沌和幼稚的阶段。

1998年7月10日：人作为困兽

读任洪渊的新书《墨写的黄河：汉语文化诗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于任洪渊先生的文章我们其实是无话可说的，我们只能满怀惊异地观看并欣赏，如见龙飞，如见凤舞。任洪渊不是以解释和对话的口气在写作——像我们这些谦恭而拘谨的文匠那样，他是在宣布，在宣告。“不是由于蒙娜·丽莎神秘的笑，她的唇边才有笑的神秘，相反，是由于她笑了，蒙娜·丽莎的笑才没有在嘴角枯萎；不是蒙娜·丽莎的笑照亮了她的笑容，而是她的笑照亮了蒙娜·丽莎的面容。她的笑才是最初的。”——这是在写爱人。“她的小手指着夜空最圆最亮的一点。那是什么？月亮。她便欢呼地叫着：月亮！月亮！在她的叫声里，抛在我天空的那么多月亮，张若虚的，张九龄的，李白、苏轼的，一齐坠落。天空只留给我的女儿升起她的第一轮明月。”——这写的是女儿。谁能跟他争辩说不是

这样的呢？任洪渊超越于一切争辩、商榷、研讨、切磋与评选之上，他是一个宣告者。最初的宣告者是上帝本人，“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在上帝死去之后，诗人承袭了他的职责。任洪渊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彻底的诗人，他不像学院里那些所谓“既搞创作、又搞研究”的诗人那样把诗作为一种羽毛或包装（恕我不得已地笔落实处），诗乃是他的气质、灵魂和一切，他不自禁地把这册按惯常分类只能说是“理论”的书也写成了诗。他以诗人而履践上帝的角色，但他却并不试图去做一个精神的救世主和立法者，他并不想规定他者，他只是在建构自己的意义世界，他只不过是向芸芸众生做一种演示：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必须成为自己的宣告者、创造者并通过宣告和创造成为自己的救赎者。这就具有了几分佛性。真正的诗人是一个有佛性的上帝。

让那些被电脑阉割了利比多、被信息淹没了生命之火的学人先生们对诗人所演示的真理对面不识吧！让他们对任洪渊的文章摇头、指责其荒唐吧！“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从任洪渊作为一个宣告者的声音中读出了一种真正的悲愤，读出了一种悲怆的弦外之音：人，这个被时间与空间、文化与历史所囚禁的困兽，除了宣告还能做什么呢？我们降生就被时空所定义，我们张口就被文化所定义，我们活动就被历史所定义，谁来证明此世此生此人的真实性与严肃性，谁来证明我是一个真正的我呢？谁来捍卫爱、触摸、明亮的眸子、轻盈的脚步、悸动的心灵这些美丽的生命此在的尊严呢？难道这一切都是回声、是影子、是复制、是虚幻吗？依靠人的理性战胜这种囚禁是一种虚妄。人的理性及其源泉就来自进化、来自积累、来自自然甚至来自偶然，

它就来自阴险的囚禁本身。“树再大也大不过山,星星再高也高不过天”,被造物再痛苦的挣扎与搏斗也超越、摆脱不了它的制造者。“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里的上帝就是人及其理性的规定者与制造者,是囚禁的象征。在微弱而又无望的理性的映衬下,我更相信激情、活力与诗性是上帝的秉赋,是创造者的秉赋,是一切囚禁都囚禁不住的解放的力量;如果说上帝造人曾经仿照自己的形象,那么人和上帝的相象和相通之处就是诗性。诗性是错误地投射于人身上的、上帝(魔鬼?作为魔鬼的上帝或作为上帝的魔鬼?)手中漏光的所在。理性只不过是对一个异己的黑暗世界战战兢兢的摸索,而诗性则是对世界的拥抱与占有。我们由于这来自上帝的诗性成为上帝,我们依凭这来自上帝的诗性战胜上帝及其囚禁。上帝说“我宣告”,就有了世界;人说“我宣告”,才有了人;我说“我宣告”,才有了真切的、体验着风花雪月、风霜刀剑、悲欢离合的我。

81

或许这一切表达(宣告?)都不过是老生常谈,是对古人的重复。或许。然而,诗性是永不老旧的,对诗性每一代的体验和认知都是新鲜的。诗性的不可自然承继,必须靠从新的经历才能重现正是它独有的特性,它就在,也只能在这一代又一代人,一个又一个人的重新经验中获得意义。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它是功能性的而不是知识性的。所以任洪渊书中提到的德里达、尼采对于他说只是一个榜样而不是替代:任洪渊的书对于作为读者的我,对于每一个作为“我”的读者亦复如是。

再 入 日 本

1997年11月18日：伊势物语

这两日在京郊二十一世纪饭店，中方和日方分别对我们这些即将启程的访问者进行了教育。日方介绍情况的有日本海外协力集团(JICA)的代表，他希望这次被邀的访问者将来能为中日友谊做出贡献，不要辜负了邀请者的苦心：“这也是我们的投资啊！”他把话说得这么直白反而让人们对其邀请动机的猜疑解释了。驻华日本使馆年轻的一秘垂秀夫讲话有点意思，他省去了“友谊”、“合作”等外交辞令，也省去了就访问说访问的官样文章，而是介绍了他对日本社会的认识。他一开始就申明他的话不代表大使馆，而是他与朋友研讨的心得。他将日本权力结构分为政界(国会议员)、官界(公务员)和财界(企业家)三个集团，这三个集团互相的、连环的制约维系了权力的均衡。如果这三个集团中的某两个勾结过深致使平衡打破，那么社会舆论(传媒)就会谴责，并动员、鼓动国民的批

判情绪。就整个社会而言他又作了分类,分为官政界、财界和学界,即我们平常说的官、产、学,这三界分别成为权力欲、金钱欲和名声欲的最高实现者,也就是说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以获得某种基本的满足,不会有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者、受害者。他认为这种权力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均衡是日本社会得以稳定的原因。这些观念或许是拾了社会学家的牙慧,但从一个外交官员的口中说出仍觉可喜。

在接待我们的日本海外协力集团的职员中有一位 40 多岁的女子,胸牌上写的是“西园寺香月”。本世纪上半叶日本有一位政界和学界的元老叫西园寺公望,在日声名极其隆盛,30 年代郭沫若流亡日本时颇得此老欣赏提携,这种提携竟对郭氏命运发生了极大影响。我问西园香月女士同西园寺公望是否一族,她答曰是。见到名人的后人竟有见到名胜古迹的特别的感觉。

今天中午于会间的闲时我读完了《落洼物语》一书中所收的另外一篇物语:《伊势物语》。日本古代有伊势国,但有论者认为此处的“伊势”非关地理,“伊”指“女性”,“势”指男性,“伊势物语”即男女之间的故事。这部中篇物语是 10 世纪的产物,作者为谁众说不一。有定论说书中人物多影射日本古代的一位王子——在原业平,但我更愿意将它看作是写五花八门各色人等的故事总集。全篇分为 125 话,互不连续,每话都有一个独立的人物和情节。话均极短,故事根本没有展开也无所谓头尾,更谈不上情节冲突,有的只是简单和平淡。如第 85 话全文如下:

从前有一个童年男子，和一个稚龄女郎互相爱慕。两人都有父母管束，顾忌甚多，这恋爱就中途断绝了。过了几年之后，女的希望这旧日的恋爱获得团圆，重新向男的求爱。男的便咏一首诗送给她。送她这样的诗，不知是什么用意。诗曰：

“久别犹相念，人间迄未闻。

只因经岁月，彼此相思频。”

两人的交往止于如此。听说后来男的和女的在宫中同一地方供职。

读这般文章真要让人生出同文章作者相近的的思量：“这样的物语，不知是什么用意。”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但中国笔记小说或极真实，虽平淡却志在存真；或志神怪，虽虚构却悚人听闻；均有可以依凭的明确的目标和指向。而如《伊势物语》这样虚构而又平淡的小说真是让人费解：既虚构而又平淡，岂非辜负了这虚构？这样虚构小说的作家简直是在明目张胆地“以无事取天下”了。然而唯其这种不合理、不寻常的平淡才使人颇涉遐想，才使人觉得大有深机，才使人反复玩味仍不忍释手。平淡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就会变得极不平常起来，比挖空心思、心劳日拙地追求险奇更显得不平常。这大概同俳句所秉赋的艺术传统同出一辙吧，这里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诱人的神秘。

《伊势物语》当然最耐玩味的还不是话本身，而是话中的和诗。此篇物语被称为“歌物语”，每话中都有诗，诗构成了可以说是最有神采的部分。不读此中的诗我很难想象日本人在10世纪就已有了这样深入而细腻的人生体验和如此真切传

神的表达。如第 81 话所引的咏樱花诗：“花开人踊跃，花落人伤心，灭却樱花种，一春庆太平。”“花开人踊跃”一句竟这样生动地使形象跃然纸上。全篇结束的两话同样地表现了诡异而深刻的观察体味乃至禅机：

第一百二十四话

从前有一个男子，不知他心中有什么深思熟虑，
咏了这样一首诗：

“若有心头事，沉思勿作声。

只因人间世，没有同心人。”

第一百二十五话

从前有一个男子，生了重病，自知即将死去，咏
了这样一首诗：

“有生必有死，此语早已闻。

命尽今明日，教人吃一惊。”

对体验和情感表达的程度也就是人性完成的程度，是人进化的尺度。或许歌物语中的歌乃至整个和诗都是对中国艺术的一种学习，但像古代日本那样蛮荒的岛国人类能够借他国文化完成这样的自我塑造已是堪可喜怜了。我爱读日本古代的作品，读日本的古代我能够有纯粹的欣赏的眼光，因为那时的日本对于中国人来说还处于无辜天真的黄金时代，那时面对樱花的感伤还没有化为大规模的、兽性的残暴。日本人的原罪是从 19 世纪尤其是甲午海战开始的。南京大屠杀之后不要再说起日本艺术的美丽。

1997年11月19日：东京入境

86

东京的宾馆都有台灯，使人相信这是一个民间普遍有阅读习俗的国家。我现在在台灯下给你写信，我的同屋阿炳坐在沙发上看放在我头侧的电视，正放映着一个宽银幕的日本故事片，阿炳也听不懂，瞎看。有人说到异国旅行应该尽可能地多看，不放过任何一分钟，不可把时间花在写信叙事上，即使游记也应该过后再写。这其实是一种随口的白话。看到的东西不写出来往往就等于没有看见，目之所见需得经过心之眼才算是真正的目击，写作就是一个过心的过程。写下来是一种牢记，是一种反观，是对视野的清点与接受。只有反观了的东西才能成为积累，只有通过反观才能战胜盲视和遗忘。还有人以崇尚深入研究为由而轻视走马观花的游记，而实际上人的旅途偶遇带有极其难得的自然、真实、生动的品质，其丰富性与准确性往往超过了那些经过了过度的、长久的理性

汰选结论。人们往往过分迷信理性与理论，殊不知理性与理论有它们的自重与本色，用以衡量与透视不无歪曲之弊；且理性往往归于成见与定见，对原始的第一手材料常有粗暴无理删除。——总之我推崇一种即时的反观，当日事当日记。孔夫子说“再思可矣”，这确为至理，不重视即时的反观就有可能陷入三思之感。当然即时的反观与再思也可能难逃理性与理论的羁绊，也会落入定见和俗见之中，这时候或许又得依靠三思来解放了。知识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求知难免首先跌入知识论的泥淖之中——且让我斩断疑虑，随缘叙事，以解困乏，以慰思念。

今天东京时间晚 6:46 到达千叶县的成田机场，比预报的时间推迟一分钟。成田机场整洁如新，其一尘不染的面貌很象是刚刚经过中国那种为迎接参观与检查而大动干戈的大扫除，很难想象这种整洁竟会是司空见惯的日常景象。我仔细地观察过旮旯角落，清扫修整亦异常精心。到了 90 年代末，发达与不发达的区别也许仅仅在于是否能够将角落打扫干净。成田机场的行李车是新式的，按下把手即可推动，松开把手即自动闸住。北京国际机场还是自然滑动的那种。发展越来越变成了细节与细部的完善。

机场出港与入境的大厅里均空旷寂寥，我们这一撮人来到出港摆渡车站的大玻璃门前等车时竟显得孤零零，恍然之中好像是在瑟瑟寒风中来到西伯利亚偏远地区的某个小站等火车。入境处分为两截，区分日本人与外国人。我们的领导西园寺香月小姐站在外国人的入口处不住地向我们以手示意，口中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日语；一伙日本人本来正向日本人

入境处走去，见有人指挥竟也改向外国人区域走来，慌得西园寺小姐连忙又打手势又喊话，指挥他们重回老路。日本人真是个“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民族，见指挥就听。“日本人”与“外国人”的标志赫然写在头顶，但日本人是宁愿相信别人的手势而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的。

外国人入境处的便衣纠察似乎仍是我两年前来时的那位，要不就是这种职业本身就塑造同样的面孔与体态，反正我看着这家伙格外眼熟。他穿着蓝色的制服裤和一件过分窄小的灰西服，有点不伦不类，且面色死板，不苟言笑，仿佛谁欠他多少钱似的。他不时地对入境者做着手势，指挥人站在“next”的位置上，似有一种神圣感。大日本帝国让这么一个活宝看守国门真是丢人。或许日本人本来就是这么小气，选这样的人正是得其宜哉。入境处悬挂着外务省东京入境局的标语：Enjoy Your Stay But Please Follow the Rules. 这样先说丑话透出一种内心的紧张，见出好客心的局促与有限。守法是常识还用得着这样巴巴地提醒吗。人脸往往是民族文化最生动的表达，外国人入境处便衣纠察那张脸就是日本文化的写真与招贴。入境处前的大厅用软带隔离成七折八拐的回路，活像一个迷魂阵。

入境后进入机场的前厅等 bus。柜台里咖啡豆、巧克力等小包食品 400 - 800 日元不等。一个长沙发上坐着一个高个子白人，把脚高高地翘在面前的行李箱上，两手拿着一本英文的 bestseller 在看，一望而知是个美国人。美国夹着 best-seller 走遍世界，在公共场合把脚高高地翘起来。这种人有时可厌，但在日本在成田机场也不失为对日本人的一种绝妙回应。美国人高高翘起的脚消解了日本人紧紧绷着的、庄严神

圣的脸。

自成田机场至东京原想走两个半小时,结果一时三刻就到了大都会饭店。进入东京都后正是晚 8:00 多钟,公路旁的写字楼里灯光通明,透过玻璃窗望去,似乎每一间办公室都有人在桌前加班,街上行走的人也都是夹着公事包、穿着黑西装的上班族,似乎刚刚加班归来。在大都会饭店住下后我特别想喝日本面汤,就出门游逛,约晚 10:00 左右寻得一个巴台式样的面馆,两个白衣白发白眉的老头在紧张地边做边卖。一大碗白菜汤面 700 日元,边吃边看两位老头张罗着热气腾腾的不锈钢面锅与汤桶。台上放着调味料标明是“唐辛子”,大约是中国辣椒或芥茉吧。面汤的滋味和面馆的气氛使我倍觉亲切,前次来日印象最深的就是面馆。仿佛我一次次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到日本就是为了来吃面条,吃这数百日元一碗(450-950 不等)比中国也未见得怎样高明的面条。人生真是不可测啊。

1997年11月20日：古本大学

今天一天主要是三件事：开幕式、介绍日程、学日语。开幕式发言桌两侧斜坐着中日双方的代表，这与中国开会时横排正坐的主席台不同。海外协力集团的一个部长代表东道主致欢迎辞，他追溯了中日两国人员交流的历史，感慨从前的古典交通时代，两国国民是踏着汹涌的波涛，冒着生命危险才实现互访的。一语生情，这种联想使今天北京到东京平庸的飞机之旅也有了几分声色。中国方面的代表、外交部参赞麦国彦发言，他说昨天自成田机场至东京大都会饭店时路遇迪斯尼乐园缤纷的礼花，好像是欢迎我们的到来。这才真叫扯淡。

介绍日程占去了太多的时间。本来在动身前已发给我们一个详细的日程表，细到小时，到日后每天又都要发一张次日的日程表，每种日程表上都详细地列着注意事项，如，着装方式、乘车地点。有了这些繁琐的表格仍然要面对面地一件件

地讲解,日本人做事也真是细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史载京都仿长安而建,连城墙的厚度差了几分都要推倒重来。迂腐本来是可笑的,但迂腐到这种程度就有了几分可惊可怕。或许在这种一丝不苟、有时还显得并无必要的细致之求中藏着某种道吧,日本人就以蚂蚁工作的细密建造了它巨大的经济共同体,成为庞然大物。外交部日本处的人员给我们交待说日本人心细如发,在会场喝完水杯子是不是放回原处、拆开信封那两枚小小的钉书钉是否收拾起来带走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极为在意。

这次学日语是生学。既不学假名,又不学语法和书写,就是硬将句子用毫无逻辑联系的汉字或英文音标注出读音,记一句算一句。这样的学习超过一个小时、十句话就使人昏昏欲睡,如果还没有被它逼得发疯的话。日方坚决要求与日本青年见面时要说日语,这生硬学来的日语根本不能增进我们对日本语言和文化的了解与感情,它仅仅能满足日本人听外国人说本国语的虚荣心。日本人的 bubble。先天的被歧视恐惧,是既小且岛的国家的天性?

今天晚饭后外出散步,天下着蒙蒙的小雨,似有似无的小雨,街道满是湿漉漉的都市灯光。我们住的大都会饭店(The Hotel Metroplitan)邻着东京大都会剧场,有汽车停在 PARK 处,也不知里面正在上演什么。日本政府将我们万里请来,也没有安排我们观看一下日本的艺术,东京所有的晚上都闲置,闷得同团的政府公务员的打扑克消遣。日本政府真是舍不得花钱啊,就连民宿也多是志愿者。沿街直行(盖因道生不敢拐弯抹角也),见一个霓虹招牌“古本大学”,以为真是一所什么

大学，定睛一看却是一家书店，玻璃墙展示着店里满架的书。见书店不禁心生一喜，踱进去挨架翻将起来，翻了两册见书页均已发黄，原来这是家旧书店。在日本逛旧书店是我此行的梦想之一，谁知竟这样无意得圆。“古本”非虚言也。先看到的当然是日文书，有一本《日本食物志》卖 300 日元。若不是不懂日文且携带不便，这样便宜且古怪的旧书岂能不买回。还有一本《韩国民间生活史》(200 日元)，其题亦诱人不浅。有这样好的日文书使我心生奢望：这样有品味的老板或有好的英文旧书出卖。转过身去果然发现了两架英文。英文多是侦探与言情小说，粗粗浏览一下好书不多，不过仍然发现了一本 Bradford Smith 的 *Why we Behave Like Americans*，是研究美国民族性的(封面介绍：An original and provocative analysis of America's national character and culture - what we are like and how we got that way)，才 150 日元，当即买下。书店老板一口纯正的美音。同行的阿炳在催促我去逛商店，只好将这书店暂时放下，明天我定要抽空自己来细细翻阅，以贻足我心。在日本买英文书的经历想来古怪有味。这本书的一个书角有经火的焦痕，平添了几分古意。而这书的作者 Smith 曾在日本工作 5 年，给大学生教授英语，书出版于 1958 年，我看见扉页上一个小小的圆形图章乃是“相马”。没准儿相马先生是 Smith 的相识也说不定。书店给书的包装是一个纸袋，印着童话般的图画，一个小姑娘在野外的树林边看书，坐在一个极宽大的椅子上，大椅子和小姑娘相衬成趣，附近一只小鹿在呼唤远处的鹿群，鹿群竖耳抬头顾盼。

雨下得紧了，没有带伞出来，就沿屋檐下的街边回店。饭店的另一侧昨天夜里我已单独逛过，是一个街心公园，中有不

锈钢粗管高高举起的铜塑，是群塑，有立腿欲跳的蚂蚱，伸头伸脑的乌龟，呆立的猫头鹰，裸体狂奔的女人，还有折茎的喇叭花。初看我不解其意，走到公园的另一侧发现又一个塑像，是一个放飞鸽子的女性，一人多高的石座上刻着“和平女神”，一旁有碑，碑上的日语中我能认出“核”长“核”短、“受害”来“受害”去的汉字。我明白了那蚂蚱、女人群塑是记录原子弹爆炸的景象。走在这个公园里我心情复杂。日本因为美国那两颗原子弹的缘故时时处处地高喊和平，俨然是和平最有力的呼吁者与捍卫者。和平当然没有任何错误，但和平是抽象的而喊和平的人却是具体的。战后有两人呼吁和平：一是受害者，如中国；一是伤害者，如德国。受害者喊和平正是一种沉痛的正义，而伤害者以深刻的忏悔来吁求和平也代表了人类良知的胜利，代表人类向新向善的希望。但日本人喊和平的身分却十分暧昧。它的确是原子弹的受害者，然而它却忘记了在它受害之前，它首先是一个伤害者。只记得广岛长崎之毁，不记得珍珠港之袭，对南京大屠杀以及在中国无数无名地方无以复加的暴行更是讳莫如深。它只有控诉而没有忏悔，它所喊的和平听来就不是滋味。正如毛泽东所说，常规武器杀的人并不比原子弹少，而且我还要加一句：常规武器甚至更原始的大刀、刺刀杀人未必没有核武器惨酷。我今年夏天考察京杭运河在中国的许多县、乡寻得的史料中，最骇人听闻的就是日本军人对中国平民随意的、残忍的屠杀。我发现中国人的性格在经过八年抗战后变得凶残了许多，分析抗战前后两次土改的细节与情节即可见出这种明显的改变：我认为这种凶残化就是日军兽性化残暴统治的结果。日军的示范使中国的民性为之一变。我希望日本能首先确认自己是一个伤

害者,然后大家才能同情地承认它是一个受害者。它在广岛的战争纪念设施旁应同时开设一个忏悔道场,为它手中的死难者,也是为人类清白的良心招魂。

但要日本人做到这一点很难。我看到公园雕塑的不锈钢圆柱上贴着一个讲演通知,题目是“中国、韩国之历史歪曲”。这柱子成了日本人对中国的谤碑。

1997年11月22日:江戸

这几天疲劳开始积累下来,走得多,睡得少,坐在桌前就犯困。今天是实地日语学习日,由日本志愿者带领去我们感兴趣的地方。我感兴趣的是上野的日本历史博物馆和浅草的寺院,但敌不过同组团友的坚持,第一站还是去了秋叶原。秋叶原是买便宜东西的地方,在那里打头碰脸遇上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来日必先秋叶原的干活,秋叶原成了中国人的圣地。这次我们一出地铁站口,就碰上一个中国男子在散发商店的广告,说“是咱们外经贸部办的,请光顾”,一口山东口音。我们也没有“光顾”,没有跑到日本来买中国国营商店的东西,在中国受国营店的气受够了。在秋叶原原定半个小时,结果却滞留了一个半小时,而吵着要来买东西的人一件东西也没有买,倒是我完成了你交给我的任务,花了38000日元买了一架柯尼卡照相机。我看标的原价是53000日元。陪同我们的

志愿者海老沼德子小姐推荐我买这个牌子，并且代我讲价砍去了1000元。海老沼德子是东京一所什么大学的法律系的研究生，这一次教我们学日语，并且她母亲、姨妈也和她一起出动。她们3人都会说一点英语，不过日本口音的英语真是难懂。我们对短期这样学习日语毫无兴趣，完全是汉字注音，将“请”注成“都走”，“谢谢”注成“都摸”，学完就忘，因此我们总是试图将这样的日语学习变成英语会话或者观光。但海老沼德子的妈妈责任感很强，她总是记着把我们从英语中拉回日语，告诉我们“Please try to speak Japanese”，指着旁边的事物告诉我们日语发音。又一次领教了日本人的“一根筋”精神。

从秋叶原出来我们去了浅草寺，然后又去了东京湾。浅草寺很小，全寺院只有一个大殿。东京湾很大，大得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只有一座座不知联接什么地方的大桥凌空而起，颇有兴旺发达的雄伟气象。倒是在浅草寺求得一个吉签，是吉信不可不报，判词云：“似玉藏深石，休将故眼者。一朝良匠别，方见宝光寒。”我喜欢最后一个“寒”字。

昨天的日程主要是参观江户东京博物馆。东京给我的印象原来是庞大而杂乱的，身处其中有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有一种迷惘而又陌生的感觉。但看了这个博物馆之后对东京的历史有了了解，知道了它是怎样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过来的，对这个城市顿生亲切感。了解绝对是一种亲缘。江户时代这个城市主要由町人与武士组成，对町人我或有知识，对武士却隔膜得很，因为中国没有这号人。本尼迪克特对武士精神分析得很透彻，将其作为日本人的主调精神，而戴季陶却说日本人

是武士与町人的杂交，不知何说可依。町人中国古来有之，而武士却是日本的国粹，大概中日两国近代化的一败一成就归因这个阶层的有无。10年前我听过一个日本学者的报告，他说日本近世执政的是武士，而武士是王阳明的好学生，果然是不折不扣地知行合一；中国是文士执政，文士敏于言而钝于行，且耽于言者往往被陈言所误，故面对近代化时思想多有游移，少数人终于想通了以后行动又很软弱。我想游移是的确的，初期近代启蒙中的“中体西用”就是明证；但日本人也说“和魂洋才”，这同“中体西用”说有无相通相同之处就不得而知了。今天夏冰过来请我吃饭，我问及此事时，她说根本就是两码事，但她也没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两码事。

不过夏冰的一个感受对我却很有启发，她说看江戸东京博物馆时深感中日两国历史观的不同。中国的历史总是以帝王将相为主线，而这个博物馆展览则完全是以庶民的生活变迁为标识和内容的，根本没有张将军、李大名什么事儿。这大概可以算作历史观中的官本派和民本派吧。不过我看这个展览注意到的却是日本历史结构中文化史的位置，江戸展厅中出版业占了1/3左右的篇幅。

由看这个展览使我联想到了城市文化研究。这个博物馆专门有都市文化研究室，见馆中所办的系列讲座（名为“江戸东京博物馆自由大学”）题目也多涉城市文化，如“东京社交研究”、“江戸民居研究”。居住大概算是体现城市基本面貌的事情了吧，江戸时代幕府和武士居于市中心，四周由町人居占，同中国不一样的是没有城墙，町人区扩展的天地是很大的。展览中见町人的居处“长屋割居”，很拥挤，一家人就住在一间长屋中，屋与屋也就是家与家之间只有一板之隔，根本谈不上

有什么私生活，介绍中还说有一个单口相声就是反映这种生活的。或许就是这种城市的拥挤培养了日本人的团体性？团体性的本质就是对他人的忍耐心，而没有比长屋割居更能培养忍耐心的了。

今天同夏冰谈起日本人的团体性与纪律感，她亦认为日本人良好的自我约束实际上来自人與人之间的互相约束。她说日本乡村从前有“村八分”制度，即将村中的越轨者开除出村，于是他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丧家之犬。本来现代城市应该是打破乡村禁锢的解放力量，在欧美城市化一个主要的结果是道德严苛性的缓解，因为在村中或小镇越轨就等于自毁一生，而有了城市就可以向城市投奔，在城市中人就如鱼在海。但夏冰说日本的城市却与此不同，在东京单位亦是一个终身性的背景；且不说许多人就终老于他 18 岁加入的单位，即使你改投新单位，它也一定要彻底弄清你在原单位的行迹，哪怕你没有劣迹，你也要受到新单位长久的歧视。这实际上就是“村八分”习俗的变种吧。这样的城市真是少有，连中国的城市生活方式现在也直逼欧美了。因为少见所以才更值得文化学家关注。

前天晚 11:00 我校在日本进修的小乔带着社科院历史所的陈勇来访，一起去挂着红纸灯笼的小酒馆喝酒，至深夜两点。有一种下酒菜叫“高登”，是用山芋磨成粉烧制而成，很筋道，说是典型的日本民间菜，大概是江户时代留下来的吧。这酒馆是榻榻米屋，屋里七零八散地挂着菜谱，是那种精心布置的家常与杂乱。贴在墙上的有名星招贴、类似灶神神符的不知什么东西（中间写着“御用挂”字样）。还贴着一张酒馆老板

的告白,大意是您在我们家不管吃什么,只要我们给您端上餐桌的都是美味的东西;您对这里的卫生也可以绝对地放心,在这里劳动的人良心都很好;由于小酒馆办得好,在这里劳动的人都很热爱它,每天都抢先来上班。——这是小乔给我翻译的。

1997年11月25日：神保町

100

3天时间才真是弹指而过。日程一项接着一项，被安排好的日子过起来不费劲，活得快。星期天早起上饭厅去时不穿毛衣，归后即感冒，3天来时轻时重，一来一往，今天才算痊愈。宝贵的旅行时间竟用来驱病。平时生病总觉过得慢，这次才觉过得快，盖惜时如伤也。看起来我是不太适应东京的气温：室内都有热空调，穿不住毛衣，带着室内的感觉出门就会受风。东京人看起来出门不怕冻。年轻姑娘穿裙装在街上行走倒不足为奇，一来她们本有爱美抗冻的生物本性，二来也穿着长袜；使我吃惊的是看见在初冬的天气中的小学生们竟穿着短裤或短裙的制服，膝盖以下完全暴露在风中。他们竟也活蹦乱跳，毫无瑟瑟之相。中国的父母心疼孩子，寒风未起即加寒衣，而日本的父母们竟放心地让自己的孩子冬着夏装。天下父母心竟如此不同。或许这样的着装是国家意志吧，孩

子们穿的是有类于军装的制服,受的是强迫义务教育。从小就受这样的非常训练,大概算是日本人军事本性的曲折表现。看了一部美国人制片的日本战后经济史中,有60年代经济起飞时“猛烈社”社员宣誓的镜头:头上缠着白布条,随着咆哮一样的口令狂奔集合,是一幅典型的战争画面,像二战中的神风敢死队;而猛烈社不过是工厂中志愿拼命干活的自由组织。你说你的日本熟人读汉语如同呐喊,而我在神保町街头的小饭馆中,见服务员小姐应客人点菜如同答口令,听客人招呼即奔跑而来,小小的饭馆竟成了服务员的操场。战后的日本社会虽曰已经军转民,但战争精神仍活跃健旺,经济对于他们来说倒真的是一条“战线”。人生如战场,进化即战役,站在超脱的角度你只能欣赏日本人的这种精神。严复译述了一部《天演论》,将竞争意识与民族自觉传达过来,中国人自己当成了耳旁风,而近代日本真是知而行之。

我想如果20年前我也受像日本小学生那样“野蛮其体魄”的训练,或不至于这样在东京因感冒而将息了吧。

读书人爱书的积习大概比旅行的冲动更强吧,我发现我这次到东京的访问首先成了访书。爱读书是现代学人的习惯,爱旅行是古代文人的天性。现代社会已没有了文人。虽然学的是中文系,你还能在10年的系友中发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文人吗?学人或有,商人正多,文人却已经绝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星期日是“自修日”,自由活动,我首先想到的是去书店街一逛。坐上JR线,看车内的线路图,我准备在神田站下车。坐在车内看旅行指南,猛然发现书店街不在神田而在神保町,

才恍然记起。神保町很背，我照两位日本小姐的指点在 JR 东京站下车，找通往神保町的半藏门线，东走西窜了半日也没有找到。这时又想要上厕所，于是就放下半藏门线先找厕所。顺着 W.C. 的标志前行了约 5 分钟，发现厕所恰恰就在我方才已出站的 JR 线入口内。无奈只好又买了一张 JR 的车票进去，上完厕所浏览地图发现在 JR 的涉谷站可以转乘半藏门线。从我的住地池袋到涉谷，按我走的顺方向走有十五六站，若走环线的反方向只有四五站。等于坐地铁环游了东京的西城，倒也是意外收获。不过时间耽误了不少，到神保町时已近下午 2:00，我出发的时间是上午 10:30。

神保町我最想去的东方书店不巧这日关门，挂牌说是劳动感谢日休息。街口的三省堂书店有六七层，较醒目的是文库图书，排得最多的是角川和岩波。外国文学部分有日译的中国小说《白鹿原》、《废都》，日本学人研究中国的书我看见有竹内好的《鲁迅》，藤井省三的《上海、北京、东京：1920 年的都市》。我最感兴趣的是洋书部分，可惜这家大店的英文书只占一角，且少可观者。英文书丰富的是斜对面的东京堂书店，上得它的第四层见洋书有半层之多，且分类很细，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人类学、文学批评都有专架。我挨架翻阅，见有不少对我有用的书，但标价吓人，动辄五六千日元，徘徊半日，终于只买一册 1300 元的成人小说而返。

神保町也有许多卖旧书的店，间或在书架中有一层是英文。有一家小店所陈列的英文书竟专得很，全是通俗音乐方面的，光有关甲壳虫乐队的书就有六七种。还有一本是解说 Blues 的，收有 200 多首 Blues 并附有分析。我随便翻看，见一首开头两句是“I trip, with bag on my back and sherrif on

my track(我旅行,行李压着我的背,警官跟着我的踪),”我觉得这有一种无奈而愤怒的情绪。还有一首正好是骂日本人的,说是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日本人是街上的狗,你喂饱了它它就咬你的手。”黑人们倒是碰到什么唱什么,天赖成趣。而且 Blues 唱起来有一种深挚的、触动人灵魂的东西。可惜定价 1000 日元,与别的店的英文旧书 300 元左右的价钱相去太远,忍痛割爱。1000 日元对我们来说已是一个买实用书而不买兴趣书的价格。我这次在东京寻觅的实用书籍主题限于现代文化研究和知识分子研究。

星期日有心逛书店竟无获而返,今天同阿炳去逛银座观光却买回几本学术新书:1.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2. John Hutchinson: *Modern Nationalism*. 3. Ian Buruma: *The Missionary and Libertine*. 外加一本非学术的 *Letters to pent-house*, 共 7700 多日元。几天来买得最愉快还是在街头偶遇的旧书店中买的英文旧书,除前几日报告者外,计有:《尼克松向国会听证会交出的他偷录的自己与幕僚的对话》(300 元)、《女性与语言》(200 元)、《肖伯纳剧集》(100 元)、《美国人这样想、日本人这样想》(150 元)、《文学与文化》(200 元)。甚至还有一本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书:《英语性词汇辞典》。食色性也,性词汇大概也算是理解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吧。

这几日经常自己坐地铁转悠,认清了各种地铁线的颜色标志。会坐地铁就在东京有了自由,对这个城市的陌生感与异己感随之消失。认清了东京的道路才算对它有了真切、真正的贴近。不过有时也迷路,尤其是晚上。昨晚去新宿,想找到上次来东京住过的京王饭店,就离新宿地铁站不远。下了地铁已找到了熟悉的车站地下广场,但东寻西觅就是没有找

准去京王的路，快快而罢。看来故地难游。不过我在地下广场看见一个僧装、托钵、拄杖的和尚，走近细看正是我上次来时(1995年)在这里每天看到的那一位，仍是靠着那根柱子，仍是微闭双目。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托钵的和尚顽强而有信心得如一尊铜像，使人相信变化中还有不变的东西。这位和尚算是我在东京遇到的最亲切的故人了。

1997年11月26日：墨田

昨、今天开始进入实质性的访问。昨天上午在 Metropolitan Plaza 听日本自治省官员讲日本的地方自治。讲者是自治省大臣官房的课长，他居然迟到了 5 分钟，这将中国外交部和日本海外协力集团为我们编织的日本神话戳了一个小洞，使我觉得日本人有了几分亲切感。这位官员面无表情，声调是一种单调的平缓，讲得大家昏昏欲睡，也确实有几个人在打盹，大概是昨夜睡迟的缘故吧。官员一开始先不讲日本地方自治，先介绍他自己，说自己在地方政府干过，在外务省干过，现在又在自治省干，做工作很有优势。但我看他的优势也有限，因为他只知道日本的情况，对别种政治没有概念，因而他对日本的情况也很难说有真正的理解，对听众中就中国的政治体制提出的问题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回答得含含糊糊，有点怯生生地用无辜而惊诧的眼神看着翻译。翻译姓大原，

是日本人，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两眼很亮很精明，发音地道，用语专门、准确，颇有点不凡。她说是在中国杭州住过十几年，也不知她是怎样的经历。吃饭的时候她还会给我们看手相，还知道男人断掌好，有事业心。东京街头有不少看手相者，两把椅子一张桌子坐在闹市区，甚至有 30 来岁的女相师。问手相者当然多的是少女，女性易感而迷信。

言归正传。我其实对日本政府制度中中央与地方关系很感兴趣，因为这方面日本与中国区别最大，且少有介绍，对我们基本上是盲区。中国是中央集权一直延续至今，但已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扭曲，面临改革的迫切需要，而日本由封建制过渡到今天的地方自治制，其源、其流都别有途径，最引动好奇心。可惜这位课长殊非通人，不能从他那里学得更多的东西，只好留待以后自修了。

106

昨天下午参观池袋防灾馆，体验了模拟地震、救护和防烟。这个馆是对东京市民进行防灾训练的。东京曾受过江户大火、关东大地震、东京大轰炸的毁坏，每一次城市都差不多被夷为焦土，也真算是多灾多难了，我还不知道有哪个城市在百年之内这么倒霉过。训练小姐一身深色制服，长相平凡却很亲切甜蜜，颇得大家好感。防烟训练是走进满是烟雾的迷宫一样的房子，自己哈腰找门出去。从监视屏幕上可以隐约看见找门路的人在里面探头探脑，我们团中的水利部职员范玉梅不禁脱口喊道：“鬼子进村了！”旁边陪我们参观的西园寺和大原女士面上就有些讪然。范玉梅语出即知失言，吐舌做鬼脸。也难怪她，屏幕上的景象太像我们小时候在电影上看的鬼子进村了。

今天一天在东京墨田区参观。先在区役所听讲“墨田区的中小企业”，后参观区役所所属的政府机构“中小企业中心”，是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机构，最后参观了东京最老的玻璃厂之一“泷波玻璃制品株式会社”。这个企业是家族企业，19世纪(1897)创办，现在有管理人员10人，工人32人。家族企业在日本很多，其特征是高级职务只能由本族人担任。一进工厂的门先就是一个博物馆，介绍本厂历史并展览当然同时也销售本厂制品。以博物馆开门给人一种有来历、有文化的深刻印象。家族动力曾被认为是东亚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也不知日本人自己有无做过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我想研究这个可惜不懂日文。这次访日倒是增加了我学日文的兴趣，见那么多书名很好的书读不懂。

墨田区是老城区，江户时代与贵族居住的地区(现为中央区)是东京的两个主要部分。区内河道纵横，最大的是自关西入海、孕育了江户文明的隅田川。房子老旧者颇多，有不少是底厂楼家的二层小屋，这是从江户时代传下来的作坊式厂家。今天这些厂家仍是该区的主体产业。不过，据区役所经济部的人介绍，这些作坊工场的社长半数都超过了60岁，面临后继乏人的问题。父母经营一家小厂忙碌了一生，辛苦得很，儿子辈不愿再继续祖业了。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扶持这些企业尤其是其中有独到、特有技术者。区里正发动“三M”运动：Mesuem(博物馆)、Model shop(样品商店)、Meister(技术能手)。区政府为扶持中小企业做了许多事，日本的政府在经济上还是很有作为的。不过，像墨田区政府这种扶持作坊的举措已很难说有什么产业意义了，有的只是惠厚本区民生兼保护特有文化的意义了。

1997年12月1日:合宿

108

28日上午,青年海外协力协会(JOCA)用大客车接我们去山梨县的富士吉田市与日本青年“合宿”。JOCA的主管大村美佐小姐在说明会上特意地补充了一句:“当然是男女分开的。”合宿是4个人住一个房间,两日两中。30日下午合宿完毕返东京,正赶上堵车,到东京住所已是夜灯初上了。路远人睏,车内尽是打盹人,大村手持麦克风唤醒大家:“哦哈哟高扎以玛斯(早上好)!请醒一醒,到站了!”去时路两旁景色正是深秋,落叶乔木黄叶茂密,恰与松林的浓绿镶嵌在一起,漫山遍野地有一种高爽而柔艳的壮观;回来时却见阔叶林树叶已经净落,已是枝干疏朗的冬景,只剩下冻青的松林颜色依旧。只是两天的工夫,风雨就已将秋景匆匆撤去。

在吉田市我们住的是常青富士宾馆,就在森林的边上,高而密的树木举头也望不到树冠,因而一时竟难以辨认是什

么树，侦察半天才知道是杉树。杉树的树干酷似红松。JOCA了无浪漫之情，将合宿时间全部安排成了讨论与体育比赛，想不起来留半天时间去森林散步。我只好趁早饭后、晚饭前自己去走一走。林间的小路落着厚厚的黄叶，树叶被雨水浸得透湿，踩上去有一种软软的危险的感觉。叉路很多，走得有点心惊胆战，在森林中最怕迷路也最易迷路，恰如东京的地铁站。林间有黑色的鸟惊飞起来。

28日、29日都是阴雨天气，说是富士山就在附近却视而不见，远处尽是雾气。30日早起拉开窗帘，猛然望见富士山就近在眼前，仿佛伸手可触，山脚仿佛就伸到了我们宾馆的楼前。原来富士山竟这么近，原来这两天的雨雾竟这么浓。富士山就是我们在书上见过无数次的那个样子，积雪的、中间凹陷的山顶，孤零零的一座山峰简单得有点滑稽。山腰以下都是林海，据说日本自杀的青年男女多没于富士山林海之中，想自杀随便走进林海就再也走不出来了，也容易得很。原来看照片认为富士山是一座秃山，近观才知它仅是秃顶，它还有那样阴森可怖的林海。30日整整一个上午空气清新得呛人，有一种极其清亮的、透明的感觉。森林的变化真是丰富而神奇。上午的讨论中已是心猿意马，和我同组的一个中国团员终于忍不住了提议到森林中去，日方也不便反对。不过到了林间中日双方倒是谁也没有真正看景：中国人忙着互相照相，一定要取到富士山；日本人从森林的所有权讲起，给我们讲日本40年代末在美国主持下土地改革的历史，一个中学的历史教师言之不足，又掏出纸笔作图解。中日两国人，一对煞风景。不过我对日本土改确实有兴趣。

合宿与我同屋的是庆应大学的学生须藤诚和深谷市市役

所市民部官员宫岛稔。须藤诚一脸络腮胡子，眼神单纯，说一口极其难懂的日本式英语，将“ri”一律发成“li”。但我们仍是顽强地用英语交谈，谈到后来须藤诚决定要来中国留学。宫岛稔在大学学的是哲学，但他对中国古诗感兴趣，就主动学习中文，曾参加过海外协力队在开封河南大学呆过。他会背杜甫的诗“国破山河在”。杜甫在日语中被读为“刀赫”。

合宿讨论会上中国青年发言一开口就讲中国的大好形势，私下真担心将日本人吓着。大会发言乏善可陈，倒是小组讨论大家还能够比较亲切地交流，而一谈到婚姻家庭问题大家就变得更加亲近起来。和我同一个小组的有东京都厅的公务员，东京农大的学生，自由诗人，还有高中历史教师奈良裕基。奈良黑瘦多髭，沉稳而耐心，谈到日本和学校情况时他问一答十，动辄往黑板上写字，占去了不少时间。他去过中国15次，说是酷爱旅游，到别国没有到中国亲切。这大概是信而好古的读书人难为人解的癖好吧，爱去多古迹的地方。他说别人见他老往中国跑，就问他是不是有女朋友在中国。“自由发表”时大家都很踊跃。在谈到“你认为中国与日本是否会友好下去”时，一个学教育学出身的日本女孩孤身跑到“完全反对”的牌子下。主持人请她详解，她说日本发展起来是靠掠夺、剥削中国，现在中国也慢慢强大起来了，将来肯定饶不了日本。一个认为会友好下去的日本青年所陈述的理由是中日两国互相需要，在经济上互相依存，所以不会闹翻。

1997年12月2日:带广

今天上午9:00在东京羽田机场上飞机,飞行一小时十分钟抵达北海道带广空港。隔着玻璃墙看见十胜地区(北海道下面的地区,带广市属于该地区)海外协力集团的人员抬着一条长长的横幅“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年”,白底红字如日本国旗的颜色。带广国际中心是我们的住处,今天也在门口插上了中国国旗。出了空港上客车后十胜海外的那位瘦小的、长得有点像茅盾的职员含笑登车,站在司机的旁边发表欢迎讲演。他说带广很小,但空气很干净,水很好,人心也很热。这里的人对家乡的水很骄傲,今天听几次主人致词都讲到在这里能喝到好水。水是乡土与乡情的象征,日本人在此恰与中国情同。

带广其实不仅是水好。在飞机上就看见了起伏的山峦和山外辽阔的田野。昨天刚下过小雪,田野上和山间的小路上

还铺着白色。寒流乍来,北海道以它寒冷的本色来迎接我们。空港与国际中心半个小时的路程,从车窗可以看见路旁的白桦树,远处伴雪的麦苗和冬天焦枯色的无叶的树林,看见被树林夹掩的还在流动的河流与小溪。带广附近的乡村其实就是无边的田地中夹着的一座座孤零零的房舍,多是红顶或淡黄房顶的两层小楼。房舍一家家都相距一二里远,每家只是以树为伴。新翻过的田里露出黑色的土茬,使人看到这里的土地有多么肥沃,想起它数十年前还是多么荒凉。晚上我在市内一家果子店买到一种糯米做成的“百代饼”,饼的精美的包装纸上就印着带广开发 100 年来历任行政长官的名字,从最初的户长直到今天的市长,饼名“百代”就是纪念开发精神的,取“先人之心,百代继承”之意。果子铺都有这样的拳拳之心,可见带广人对自己家乡的无比珍惜。当然如此珍惜可能有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整个北海道都是抢来的,从土著人手中抢来的。抢来的东西往往被格外的地珍爱。据说北海道士著民族还保留有自己小块的聚居区,带广及其周围却一点儿也见不到他们的影子了;偶尔看见哪家酒馆挂着霓虹灯招牌名为“大和酒馆”,才使人想起这里曾经是异族的地方,此地民族还有自觉的差别之心。当然日语有很多汉字,尤其是街上招牌几乎尽是汉字,这使我想到大和民族在掠夺异族土地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字和文化带到了这个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荒蛮之地,使之在这里发扬光大,真是奇缘。世界无常的关联真是让人慨叹。

今天的欢迎晚宴上我们大后天将要去“民宿”的家庭家长都来了,我要去的一家叫横地二郎,66岁,其妻63岁。情况表上写着无业,估计是退休者。横地老人为了接待我还专门

去学习了汉语,说是已上到了中级班。许多接待民宿的家庭都已学了几个月汉语了。有一家干脆自费雇了一个汉语翻译,以求长谈。晚宴上中小学生为我们表演了此地有特色的“平原大鼓”,这些浑身是劲的孩子们一人抱着一面大鼓猛敲,跟中国打鼓差不多,震得我胃疼。民宿家长中的老者赶紧捂住心脏跑到厅外。晚宴的安排者无疑是热情有余而考虑不周,没想到宴会厅房子小,没想到老人岁数大。不过鼓确实打得不错。体现北海道特色的还有餐桌上那被剖开的巨大的大马哈鱼,桔红色的蒸熟的鱼肉十分诱人。

晚上在国际中心担任翻译的中国留学生何茂龙开着他的本田车带我们甩风,一时三刻就把带广小城转了三圈。小城的街道同东京一样灯火通明。带广与东京的差别你白天才能真正区分。国际中心在高处,在平台西望可以把整个城市尽收眼底,天空因为空气的新鲜与纯净有一种流光溢彩的感觉,白云与蓝天都一尘不染,极远处的街道行人看去都感到异常清晰。国际中心的附近也有民居,在三层的客房中即可俯瞰民居两层的小楼,排列也很拥挤,但与东京不同的是每家都有一片不小的草地。草地多是杂草地,斜阳照在谁家后院,静无一人的草地上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寥与怀伤。

1997年12月4日：日本民生

114

从昨天上午到市役所拜访开始，我们展开了对带广的参观。市助役和国际部长出席了欢迎仪式。市役所大楼12层高，是本市最高的建筑。为了保持城市与周围丘陵与森林的和谐，该市规定市区官民建筑均不得超过15米，所以带广市基本上是小楼的城市。今天下午4:00来钟我在住处附近的街道漫步，只见楼面而不见人面，长长的街道寂无一人，不知谁家养的狗见人即高叫不止，似乎是街上罕见人迹。有空车停在家家户户的门前，只是在街口我才好不容易迎头碰见一辆行驶的汽车。民居小楼的墙面多为白色，每家都一尘不染，绝对没有污痕。城市中无数雪白的墙给人一种童话的感觉。屋顶多为深红、暗灰、墨绿，建筑样式也五花八门，站在高处看错落又整齐——有意的、计算好的错落。居民家大都在门口造园——由树石与小丘组成的微形园林，小得可以入怀，却又

显得丰富；屋后多为草坪，比园要大，坪上的草比门前园中的树要杂乱一些，仿佛绿化主要是为了展览，在外人看不到的地方尽可以马虎一些。

昨天上午 10:00 去看带广市百年纪念馆。带广市在 1881 年左右迁来了本州的一批文化人，他们的照片下多注着从哪所大学毕业，是他们携妻将雏组成了“晚成社”从事开发。他们伐木盖屋，烧荒垦田，在冰天雪地中与野兽为邻，赶走了土著的阿布人。馆中挂着他们出发前与家乡文友的酬和诗，都是很遒劲的汉字。一首别诗云：“欲报君恩决北游，辛酸常乐我客流。此行元是虽可贺，难恨犹存落日头。”不无悲壮苍凉之感。朋友的送诗似为相和之作，其意却有些浪漫缠绵了：“君去春山谁共游，鸟啼花落水长流。如今送君临溪水，他日相思来看头。”送诗末字似觉不通。且两首诗作当成汉文读来都有些晦涩，但春山相送，送者与行者各怀情愫的情景却如画而现。这批读书人在这里种田畜牧，养的牛却卖不出去，因为其时日本没有吃牛肉的习惯。读书人移风易俗的偏执上来了，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推广牛肉之食。有一幅照片是他们有三个人在城市街头作宣传，两人宣讲，另一人背上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大书“牛肉”二字。这活人牛肉的照片颇见出日本读书人的异秉。倘能知行合一，文士亦是武士。中国读书人讲“君子动口不动手”，使文化丧失了及物新民的活力，使大道可闻而不可行。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能有从卖牛肉做起的精神，摈弃“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的破落户积习，中国的事情或有可为。“咨尔多士，为民前锋”，“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国民党后来是个坏党，但它的党歌却显出了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动员知识分子起而行之的蓬勃气象。

开发带广地区的另一批功臣是犯人。本世纪初日本政府在这里建成了很大的监狱，于是犯人们就成了拓荒的重要力量。展览陈列中有犯人穿过的巨大的拖鞋，鞋大如船，该有多魁伟的身材才能穿得了那么大的鞋。犯人多非常人，往往有过人的体力、智力和胆量。文人和犯人是造物的两件宝。

昨天下午与今天一天都是参观企事业单位。计有：带广市畜产品开发中心、带广市农业技术中心、带广市中小学给食中心、北海道立食品开发中心及东洋农机厂。这些地方从产业和地区发展的角度都没有太大的示范价值，反倒是对我的文化观察很有意义。因为越是细部的、琐碎的和无意的地方越能体现文化。日本人很小气，重要的、有实质意义的东西都不太给看，我们团中搞产业的人很失望，我也有点失望，不过倒正好将计就计地向他们问一些与文化有关的问题，如家族企业与家族联合企业的内部结构、公司白领的生活以及农业技术在乡村推广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东洋农机厂的事业课长很精明，我问他工厂的劳资关系，他倒反过来问我中国还有没有阶级斗争。农机厂摆着神龛，敬着天照大神。据说日本40岁以上的家庭都供着神道和佛像各一，而40岁以下的人则对此很淡漠。事业课长说他41岁，女儿21岁，家中就没有敬神，心里总是很惭愧，觉得应该有神位，但一忙起来就顾不上了。这家工厂神位的一侧是日本国旗，一侧是厂旗。日本国旗构图简单，纯白与鲜红颜色对比强烈而又柔和，细看起来还是挺美的，不像美国国旗那样图案复杂且颜色刺激。日本国旗在中国的抗战小说中被说成是膏药旗。

我们在农机厂的车间参观，看见巨大的厂房、密集的对外

行来说是不知所云的各种机器与稀疏的工人。即使是在劳动最密集的工作区也是一人看3台机器。车间的光线有点暗,只看见工人的蓝色工装而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没有排排坐的流水线,给人的印象是工人并不紧张,只是手拿一个工具踱来逛去,左敲敲右打打。这个工厂从部件到组装都在本厂内完成。我们还被带到开发设计室,这是工厂进行技术创新的研究单位,与车间一门之隔但又判若两界,房子里阳光充足、家具摩登而又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氛。我们进屋时,室里的女职员给我们准备了拖鞋,而男职员们仍在埋头画图和操作电脑。事务课长介绍他们厂内岗位互换,管理人员都是蓝领出身,理念是不知操作者的辛苦不配当经理;而白领工作不称职仍要回车间穿蓝色工装。而且大学毕业生的蓝领与初高中生的白领都有,课长说本厂不像大企业那样重学历而重个人的实际能力。他说厂里协调劳资、蓝白领人员关系的重要方式是开展“共育”(他特别将其与“教育”区别开来)活动,即每月都要抽出两天,全会社人员脱离工作来讨论下月计划。这种“共育”之说不知是广告还是实话。

昨天中午的午饭在山上吃,带广畜产品开发中心就设在山野的一个牧场上,它的头顶的山头上有一个餐馆名叫“八千代”。市役所国际课的陪同酒井先生特意告诉老板说中国人食量大于日本,所以饭馆将我们的菜量都加倍。从玻璃窗可以看见远处连绵起伏的白皑皑的雪峰,据说这里再往北就是大雪山。饭后临窗而立,见屋外的玻璃墙边有一只小老鼠,圆圆的身体、长长的尾巴,毛色黑灰,正在埋头吃雪地上干青的草叶,了无怕人之意,用脚踢玻璃墙它也不跑,甚至连头也不抬。

昨天晚上我们去带广火车站旁边的大厦里看能剧表演和茶道。能剧名为《蝴蝶》，演了一个片断，是写一个蝴蝶化为少女与一个游方僧人的对话，然后蝴蝶绕着梅花上下左右飞，最后花残月落，蝴蝶凄凉地飞去。这个微带神秘色彩的折子表演起来竟有几分凄厉，女主角（蝴蝶）的唱腔高亢而厉犴，全不像中国戏中的花旦，全不像赏花甚至也不像葬花的少女；幕侧，一排3个跪着的3个穿深色衣服的男角，目光凝滞出神犹如干木；正面跪着两个乐手为女性，一个用槌敲鼓，一人用手击鼓，口中嘿哈应和不止。茶道本应是庄严肃穆的气氛，但让中国这群喜茶而不知茶道的年轻人嘻嘻哈哈弄得茶室十分轻快活跃。表演茶道是位20多岁的女性，她倒是面色宁静不受环境感染，低眉垂目从容操作。她穿着艳丽得有点性感的和服。表演后我问主持茶道的一位老太太，茶道到底表达的是一种什么精神，老人回答说道即道路，茶道、剑道、柔道是象征着日本在黑暗中寻找道路，要宁静、坚毅地走下去，不管多么艰难都要坚定地走下去。老人心中的茶道同说明书中千利休的“和敬清寂”不同，也同当代茶道家以“一碗茶中的和平”为主旨所作的环球表演不同，大概坚忍、刚毅、沉静才是它在日本民众中所获得的真实理解。日本人有一种永远无法消释的紧张感，这在我们同一晚上观看的能剧和茶道中都体现出来。茶之道本来自中国，中国的茶师追求的是与自然的和谐，是感官的入微的享乐，本质上是从文明压抑中的一种解放：深溪取水，和风烹茶，对月细品，自有一种回归与陶然之情；而日本茶道则是从自然的自然状态归入内敛与压抑之中，将世俗享乐变化为神圣乃至神秘：与这样的人为邻殊非乐事。我看过一

个中国电影,一个在日本打工回国的中国小痞子评论道:“甭管花道茶道,都不妨碍它是强盗。”难道花道茶道真是强盗之道吗?

1997年12月4日：芽室町

120

现在外面正在下雪，树挂在路灯的阴暗处也显得风姿绰约，灯光中更有雪花在纷乱地飞舞，雪在寂静的深夜美丽而神秘。3天的“民宿”于今天结束，我回到宾馆先倒头睡了3个小时，醒后在餐厅吃饭无意中瞥一眼落地的玻璃墙，看见已是大雪奔腾飘飘。“民宿”英语叫 homestay，我寄宿的小镇上的居民一口一个 homestay，好像它已成为一个日语外来语。

小镇叫芽室町，我对小镇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三天之居已经获得了不少的知识。日本的地方政府实行自治，因而行政层次很少，北海道厅下属有一个十胜支厅(Hokkaido)，十胜这个松散的地域联合体下面直接就是平行的市、町、村了，村居也和市并列。市、町、村按中国的行政层级比拟都应属于县级单位了。不过，尽管层级相同，但其性质还是有所不同，且存在递进关系的。开拓时代居民点都称户。带广(Obihiro)于

明治三十五年撤户建立一种社区叫“组合”，大正四年由“组合”而“町”，昭和八年改市，作为一个市的发育来说是成熟较早的。芽室于明治三十九年为二级村，大正八年为一级村，昭和十七年改称町至今。它的人口有 1.7 万，17 万人口的带广市正好是它的十倍。许多国、道的管理机构就设在带广，带广在整个十胜地区实际上成了一个具有较强辐射功能的中心。比如芽室町机动车号就采用“带广××”标记，因为日本运输省陆运局只设带广管区。带广对周边町村无形的覆盖就更有力了，芽室町印有町长头像的宣传材料上就抱怨说“In recent years, Memuro has tended to lose business to Obihiro(近年来，芽室的许多生意都失于带广)”。其实我想生意被带广抢去恐怕并非始于近年。芽室町离带广市 15 公里，町中多公路，从路标上看几乎条条道路通带广；而在芽室町的 5732 户人家中就有轿车 6900 辆，到带广购物只需一支烟的功夫，小镇人完全可以将带广市看成家门口的大商场。但芽室町役场(政府)却不甘心肥水外流，宣传材料上紧接着上句话即有“To cope with this situation, action has been taken to expand local consumption by modernizing and reorganizing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为应对这种情况，已采取措施通过更新与重组本町的中心商业区来扩大大地消费)”云云。现在芽室的主要商业区有店铺 260 家，全町不含饭店的商店 185 家，营业额有 389 亿日元。其规模还算可以。

芽室町作为城镇还设有 4 个工业园区(industrial park)，现有工业企业 46 家，1993 年的销售额为 582.8419 亿日元。同年的农业总产值是 193.66 亿日元，这个数字包括农作物(152.89 亿)与畜牧(40.77 亿)两项。从数额来看，芽室町的

产业比重是工、商、农；在从业者人员数量构成上，1995 年芽室町第三产业所占比例最高，为 48.9%（4395 人），第一产业为 30.5%（2742 人），第二产业为 20.6%（1855 人）。但是，从行业优势来讲芽室町还是农业领先，1996 年它的马铃薯、小麦、甜菜和小豆的产量在北海道全部市、町、村中的排名为一、三、二、二，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所以町长常山诚的名片上印的是咧着嘴大笑或者眯着眼微笑的山芋、麦穗、南瓜卡通，标明着“农业王国芽室町”。

常山诚 50 多岁的年纪，我入住芽室町曾去町役场作日本人所说的“表敬访问”，同他作了半个小时的交谈。役场的翻译是英译员，我们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是通过英语交流的。他两句话之后就提起日本过去侵略中国的历史，表示非常有愧，使我对他产生了好印象。他送给我的礼物中包括本町最新而且非常详细的统计数据册，这在中国应属机密资料，在灯下翻阅我对他也不无感念。在 homestay 的房东家中翻《十胜新闻》，看见报上登有常山诚的一幅照片，低头近 90 度，我似懂不懂地看日文报道大致明白是芽室町一个公务员（一个什么事务局的局长）因受贿被逮捕，他作为町长在向町民谢罪。当时房东雇来的留学生翻译在场，我很想问清楚事情的原委，但房东妈妈似乎是不愿意说的样子，大概是不愿外扬国丑吧。常山诚浓眉，方方正正的国字脸，美中不足的是嘴角处显出一种淡寡清寒之相，不是旺盛发达的样子。他 1994 年当选，之前是商人。房东妈妈介绍说由于芽室町没有自己的电视频道，町长竞选都是乘敞蓬车沿街讲演一星期。

话归正题。芽室町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已进了后工业社会的小镇，第三产业已经勃兴，但第一产业仍然兴旺，耕地面积

1971 年为 19398 公顷, 1996 年反而扩大为 19528 公顷。第二产业占据最高产值, 第三产业拥有最高人数, 第一产业保持最高地位: 城市化若能以这种方式完成真是造化不浅, 之中的细节值得中国人细细体味。

1997 年 12 月 9 日:温泉与和服

124

这两天活动安排得格外紧,一天参观四五个地方,时间以分钟计,仿佛是十胜 JICA 要在我们逗留的最后两天时间给我们以最大的影响。昨天参观的带广可口可乐公司、四叶乳业株式会社、市幌町的两家牧场(一奶牛一肉牛)、市幌町役场和农协。今天参观的是带广净水场、垃圾处理场和下水道处理场。昨天晚上没有回宿带广国际中心,住在了距带广约一小时车程的十胜温泉宾馆,叫大平原饭店。

参观牧场最有浪漫情调。我曾在美国的小说与戏剧里读到过辽阔的牧场、牧场上孤单的家园以及家园中表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纠葛,不承想竟是在北海道见到了美国式的牧场。这家牧场主有 1600 头奶牛,60 公顷草场。使我吃惊的是每日挤奶、小牛喂奶、饲料配合都是自动化的,紧贴着牛栏有一个电脑房监控着牛栏中的每一个生产流程。牧场主四五十岁

的年纪,20年前以5头牛起家。他矮矮的个子,长得很结实,穿着长统靴和不洁的棉夹克,一副地地道道的乡下人模样。他的谈吐颇有乡下人的质朴却并不村俚,他说他10年前去过北京,当时北京的落后使他吃惊,街上有拖拉机在跑,不知现在变了没有。他有两个儿子,我问他将来牧场怎样继承,他说传给大儿子,他已经给小儿子说过让他另择生计,并且也没有什么补偿。牧场总价值是5亿日元左右。日本传统上是长子继承制,虽未有立法保证却相沿成俗,近年来有些家庭实行了分割制,但传统依然强大。有人曾认为侵华日军之所以有破坏性的战争行为,是因为日本军人大都是次郎以下的子弟(大儿子太郎免服兵役),没有继承权,在社会中没有稳定前途;而且因为他们少年从军,还没有来得及靠自己的力量谋得地位,所以他们一腔怨怒,满身匪气。这或许有些道理。日本的遗产税很重,据说传承两三代以后家业就都落到了国家手中,所以财主们都想办法分散或隐瞒财产,我估计这家牧主的实际资产不止5亿。他是市幌町议会的议员,名片上印的是议员的头衔而不印牧场主。牧场庭院不大,两排粗壮孔武的松树成了围墙,院中屋前有两棵密结着红豆的什么老树,顶着白雪显得格外鲜艳。院中的雪被扫起来,堆积在老树的根旁。树下有一个小小的狗舍,狗就拴在舍前,见许多人来以和善而明亮的眼睛静立而望,不吠叫也不跳跃,竟憨厚如牛。接着去看一家肉牛场,牛棚中的牛就没有奶牛场的牛们安详,眼睛警惕而惊恐地盯着来人。气氛不详,心有不忍,我早早地就踏雪回到了大客车上。

昨晚的大平原饭店之宿很难忘。一是见识了穿和服的日

本人，一是洗了真正的日本温泉。饭店的房间是和式的，餐厅也是和餐。在餐厅门口等人的功夫我看见一拨又一拨的穿和服的日本人路过，有时拥着一个姑娘，言容颇近狎乱。穿和服日本男人总使我感到有几分狰狞，从和服中伸出来的日本面孔深奥难测，仿佛日本文化中隐秘甚至阴暗的东西都通过和服装束暗示出来。我平日不太喜欢总是西服领带的日本人，觉得他们天天将西服当制服穿呆板而拘谨，十分不可亲，但相比和服，我感到穿西服的日本人突然变得亲切起来。日本人在和服中倒是不拘谨，倒是变得很自然很活动，他们在和服中真正地回到了自身、变回了他自己，但和服以及它解放出来的日本面容使我感到强烈的不适。或许和服代表着纯粹的的日本精神，而西服代表了日本战后越来越深刻的国际化；日本精神让我们想起武士道、想起菊花与刀、想起了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侵略的残忍，国际化则是日本民主与和平改造的途径。我有时甚至想美军战后的占领最大的缺点不是保存了天皇制，而是保存了和服。和服很可能就成了阴暗而暧昧的日本旧日精神的屏障与堡垒。日本人白天穿西装，晚上回家穿和服，是否这样就养成了一阳一阴两副面孔和两种心肠？

昨天的晚饭是同带广青年会的成员们一块吃的。饭前中国青年穿着五花八门的便装，显得很活跃，而日本青年则一律西服正装，站成一排一个个郑重地自我介绍。饭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酒后形势大变，中国青年虽是便装，但在酒后的日本青年面前也显得十分老实诚恳，而日本青年则变得富有侵略性起来，领带也歪了，笑声也变了味了。或许酒有与和服相同的功效。交谈中，日方一个小学教师问我听没听说过《论语》，

JOCA 的大树美佐小姐赶紧用日语制止他；但他还是执意地说下去，用日语念了《论语》中的一句话考我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日语，大村小姐也翻不出来，我请他用笔写下原文。他用歪歪扭扭的汉字也即是古日语写的是“德不孤”，往下就写不出来了。我给大村写出“德不孤、必有邻”，向她解释是什么意思。还没有等大村将解释翻过去，他就用英语给我讲解起来，他认为这意思是说“You must be just because other men are watching you(一个人必须公正有德，因为别的人在看着你)”。我纠正了他，向他介绍此语德必有其类从之的本义，介绍孔子以此来教诲学生要对人类精神发展充满信心的深意，并举出“七步之内必有芳草”的古语佐解。他想了半天，最后倒是同意了我的解释，同我热烈握手。我作为学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去纠正一个外国青年对中国典籍的误解实在无可称者，但日本人在谈及中国典籍时的自负与自大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人在面对日本人时确实常常有文化母国主义情绪，这确实很浅薄；但说到底中国毕竟还可以称是日本的文化母国，真正使我吃惊的是有些日本人在面对中国人时常流露出的文化母国主义态度。比如说对汉字，无论在芽室町小镇还是在东京我都遇到过日本人惊讶于中国的文字怎么竟同他们的文字相同。或许中国应该提出汉字的知识产权问题来向日本人索酬，一个字 100 亿日元，就像当初应该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一样。对于一个如此只认实利与武力的国度来说，让他出点钱是让他记起历史真相的有效办法。而且日本青年对“德不孤、必有邻”的误解也使我觉得不无意味，恰好证明了日本人的道德秩序不是出于个人的自觉而是出于相互监视的强迫。

在酒后的交谈中，一个瘦削的日本青年喝得烂醉，见人就拥抱亲吻；他的同伴在他的嘴唇上画上小胡子，他甚至解开裤扣露出了他的那话儿，他的同伴也在那话儿的周围给他画上画。当然这是在女士们退场之后，但这仍使我很吃惊。

不过日本的温泉是值得赞美的。大平原饭店的温泉浴场有室内、室外两个池，都是流动的水。在室内池子里坐上半天，然后出侧门走向露天，赤身踩着雪地冒着雪花走下院内的泉池，身埋于水中至颈，靠池壁而坐，仰头望着雪花从黑暗的神秘的高处飞落下来，落到脸上头发上，有一种真正的愉快。

1997年12月10日：襟裳岬

今天日程上安排的时间是自修,但由于 JICA 总部西园寺和刘玉兰的争取,带广市政府请客带我们游览了襟裳岬,是北海道与太平洋相连的一个尖角。这是访日 20 天来第一次改变日程,其他日子计划都执行到分钟,雷打不动。今天的午饭本来定为自理,十胜海外协力组织在我们到达当天已发给我们 1048 元的饭费(1000 元饭费加 48 元税,发这样的精确到 8 元的饭钱当时就受到了中国团员的嘲笑),所以今天中午每人 1000 元的饭费带广市准备让我们自己交纳。但刘玉兰不干,她说这点钱再让个人出就太不仗义了,JICA 给十胜海外协力组织的钱不少,而十胜给中国团员的钱却不多;如果带广方面实在不出这笔钱,她自己准备拿这笔钱,横竖不过 25000。这样带广市才认帐。日本人的确是有些小气,不开壶。连以厚道好客自命的北海道人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刘

玉兰是 JICA 总部的中国籍雇员。

自带广至襟裳岬 3 个小时的汽车路,路两旁平原上的防风林和山上茂密的次生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原野被厚厚的白雪覆盖,时有河流从雪野与林间流过,在白雪的映衬下深褐色的河流似有暖意,使人心有一种微微的涌动。融雪的路旁小镇不像无雪时那样一尘不染了,被车轮轧碾的街道和谁家门前凌乱的雪堆一眼望去都有刺目的肮脏感,但这种气氛和景象却是我喜欢的,我觉得这种景象比童话般的洁净更有生气和活力。

长途的汽车之旅培养对地理的兴趣。我注意到沿途的地名,有中札内町、大树町和忠类村。北海道地广人稀,町村已算是直属支道厅管理的行政区域了。过了十胜港再向南走就出了十胜而进入日高地区。自十胜港至襟裳岬是依山沿海公路,为了防止雪崩和泥石流公路多开隧道,所以公路造价极高,被称为黄金路。奇怪的是这条耗资巨大的黄金路并没有经济价值,因为自港口至岬口只有零散的几个町村,没有一家重要的经济单位。JICA 刘玉兰介绍说这是为了方便町村居民的生活,但我窃以为非也。因为町村居民至十胜港本已有山上的一条便道可通,生活已没有太大不便,仅仅为提高便利程度,日本政府不可能下这样的血本。我以为这条路是一条战备公路。具体的战略目标不清楚。返程中在忠类村停车场我看见了日本自卫队的训练车,一辆大卡车一辆小吉普,有穿军服佩枪的军人在上下车;我们正好停车休息,因第一次看见自卫队军人我取出相机意欲拍照,但见有外国人停下军车立即开走了。我还在公路旁看见自卫队第几师团第几单位招眼的广告,红色的大字写着“自卫官招募中”。

襟裳岬从前以风大闻名，风竟然刮得此地寸草不生。但近几十年的植树、植草很有成效，矮种的青松已顽强地遮严了地面与山坡。我看见为了抗风，树苗都被用密集的棚栏围圈起来，十分精心。岬上露天的木牌上贴着此地造林史的照片，还有一个牌板画着此地生长的主要植物，见出爱花草之心颇切。据说此处海中有北极动物——斑点海豹，可惜我们没有看见。看见的是翔飞的海鸥以及在海面上星星点点、似有似无的叫不出名字的水鸟。海堤旁就有人家，房顶约与堤齐，盖以堤挡风也。据说此地一年有 290 多天都有大风，今天侥幸无风，渔村一派祥和景象，一个个庭院中都挂着长长宽宽的海带。海带日语叫昆布，为日本人爱物。北海道白天很短，下午 3:00 即有暮色。暮色中看见有小学生放学，三三两两不走扫清的正道偏踩着路边的积雪走路，裹得严严实实看不清脸，那顽稚的步态与身姿让人望而生怜。是大树町的孩子们。

131

晚饭是十胜海外协力集团的欢送宴会。所有与我们的接待有关的人都应邀前来。十胜协力的会长讲话说中国发展很快，每年都 9%，但中国幅员辽阔，要每个地区都富起来还很困难；如果以后各位在中国建设中遇到困难能想起在日本学得的东西，那我们将感到欣慰。我们的团长讲话也大力地强调了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团长不过是信口地虚应故事，但他的与日本会长的话放在一起似乎是将我们一个友好交流访问团简化成了见习团，于是引起了国家计委一个处长的强烈不满，他在我们上了车后大声向团长抗议，说我们是来交流的不是来朝拜的。我倒对多说学习并不反感，学无止境，学别人的东西并不吃亏；我觉得遗憾的恰恰相反，我认为团中这许

多国家部委的官员太缺乏学习的热情了，至少也太缺乏了解日本的兴趣了，晚上经常有人打牌至深夜，平时满足于嬉闹；今天去襟裳岬的路上水利部一位老兄坐在我后排不看风景，不停地在我耳边讲国内种种黄色笑话，挥之不去，使我十分厌恶。我发现许多中国青年都存在着错觉，认为自己很了解日本而日本不了解中国。他们以为知道日本首都是东京、首相是桥本就算了解日本了，这真是太荒唐。对日本经济、社会、文化不深入了解的人不仅不能从日本的经验中获益，且还将吃日本人的大亏。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和倾向其实十分矛盾。一方面感情上厌憎日本，这种厌憎往往使其不甘心、不虚心学习日本，另一方面又为日本的军事、经济、质量、效益的神话所惑，对日本的能力有一种盲目的迷信，甚至有恐日症。这大概是 50 年前亡国奴和汉奸产生的一种根源吧。必须同时克服这两种倾向，学习要虚心，迷信要消除，而这两者都需要对日本深入的了解与研究。现在日本一般民众虽然多对中国所知有限，但其官、产、学的精英阶层对中国的了解却细致入微，往往人的自我了解，读他们研究中国的著作常常惊出冷汗。而中国对日本发言时只有几句教条，脑子中一盆浆糊，令人得无惧乎！

晚上回住处后带广的中国留学生和华籍公司职员来访同胞。一位公司主管姓曹，40 来岁，他说起日本人情绪激烈。他认为日本人整体上对中国人很敌视，对中国的日益强大很恐惧。传媒上对中国人犯罪大肆渲染，这既是公众排华心理的反映，又强化了公众的排华心理。他认为日本人有两大特性，第一像狗，对强者十分驯服，对弱者无限欺凌，根本没有正义感而只知利害，更不知仁义为何物，不知感恩，没有公正交

往甚至没有公平交易之心，根本上就是没有进化好的人群；第二像猪，很笨，公司里的日本同事常常笨得可笑，只会机械地服从。我想他们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就来自这种恶和这种笨，来自这种不折不扣地执行态度，来自他们内部组织中人与人关系的严酷，来自他们对丰富的人生内容的盲视以及由此产生的单一的工作狂精神。说他们没有进化好也罢，他们这种进化滞后却与近代社会的两大趋势——战争与工业十分宜合。这或许就是他们能迅速崛起起于弱小的原因吧。

也走运河

1997年8月14日：通县

134

今天上午8:30动身走运河。最初的计划是先达杭州,然后由南而北往回走。10日去西直门火车票预售处购票,来至那座小院的门口即受到成群票贩子的盛情围堵,遂采取不搭腔主义径直往里走,走出老远还听到票贩子吩咐他的手下人:“盯住他!”不知为何来这里买票的人并不多,所以票贩子们对我格外珍视。售票厅中排队很短,我心中颇喜,看墙上的时刻表上说往杭州的是31次,硬卧344元。很快排到窗口,刚报出31次硬卧,售票小姐即拿起窗台上一张用彩笔写的字纸:“卧铺一律没有。”一下子凉了下來。售票小姐根本不看顾客,就用这张纸说话。窗台上还放着另外一张纸,我没有看清楚上面写的什么,估计也不是好话。

无奈走出售票厅,被派来盯住我的小票贩胸有成竹地等在院中,把我引到票贩子设在院里的办公处——确实可称是

办公处，一张桌前大模大样地坐着当值票贩，只不过桌子很小，且是带轮子的那种，随时准备转移。当值票贩问清我要什么票后，不假思考地说：“哪天的都有，加 160 元。”344 元加 160 元恰好凑够 500 元整数，想来票贩子们对业务是很精通的。太黑了点，我扭头就走。

接下来找单位订票，说是 5 天以后才有票。买票受阻，遂决定改变计划，先买硬板车至德州（这票好买，随时有），再从德州往北京走，由走南段改为走北段；在德州买一辆自行车骑行，半个月时间内回到北京不成问题。后又觉得德州离京不太远，由那里回返即会将整个旅行变成彻底的归程，大煞远行的情致。旅行出发时人总是充满轻松与甜蜜，心像飞起来一样，而归程却总带点曲终人散的沮丧与低落情绪。

最后决定从通县开始向南走，由近向远。计划变更中一延宕就是好几天，到昨日才决定今日出发。还有一系列杂事没有做完，坚决扔下。想做的事，赶快去做，做而不顾其余。人生苦短，羁绊苦多，没有快刀决斩的精神永远不得自由。

这次旅行的既定方针是不找熟悉的地方官员安排，一来是免去“限制导游”和应酬之苦，二来是尽量避免对所到之处的生活本来状态的干预，一个不显眼的旅游者比地方政府秘书引领的更能见到真事。且这次旅行是孤身。用我的朋友方炜的话说，一个人孤身行走比结伴更有观察的襟心。

昨天晚上给通县有关的熟人打电话，询问通县运河情况。先寻呼巩传领，他曾在通县做了两年生意，不巧他的呼机因欠费停机，估计是目前的生意又做砸了。又想同喻静联系，她曾是通县电视台记者。巧得很她正好来电话找玲玲，遂问询。

她对运河可惜所知不多，只知道运河风景很美，当地的美术爱好者常去沿岸写生，是通县的骄傲。接着给靳大成兄打电话，闻说他夫人在通县县委宣传部工作，想托她找本县志。不巧大成不在，也正巧是他夫人接电话。我说明打算，并告说次日上午去通县。我与靳夫人从未见过面或通过话，但她听说是大成的朋友很热情，说不巧她次日要来北京开会，不过她会交代宣传部办公室准备县志；并说县档案馆离县委很近，可让办公室派人领去查有关资料，并由他们安排午餐。她并且详细地告知县委怎么走，其实县委随便问街头哪个人都会知道。“你就说是金部长的客人，”靳嫂子叮嘱说。我想，真是不巧，无意中又碰上了地方官。好在她不在县城。“你叫李书里？”靳嫂子金部长最后问。我说，是李书磊。

上午8:30背上双肩包，包很大却又很轻，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带书出门；这次旅行只是行万里路，因而把书都从包中剔去，除了地图和笔记本。在北门外上车去通县，顺道至《战略与管理》编辑部借采访机。

北京现在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楼而是路。白颐路正在抢修，车根本就跑不起来。从甘家口至阜城门的街道已扩建完成，崭新的八股车道明亮得耀眼，仿佛从这里经过的汽车也变得轻快而飘扬起来，只可惜过街天桥太少，汽车不时得驻足等行人过横道。这段路的上空仍是织着密密麻麻的电车线，陈黑的线路网在这迅速珠光宝气起来的街道上给我们一点慰藉，使我们在对日新又日新的生存环境不无眩晕的享受中，有一种淡淡的、伤感的依凭。

车从复兴门桥拐上长安街。在桥的高处瞥一眼路上爬行

着的无尽头的汽车长龙,忽然使人心惊。路越拓越宽,车龙越来越长,我看见走在我车前面的一辆桑塔那 2000 不时地亮起它那微微翘起的尾饰灯。汽车越来越华丽了,真是不可遏止的现代繁华。在这日益旺盛的现代繁华之下,我要前去考察的运河还有意义吗?我对这条应该说正在垂死挣扎的河流的考察还有意义吗?

在大北窑附近上了京通高速公路。6 年没来过通县了,京通高速使我觉得陌生,原来公路两旁老大的白杨树和简朴的小饭馆已荡然无存。司机李志强说这条路是陈希同下台前最后一项工程。司机们对陈希同有点好感,因为他从市长到市委书记都一门心思修路。志强说如果陈希同不下台四环路早修好了。京通高速的修成使通县紧紧地贴住了北京,通县自下个月起就要宣布成为通州区。

古代以河为路。当年疏浚通惠河、将通县与北京联起来的明代官员吴仲史志有书。将来的通州志或北京志会给陈希同留怎样的一笔呢?

通县县委不难找,我来到宣传部办公室时,室主任张女士已在坐等。她派人领我去后院的档案馆查资料;有趣的是她派给我领路的是两个人,一个叫张友刚,一个叫王强,都是小伙子。仿佛去档案馆查资料是一件一个人不能胜任的力气活。张友刚年龄稍长,从乡镇调上来,寡言而面带忧愁;王强是 1974 年生,谈话中见出好书喜文又争强好胜的小公鸡性格。说起刘绍棠,王强不假思考地接口报出他是××乡××村人;说起李贽,他也对其学问有所赞评。将来官场上的老狐狸都是由这样的小公鸡长成的吗?

档案馆的当值员隋女士向我提供了各种志书和文史资料,我在上午和下午都作了选择和复印。不过,该馆真正使我感兴趣的是它收藏的自民国至今的各种档案文件。我粗翻了一下目录,发现这些档案即使对运河研究这么一个偏题都会提供志书提供不出的许多第一手材料。我从来没有进过、利用过档案馆,我辈学人很少有利用档案的意识。这是禁书制度、保密制度训练出来的。如此“内部”、如此“机密”的文件想到要去看就简直是大逆不道,居然可以看了真是受宠若惊。发现档案馆有如此妙用真是心中大喜。

在档案馆还有两个读者,一问方知是县志办的人,也算是无巧不成书,县志办的人是我最想找的。他们向我提供了几个人的名单,说他们懂运河也懂通县。我对他们说计划中的《运河传》在运河史之外还包括运河文化研究,他们对“运河文化”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下午档案馆副馆长张先生听到我说“运河文化”时,不惟理解简直是有几分钦赞。可见出这些年的“文化热”使“文化”的概念多么深入人心。其实我自己心中也不知“运河文化”究竟为何物。

在档案馆读至中午时靳大成兄来看望,在一起吃午饭,由大成夫人单位作东,张友刚和王强作陪。大成席间颇谈了一些他的本行人类学,谈得友刚愈发沉默,王强越发活跃。

中午 12:40 吃完饭,档案馆要下午 2:30 才开。这两个小时我跑了两处地方,一是西海子公园,一是八里桥。

西海子公园中有李贽墓。大约 6 年前我曾骑车来过,所以进得公园门有依稀相识之感。正值中午,公园的石凳上围坐着打麻将的老人。4 个方凳中间有一水泥桌,好像是专为

打麻将而设。我举起相机拍一个麻将桌上的赤膊老人，一片麻将桌都抬头仰望。一个穿着黄恤衫的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在孤身闲逛，我走近他搭话并行。问他张家湾离县城多远，问他李贽墓在哪个方向，他都一一指点。当我已走进李贽墓园时，他又从远处疾步赶来招呼我，问我是不是在电子部工作。我说不是，他很遗憾地垂下头，告诉说我很像他以前的一个同事。像他这样年龄的人是该有不少依稀记忆的了。

李贽墓园的前部是一个小树林，林中设长条水泥凳。有两个满身白灰民工模样的半大孩子在石凳上一坐一卧，怔怔地出神。坟堆不大，砖墙水泥顶，左右各种一松，一死一活。坟前有当时他的朋友、藏书家焦竑书写的石碑，“李卓吾先生之墓”，所以通县人很多都知道李卓吾而不知李贽。焦竑能为死于囚中的罪人朋友树碑立传，也算是有点肝胆的人。墓阶之下并排立着三块碑。中间一块的题写者竟是周扬，称李为“一代宗师”。周扬悼李贽真是耐人寻味，一个文化总管将数百年前的文化叛逆的事也统管起来了。左右两侧是迁墓纪念碑，右碑立于1953年，说李贽反对封建经典语孟，被斥为狂禅入狱，受到了“刀诛笔伐”。“刀诛笔伐”是古语，因同我们从小在大批判文章中习见的“口诛笔伐”有异，所以十分醒目。由“刀诛”变为“口诛”，几百年的历史演变毕竟小有成就。这碑文说李贽的墓原在马厂村（注意不是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复辟的马厂），因中央卫生部征地占用马厂，所以将墓迁移。我印象中迁离马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马厂村民总是破坏李墓，将他的墓碑一次次推倒；因李贽被斥为“妖人”，所以历朝马厂百姓都将其视为不祥，有民谣说“李卓吾倒，马厂好”。这材料好像是我上一次来这里时从石碑上看到的，但这次却

遍觅诸碑而不见。左碑立于1983年,记该年为便于管理和参观,将李墓由1953年的新址大悲林村南移至县城此处。李贽墓30年而遭两移,不知当喜当悲。这最后一移竟使李贽在城里落下了户口,也算一种平反落实政策吧。

公园东部还有一个园中之园,即燃灯塔景区,需买票才能入内。时值中午,看塔的老头吃饭去了,所以园门上锁。园内有荷塘和鱼池,一双父女带着小凳子前来钓鱼也被拦在门外坐等。父亲四五十岁,脸上密布的皱纹掩不住他快活的表情与眼神,攀谈起来知他是设在通县的北京护士学校的校工。1974年建校时他自北京调通县工作,“别看年纪不太大,我也算是护校的元老了!”他说现在运河臭得冒烟儿,1974年他来时要好得多。我问他燃灯塔的来历,他也说不清楚,只告诉我原来塔的顶尖上长着一棵树,居然长了几十年,后来修塔时将其移下来种于塔旁。“大概是长在塔尖的鸟粪上吧,”他说,“你看这塔修得新,跟后建的似的,我瞅着就没有原来破破败败的时候有味儿。”他居然还是好古主义者。他女儿十几岁,很漂亮也很文静,坐在那里静听乃父神侃。可以想象这个“护校元老”一定是娶了一个漂亮媳妇,护校是一个可以挑漂亮媳妇的地方。

中午1:40离开西海子公园西去,10分钟后抵县城西八里桥。八里桥是老百姓的叫法,它学名“永通”,是通惠河与北运河的交汇处。看这桥也很熟悉,6年前来通县时也曾来此。那一次是来看巩传领,他当时在通县办一家假合资的公司,公司设在八里桥南燕京牧机集团的招待所内。傍晚小巩同我散步谈他的抱负,来至桥上。当时我尚不知道这桥还很有来历。小巩说他的公司设在通县是吉兆,有一通百通之意,而且就在

永通桥旁，还要永远通下来。当时小巩是“总经理”，他公司的董事长叫周凡佳，已 60 岁，从铁道科学研究院门房的职位上刚退休下来，一口山东口音，原来是个快乐的老混混。他向我也大谈抱负，说 5 年内要打回北京去，将“王府井变成周府井”。他以为王府井原是老王家的地盘。周并介绍说他已让小巩找人创作一首歌曲，让公司所有员工唱，歌名他都想好了，叫“没有周凡佳就没有我公司”。小巩私下对我说“去他妈的蛋”。如今 6 年才过，小巩早撤回北京继续赔钱，他在通县续娶的媳妇已生了一个孩子并已再次离婚，周凡佳和“我公司”都不知所终。永通桥下河水虽脏却依然流淌，永通桥在南北两座新辅桥的映衬下更加古老也更加坚固。永通桥曾见证过一座城池和几个时代的兴衰，一两个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更不在话下。

永通桥高而陡险，桥下有水皆黑，偶而闪出的浅滩上现出赤橙黄绿的五颜六色。桥东的河段上河道中间建有分割坝，大概是通县治理运河的一种什么措施吧。

1997年8月15日：张家湾

142

继续报告昨日行程。昨下午4:00钟自通县县委档案馆出发，寻路往张家湾镇。沿京津公路南行约8公里，傍公路有一条新建的大街，赫然标着张家湾。汽车拐进此街，缓缓行走，第一步是先找旅馆住下。街的一侧建筑物很突出，镇政府，邮电局，工、农、建诸银行，门脸都很鲜明；而另一侧则绿树荫掩，只隐约见出长着绿苔的围墙，从车窗中也看不出是什么门面，只知道肯定不是旅馆。街道约一公里长，倏忽到头，街头倒是发现有一家旅馆。这旅馆的门墙上贴着好多字，有卡拉OK、美容美发、桑那浴等等，在这些字的包围中倒是还写着“停车住宿”。于是停车准备住宿，仔细打量才发现门口还插着一块单独的牌子，上写着“妙丽旅馆”。这名字有几分暧昧。入得门厅一个大嫂模样的人自柜台出迎，说是百元一宿。我问房间什么设备，答曰有空调、电视、沙发，还有公用的

卫生间和浴室,24 小时有热水。大嫂见我面有犹豫,马上说明如果真住价钱还可以商量。价钱倒是不贵,但这妙丽的名字和当柜的大嫂使我看出这是一家私营旅馆。出门在外的人容易信公而不信私,我前不久还读了 Danold Dhle 的一篇小说,写一个少年在一个小城投宿一位老太太开的旅馆,而这老太太的业余爱好是制作生物标本,桌下卧着的狗、窗前站着的鹦鹉看起来栩栩如生,但却都是标本;就连两年前来此住宿的两位大学生也被她剖制后存于楼上;这老太太尤爱年青男子。小说写到这少年喝了老太太的夜茶后感觉昏眩时戛然而止。我已并非少年,但想着这样的故事也难免股票。遂决意再回街上寻觅一遍,看有无公营旅店。不一会又寻回另一个街口的镇政府旁。镇政府门口的通道上摆放着标语架,上有大字曰“勤政、廉洁、为民、求实、向上、创新”;仔细打量门的另一旁也摆设着标语架,也写着同样多的字。这镇政府倒是好话说尽。我决定进这大门问问镇政府有无招待所。大门内的花坛旁蹲着一小伙人,看样子是镇领导们的司机,他们正在热闹地闲谈,见我进去都将目光集中过来。我说明来意,他们说招待所是有,但不对外;问我从哪儿来,我答曰北京,他们说北京来的倒可以去问问试试,让我先去传达室找门房联系。门房老头指点我去找镇府办公室接洽,到了办公室见空空如也,一个 20 多岁的小姐看有人来才从对过的房中走出询问,问清后让我去厢房找行政科安排。行政科所居的厢房有点简陋,楼房很暗也有点脏;我找到行政科的办公室,一个很英俊、国字脸的中年男子听后即去找招待所房间的钥匙,问了半天也没找到拿钥匙的人,他让我等一等。等的功夫他说起这招待所条件差,不对外,都是来办事的人走不了才住这儿。我问招待所

在哪儿，他说就是这个楼。我凉了半截，问房间有无台灯晚上可以看书，他说没有。见我有退意他建议我不妨去住街那头的旅馆，那里条件好，我问在哪儿，答曰就在最西头，我知道他指的是妙丽。索性还去住妙丽吧。我回到大门时司机同志们还在聊天，看见我关切地询问联系好了没有，听说没联系好他们也异口同声地推荐妙丽。既有这样的口碑就不会太差，我又折回妙丽，房价还到 80 元。我住二楼，二楼走廊两边各有一个凹进去的仄狭的厅，每个凹厅开着 3 个房间的门。出于节电的考虑廊灯灯泡大都取下来了，一排 6 个灯口只有一盏灯亮着，显得有点阴森。房间倒很宽敞，砖砌地板铝合金窗。服务员是个小男孩，他插上一个插销空调机立刻轰鸣起来，声音虽大但也真是管用，屋里马上起了凉意。洗脸间和厕所公用，但十分干净，见出了这个小男孩的勤勉。询问才知他到此打工不过两个月，来自山东淄博。小小巧巧文文静静的男孩。

住下后我下楼问大嫂样的老板娘这里离运河有多远，从前闻名四方的张家湾运河码头在哪里。老板娘说离运河四五里地，码头早没了，只离此不远有个上码头村，村里什么都没有。再追问老板娘就支吾起来了，说“运河的事你得去问老人，我就是小时候坐过河里的小船，大了就不往那一片去了”。我很失望，出得店门，见宽大的街道上行人寥寥，夕阳的斜晖打过来有一种空寂冷清的气氛。绕到旅馆背后，背后是茂密的玉米田，远近看不到一所民居。我很发愁也很失落，兴冲冲地跑到张家湾拜访野老、寻觅史迹，原来张家湾竟是一条机关和饭馆联成的空街！我还有几分迷惑不解。

还是小男孩服务员的告诉之后才使我恍然。他说这是开发区，老张家湾街离这里还有 4 里路，因镇政府迁到了这里所

以这里就成了真张家湾。已是下午 5:30, 事不宜迟, 赶紧找老镇去。在旅店门口我看见老板娘正同一个青年男子说话, 忙问老镇怎么走。回答是顺着门口的小路一直向右步行, 二三十分钟就到了。我想找辆出租车, 这时候青年男子搭话了, 他说那太不值了, 他盛情地建议我骑他家的一辆破自行车去。真是太好了, 有自行车就有了自由, 可以直逛到天黑。老板娘介绍说这男子是她小叔子, 是旅店隔壁饭馆的老板。

自行车很旧, 车坐高得出奇, 无铃无闸无锁, 但还真是解决问题。我骑车走过玉米田, 路过漂满细碎绿萍的河沟, 甚至还路过一道不知何始何终的小铁路, 不一刻来到一片大村落模样的居民区, 整齐的街口, 街口一座房的山墙上写着几个已经褪色的大字: 张家湾镇村。既是镇又是村, 有点糊涂。或者原来是“张家湾镇”, 后来镇府搬走后又降成了“村”, 细看果然村字像是后加的。这张家湾老镇没有楼房, 房舍一色的红砖红瓦, 有的院落还很有点气势, 从敞着的街门瞥望见院里侧是青砖铺地。但大部分房子都显得有点晦旧, 大概红色是最经不住风雨尘埃濡染的。街面上到处是阿拉伯语的门联和招牌, 不时碰见卖牛羊肉的摊点, 甚至还有一处新修的水泥抹脸的清真寺。这里竟是一处回民聚居区。运河沿岸多回民。拐弯顺着一条小胡同走, 走着走着忽然眼前一亮, 前面在紧密的房舍群中竟出现一大块敞地, 敞地上矗立着一座崭新的三层大楼, 上写着“通州区张家湾小学”, 是大红字。通州区还没挂牌, 这里先已用上了。这大楼用白色的瓷砖贴起来, 白得刺眼, 在一片暗淡低矮的民居中宛如奇迹。这小学用铁栅栏围起, 楼前是个操场, 可惜的是两个篮球架子不知为何均已横卧

在地上。把它们推倒不知为何。看起来小学是刚建的，所费一定不菲。标语云“再苦不能苦教育”，这本是对的，但办教育决不等于盖房子。现在许多地方官就把办教育简化成了盖教学楼，盖因房子漂亮一眼就能望见，人见人夸，政绩凸显。把有限的办学款这么用可真是太糟糕了。1992年我在青龙县一次县委会上就一笔教育经费的使用力陈已见，坚决反对将这钱拿来改建并非危旧的教室，主张用来培训教师和改善教师生活条件。办学关键在于教师。我当时用了一句很刻薄的话，说一个傻瓜即使在人民大会堂里开课也只能教出一群傻瓜。当时的青龙县委第一书记王文义支持了我，我至今感念此事。王文义教师出身，良知未泯。

言归正传。在当街的一个院落门口我碰见三位坐在门阶上乘凉的老人，两个老头一个老太太。我下车搭话，说到张家湾镇非常有名，老头的脸上面露喜色。老头说从前张湾本镇就是大码头，有大盐场与大皇木场，供全北京城吃盐和盖房子，张湾有好几家大盐商。说当时停在这里的船很多，有十几里长，“船首张家湾，舵尾林二四”。我问他“林二四”的写法，他告诉我就是姓林的林，一二三四的二四。我问这“林二四”是什么意思，他也不知道。晚上读材料才知这“林二四”应是“里二泗”，是一段河的名字。我问这里还有什么遗迹，他指点我去看一座老桥。按他的指点我穿过一条胡同找到了那座被他称为“北大桥”的老石桥，石雕多已风化且多有龟裂，石樁似有折断致使两边的石栏都已经歪斜，但越是这样的残破越有一种浓郁的感染力，恰如通县卫校的那位“元老”所言。桥面是大块的圆滑的蓝青色石头铺就，起伏不平中见出当时雄浑的气势，经过200多年十几代人的踏踩仍闪亮着历久弥新的

石头光泽。这老桥真是太美了。这桥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从文物局立的白石碑上我才知这“北大桥”学名为“通运桥”。桥边是一段古城墙遗迹，新修太过，已无甚可观。桥下还盛着些发暗的滞水，桥的两头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蒿草。乡镇房舍前后的蒿草真是惊人，居然可以疯长得那样茂盛。

运河张家湾段 1801 年因水泛淤塞停航，清理后又淤，遂罢船。200 年后的今天张家湾一衰至此，繁华凋尽，张家湾这个在运河航运时代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今天已成为华北平原上再普通不过的村名，淹没在无数“杨各庄”、“李家村”中。200 年间张家湾由城衰落成镇，由镇今天又已成了村。城市也同人一样，有盛衰，有兴亡。

我在张家湾老镇的每条街道上都巡视一遍。镇的尽头是凉水河，河很大，水也不小。河上有座很有规模的水闸，上写着“城乡结合，兴修水利”的口号，看来颇有年头了。一个独眼的凶巴巴的中年男人坐在闸边，我问他这闸是何年所修，他答说是 1970 年。我沿着河岸骑行了一段，在岸上看到了奇怪的东西：一座起于地下的房样建筑，微微错开着厚厚的水泥门，这座半显于地面的建筑上面和两侧都残留着泥土，好像它是新从土堆里挖出来的。这建筑的显露部分被用红漆和白漆画成俗艳的砖的图形，但近看即知都是一色的水泥铸件。有两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骑车路过，我问他们这是什么东西。男孩们面面相觑，也不知其所以然，其中一个猜测说这是古时候留下的东西，并说再往前走还有更大的，几层楼高。有水泥就肯定不是古代的东西。回过头来我又问闸边的独眼男人，他还在那里坐着， he 说是地堡，是解放军修的，现已废弃。当地的男孩居然不识当代的物事，更难指望他们知古了。

回张家湾新镇的路上我看见一条岔道通向一个大院子，院门口挂着标牌，走近一看是“北京尼特贸易公司”。观其名像是合资，我问看大门的一老一少是同哪国合资，老的那位门房笑了，答曰“合资？”我明白了这可能是假合资。叫“贸易公司”也有点不清不楚，我问到底经营的是什么，老门房答说其实就是一座粮库。我望见院内的仓样建筑和严禁烟火的大标语，知其言不谬。粮库就是粮库，卖粮就卖粮好了，干吗这样故弄玄虚。同老门房聊起运河，他说河水是从六几年开始污染的，现在只能浇地用了；这河浇出的粮食吃着也不踏实，保不齐有什么毒，但不吃又有什么办法。想到次日的行程我问他这里离漕县有多远，他说“大概有 30 里吧，搞不清楚”。我半询半考地问他漕县是通县的一个镇为什么要叫“县”，他更是不知。我只好问他漕县大不大，这时他作了一个惊人的回答：“我没去过漕县。”我惊问他是不是本地人，他答说祖祖辈辈都生长在张家湾。我问他岁数 he 说是 56 岁。从地图标示看张家湾离漕县决不会超过 10 公里，且都傍着京津公路，这位在张家湾过了 56 年的老头竟然没有去过漕县！我问他就不去走走亲戚、赶赶集什么的，他的回答十分理直气壮：“亲戚没友，赶集哪儿也比不上张湾，原来是五天一集，现在是三天一集，买什么有什么，我去他漕县赶什么集！”碰上这样的老头你只能摇头而去。我推车走出好远还听见他在为自己创造的奇迹而自鸣得意：“去漕县干吗，家里有人伺候就行了！”运河时代张家湾人不远万里地走南闯北，再也想不到自己会有这样足不出十里的后代。

天黑了，我回到妙丽旅馆的隔壁饭馆吃晚饭。要了炒小

白菜和炖牛肉，牛肉炖得很烂，有浓汤，很可口。饭馆老板一家也在吃饭，同老板边吃边聊。这小老板说他兄弟4个，他自己开饭馆，他哥在隔壁开旅馆，他还有两个兄弟合开一家工厂。饭后他送我出门，我见门口插着高高的三杆旗，是天安门插国旗用的铝制旗杆，问他这是什么旗。他答说是彩旗，插三杆旗是代表他兄弟的三份产业，左边是旅馆，中间是饭馆，右边是工厂。——张家湾毕竟还有这样气盛的人。

回到旅馆我向老板娘讨了一盏台灯写信。老板娘听说我要写东西甚喜，说你第一次来我看你就像个作家。她给我找的是一盏红塑料的老式台灯，灯座宽大而复杂，上面有很多字，一处是“把握时机，珍惜生命”，另一处是画龙点睛的格言：“学海无涯”，还有一处是用汉语拼音拼出的吉祥话：“岁岁平安如意”。真是饶舌得很。

1997年8月16日:杨村

150

因见闻颇多,一天事情当天报告不完,所以今天接着说昨天的事情。

昨中午 12:00 在妙丽结帐,寄走在通县复印的材料,坐上一辆只有顶灯没有计价器的假出租车,以 20 元的价钱谈定漵县。司机 1961 年生,凶相中又微露憨实。途中我问他妙丽老板一家是如何起家的,他答曰这家的父辈有做点心的手艺,做高级点心,很有名,“文化大革命”后他又重操旧业,他的点心行销远近,为儿子们创下一份家业。父死后两个儿子继承了点心厂,两个儿子分得钱另作旅店和饭馆投资。看来这家的原始积累来自知识产权。“镇上还有比他家更有钱的呢,与妙丽一家并排的其他卡拉 OK 和饭馆的老板都是建筑队的包工头,一个工程下来钱就海了,我停车等客人的那家饭馆老板就有 3 辆高级轿车,有奔驰。他原来是在生产队给牲口钉掌的,

改革刚开始就去当包工头。下手早哇。现在再下手就晚了,没有人没有路子就不行了”。他告诉我银行后面有一片公寓楼住宅区叫芳草园,是镇里盖的商品房,几万元一套,全镇各村有钱人都来买房子落户。这使我悟到这个新镇的建设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乡村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模式。老的村落没有发展余地,须在原来的野地上划一“开发区”,这“开发区”就成为未来城镇的基础。开发区自然能吸引一些外来资金开办工厂,同时它还把一乡之内最有钱有势的力量吸引聚集在了一起,成为一处颇有发展潜力的居民点。看张家湾新镇的门脸和居民就知其大概:政府、银行、邮局这些大的有钱有权的公营单位,各类工厂企业,四村有钱人的住宅及他们兼营的餐饮住宿娱乐业。等各种产业在这里扎根扩大后,就又会吸纳一大批各村无资产却有技术、文化至少是有力气的雇佣劳动者,这批劳动者中有不少还来自外县外省;劳动者久而久之也会在这新的城镇扎下根。新城镇会不断扩大,最终会将它邻近的村落吞食,联成一片,并以它的生活方式甚至房屋样式影响吞并的村落。这样一个城镇就会出现不同的街区:城镇母区,新并进的还有待不断改造的多处子区,子区会在城镇的继续发展中不断拆迁改建。——这样一种城市化方式是优是劣,是福是祸,非我这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门外汉所能置喙。

继续报告行旅。终于在 12:30 来到溧县,见竟是一处比张家湾远不如的地方,甚至找不到一家旅馆。这时候我意识到原来计划中的跳乡前进法可能得改一改了,因为乡与乡之间往往根本没有汽车交通,很多乡里也根本没有旅舍。不如改为县城驻足,住下后骑自行车再向四乡探伸。这时候出租司机介绍说沿京津公路再走十几公里有地方叫兔子店,是大

地方，称为“金三角”，还有一大片仿北京城建筑的缩微景区，离运河也不远。我依荐前往，仍坐他的车，但在地图上怎么找也找不到觅子店。就这样胡里糊涂地来到觅子店，果见楼房有点金碧辉煌，许多工地正在施工，街口立着大牌楼曰“金三角”。但街上同张家湾新镇一样寥无行人，近处也无民居，亦是新城镇“母区”。有一家很像样的宾馆曰“香安”，大厅里俨然镶着二星，问价格曰标间 160 元。台前与总台小姐聊天的一位小伙子大概是住客，他力荐我住此处，千万别住“金三角”里的小旅馆：“小旅馆不卫生，而且你也知道现在的社会状况，什么事儿都有。”但我对这金三角和缩微的北京城了无兴趣，无心住宿，翻过地图后决意直取武清县城杨村。在京津公路上等长途车的当口，我注意到草丛中有块不起眼的地名石碑，上面刻着“安平”。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这地方老百姓叫觅子店，大概是古名，而现今的学名叫安平，属河北香河县辖，所以宾馆叫“香安”。称“金三角”者，乃因安平镇处于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的交界处。河北省还另有一安平县，在冀中滹沱河畔。

我等来了北京至天津的长途车，招手即停，至武清索价 10 元。车经过武清县的大沙河、河西务、大孟庄、南蔡庄诸乡镇，于下午 2:00 抵杨村。一路上见武清境内的标语很有独创性，乃多是“爱党爱国爱集体，爱岗爱邻爱同志”。乡下很少有长大的房子能写下这么长的“六爱”，所以往往谁家的屋后冷不丁地写着“爱党”，隔一口池塘或一片菜园才在另一幢房子后接上“爱国”，而到了“爱同志”早已村尽房无，只好割爱。

先结算一下这 3 天来的花销吧，Money is important

thing。

通县买水 6 元
通县档案费 50 元
张家湾住宿 80 元
张家湾晚饭 29 元
张家湾邮费 7 元
张家湾至安平租车 40 元
安平至杨村长途车费 10 元
杨村住宿 165 元
杨村 15 日中饭 21 元
杨村 15 日晚饭 10 元
杨村买资料 60 元
杨村邮费 14 元
杨村 16 日中饭 35 元
杨村租自行车 6 元
杨村至天津车票 5 元
天津晚饭 20 元
天津住宿 64 元
共计 622 元

迄今为止共发生费用 17 项。有 6 元钱不知所终。俗话说穷家富路，我这一趟可谓俭省得很。可步行时即步行，绝慎抬手“打的”。

昨天至杨村后先觅住处。先在商业局服务公司开的旅馆看了一眼房间，闷热难当，辞去。来到武清县府招待所雍阳宾馆，大厅里人群熙攘，看会标才知天狮集团在这里进行传销培训。据说传销是一种人生境界、一种文化，各种传销培训、讲

演会上有人涕泗交加,感动得大家都热泪盈眶,大有誓死将东西卖出去之激昂群情,宛如邪教的见证会。总台小姐在应付人群的忙碌中告我还有 220 元的标间。我掉头而去,这里太贵也太乱了。1992 年春我同青龙县长董先带领着 60 多位乡镇干部来武清参观乡镇企业时即住此处,庭院式的格局,当时的印象是很古典也很幽静。现在竟成了传销的训练营。

出得雍阳宾馆向西,见县人民礼堂门口有招待所对外开放的招贴,循路标进去。一个一脸鼠相的中年人把我领到礼堂大院中的一个小院里,有一排旧且脏的平房,进得客房见摆着 4 张床,裸露着的褥子早已辨不出是什么颜色了。鼠脸人赶紧解释说要住的话会铺上新床单。我问什么价,答曰一张床 15 元,若包房就是 60 元。这也是大可掉头而去勾当,不过我还是婉言推托说还要到别处看一看。什么人民礼堂招待所,无非是管理礼堂的人穷急眼了把自己的办公用房拿来卖钱罢了。

最后终于找到一家合适的住处,是紧傍着运河大桥的金河大酒店,武清县建设银行所办。“金河”见出银行特色,不知其意是“金子一般的河”还是“金钱像河一样滚滚而来”。大约是后者吧,难以想象整天伺弄钱的人会对一条河有多少爱心。

金河大酒店标间价格 160 元,我想这可能是低档宾馆的常价。房间中倒是整洁,我站在窗口时才发现这里看运河视野有多好。从 9 层楼的高处眺望,河流婉转,楚楚可怜;且高处看水难察其细,不见污染而只见碧绿,运河竟十分地美丽起来。卫生间的马桶有些漏水,找服务员来小修即愈;马桶盖初看很脏,但细着才知不是灰污而是塑料本身的麻点,也就算是干净了。地柜上插着钥匙,可将背包锁进去,但上锁时钥匙转

扭不能到位因而无法拔出，情急之中我站起来用脚去踏，感觉还没怎么用力时就已将钥匙踏断，断于锁中。这下麻烦了，还得找锁匠来撬锁才能取出行李。一来二往已到了下午 3:30，忽觉饥肠辘辘，这一天从早起到此刻我还仅吃过几片富丽饼干。

在近处租得一辆旧的二八型飞鸽自行车，在雍阳东路一家饭馆觅食。老板一家围坐在餐桌上打麻将牌，见我进屋赶紧喊服务员招呼。我点了蒜子牛肉，是牛肉与整瓣的蒜红烧，尚可。

这一天在杨村没吃多少饭却喝了不少水，从入住宾馆到深夜入睡共喝了两暖瓶，实在是不停地渴，渴极之中粗茶（宾馆的茶都是极粗的茶）竟如琼浆。只是两暖瓶水喝下来舌头有些发涩，似乎是舌苔厚了起来，整晚不退。方知杨村的水大概是有些问题，才不敢多喝了。昨天晚饭我是夜里 11 点吃的，在街头夜市上吃的沙锅羊肉丸子。

3:30 吃完中饭后即去访书。在县档案馆购得《武清县志》，精装本，原价 118 元，优惠我半价。在县政协获赠《武清文史资料》数册；在县文化馆获赠县里的文艺刊物《运河》一大摞，馆里并将由他们编印的、现在他们手中居然只剩下一册的《武清民间文学集成》借我，嘱我用完后寄还，以使他们手中有自己的作品。较奇的是在县邮电局讨得一本《河西驿写真》。这本写运河的书竟从邮电局讨得，说来还真有些曲折：这本书的三位作者是北京邮电部的干部，是业余文史爱好者，他们写了书却由他们下属的下属武清县邮电局拿钱出书，武清县邮局很聪明地当了一次大头。因而武清县邮电局有许多存书，逢人便送，他们说上门来讨的倒是头一回。邮电局也确实趁

钱，武清县邮电局在雍阳东路本已有办公楼，牌子也挂在那里，但他们却在新开发的街区雍阳西路上又建起一幢漂亮的新大楼，局机关都迁到新楼办公，害得我骑车绕了好半天。县政府也在雍阳西路建好了堪称巍峨壮丽的新办公楼。关于县府的新办公楼我曾询问过两个武清人的评价，一个说是“胡折腾呗”，另一个却说是为了一步到位，能适应将来发展的需要，多少年后也不过时。

156
·
昨日下午6时，我就着明亮的斜阳沿运河东岸向南骑行。运河的杨村市区段河岸绿化很好，种着颇有些古老的槐树和榆树，地上生长着野苋菜。而河堤内侧近水处是茂密的水蓼，现今蓼花正开，穗状淡红色，微有白意。骑行不久即脱城入乡，运河的乡村地段上贴河多为村落，在堤上骑车可以从两家之间的小胡同直见河流。我曾停下车走进两条胡同观察，见屋后的近水地方多为厕地，间或种着桑树与构树。两个村落之间多为坟地，一个墓碑贴一个墓碑的乱葬公墓，上面所写无非是“先父×××”“先母×××”。若村落之间空地较大则种田。田里有菜有粮，玉米、大豆、花生、大葱、辣椒、茄子、刚刚发芽的萝卜。我很奇怪这里竟是粮菜种在一起，见每一块地都不过二三畦大小。我想这大概是村里的菜园，种菜时心血来潮地捎上了几畦庄稼。后来停车问人，才知这就是全部土地了。我看见一对老夫妇正在砍玉米棵子，停车观望，那丈夫从田里抬起头打招呼，我看见他两鬓已白。他说这是杨村镇上下园村，这里人合3分7厘7的土地，他家4口人，才1亩多地。我问他家里都有什么人，他突然伤感起来了，说儿子头几天刚去世，是脑瘤，现在家里只有老两口和一个姑娘。我悟

到他说家里有4口人是一时难改的习惯。他接着说儿子住院欠下几万元的帐,且得好些年还。我问土地怎么这么少,他不无愤懑地回说:“都卖了呗!”从交谈中我得知村里刚卖给电力局一块地,卖地款并没有回到村民手中,也没有像邻村那样将地款存入银行,每家发一个小本定期去取利息,而是被村支书用来买了辆红旗轿车。全部地款买车还不够,支书又从“五建”(大约是“第五建筑公司”)借了5万元添上才把车开回,接着又雇了一个司机。“村里一点副业没有,他坐着这红旗轿车天天跑不知都跑的什么!”这白鬓老农接着说:“我们村地虽少,但离城近,要发展不是不能虑量啊。比如建个游泳池,搞大篷,都挣钱哪!但书记的心思不在这上面,别说建厂了,村里原有的旅游鞋厂也被他盘出去搞黄了。”我问村支书超标购车上有没有人管,他答说听说挨了批,谁知道呀,车他现在还坐着,也没见咋的了。他老伴插话道:“他一天到晚坐车去城里跳舞,没正事。”这时白鬓老农忽然面色神秘起来,压低了声音说:“这就是阶级报复!说是没有报复,你看报复不报复!他现在也掌了权了,原来不就是个地富子弟!”经询问才知村支书的爷爷原来是富农成份。“我今年50多岁了,是从部队上复员的,我就看不惯!”这老农还告诉我一件更气人的事:村里不给村民划宅基地,而把宅地卖给城里人,长14米宽12米卖1000多块,并且不卖给村里人。“我家盖房子的地就是从城里人手里转买的。”

基层政权状况恶化而又治理无途,颇堪忧虑。老农说“阶级报复”云云,当然是言不及义,但至少表明了一点,那就是农民在寻找抗议语言。老农未必真对“阶级报复”本身有多少理解或者有多少仇恨,但宣布为“阶级报复”是他在此情此景下

能找到的表达敌对与反抗的最有力的方式。重要的是要明白农民已经在表达敌对与反抗了。

我把话题转向运河，白鬓老农告诉我运河六几年还清着呢，那时河里还有螃蟹、王八，现在连海螺也没有了。有时有鱼，但那鱼谁敢吃呀！浇地还行，但有时也把庄稼浇死。早先河底很瓷实，叫“铜帮铁底运粮河”，现在河底全是烂泥。一到夏天还味着呢！加上城里垃圾往这里的河边越堆越多，臭气熏天，日子十分难过。我听了心里难过极了。这里的河段比通县的河段还要好。这里的水起码还是绿的。我在村中的胡同尽头看细碎的、几乎是粉状的绿萍随水流散开，知道这水还有救。要救就得赶紧救。

今天上午骑车沿运河北上，西岸往，东岸回。有时断、时续的细雨，伞时打、时收。拍了不少照片，有蓼花，有河岸的老槐，有河里扎的渔网，有河道弯曲处，也有河道里倒伏的大树。河里倒伏的大树最是河流的意象。

下午乘小公共自杨村来天津，住天津一轻局招待所。这一带是南运河、北运河、大青河与海河的交汇处，故称三汉口。下午 5:30 吃完晚饭，沿河步行往返，晚 8:00 至。

1997年8月17日：杨村——三汉口 ——杨柳青

出门游逛4天，已经有了长久离别的感觉。现在伴着空调机有力的轰隆声给你写信。我住的这家“西青宾馆”坐落在杨柳青镇一条幽静的街道上，叫公署前街。60年代以前天津地区行政公署就设在这条街道上，原天津地委刘青山、张子善就在宾馆的隔壁大院办公，他们就是从这里被抓走枪毙的。今天吃晚饭时，宾馆服务员告诉我们这段典故，邻坐吃饭的两名顾客闻之激动，认为现在要有那时候惩治腐败的决心，国家早搞好了。这两位顾客是南京一家大型机械厂的技工，来这里搞售后服务的。他们的见解颇获大家赞同。现在中国人民都把千般问题、万种麻烦的根源归结为腐败，都坚定地认为反腐败可以立竿见影地一揽子解决问题。他们不懂得现代化进程中的诸种困境，也不甚理解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肺腑之言。中国百姓一贯以道德考官，在农业社会中官员清廉

与否也确实是吏治乃至整个统治的头等大事,因为那时候没有无限发展的压力。而今天官员和政府面临的巨大难题岂一个廉字了得。但人民不懂也不管这些,他们按照自己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强大心理惯性众口一辞地要求反腐败。这就是民情、国情,这就形成了对中国政治和政治家的真实压力,不适当地顺慰此种民意将事倍功半,致力于发展所获得的一切成果都将被百姓视而不见,想以致力于建设而赢得民心的一切努力都将被抵销。这就是中国的政治现状。必须以反腐败这项政治斗争来减少经济建设的阻力,经济建设真正应付出的成本是反腐败而不是腐败。但反腐败又谈何容易。一方面是来自人民的强烈要求,一方面又是官员队伍的坚决抗拒,最高统治者必须在这两种基本的政治力量之间作出权衡与平抑,准确地掌握平衡与尺度。一般来说官员的利益是统治集团的眼前利益,而人民的利益则关乎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在两者中作不得已的选择时应抑前扬后。但反腐败、大面积触动官员利益,即使对最高统治者来说也是与虎谋皮、太岁头上动土,官僚机器的反噬能力也绝对不可低估。而且反腐败也决非仅仅有道义感、有勇气就可以奏效的,还必须有足够的政治实力和政治智慧,否则很可能劳而无功。不过,在新任的最高政治领导人自付不可能有绝对强大的政治实力的情况下,恃勇强作也不失为退而求其次的方式,说不定还可以侥幸致胜。无论如何反腐败必须占据充分的道义优势并有足够的诚意,决不能把反腐败歪曲执行为排斥异己的倾轧。

话不觉扯远了,收回到行程上来。前天晚上 10:30,我下楼去寻晚饭吃,走进杨村雍阳东路最头上的一家饭馆,几个老

少爷们在赤膊闲侃,告诉我说现在火已封了,建议往下走一段到夜市吃沙锅。吃沙锅倒不太忙,我坐下来加入他们的谈话。3人以上的谈话必有一个主角,这屋里的主角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一身结实的黑肉,块头不小,脑袋也大,张起口来有一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自信劲头。我想这大概是卫嘴子的郊区版吧。他说,旁边一个胖小伙子捧眼似的帮腔应答,另外一个外地小伙计模样的少年坐在一旁只有听的份儿。我问这大块头武清特产糕干的来历,他似夸耀又似不屑地说:“糕干!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也就是打乾隆年间开始出名的。当时乾隆皇帝南巡路过武清,地方官们犯愁了:拿什么给皇上吃呢?山珍海味在宫里早吃腻了,还是贡上点老百姓常吃的东西吧!就送上点老百姓家的点心。你想地方官一心好意送来,乾隆皇帝能说不好吃吗?就夸了两句。地方官又请乾隆皇帝命名,命名就是正式起个名,乾隆皇帝就命名为糕干。从此这糕干就出名了。什么东西沾上点皇上的边儿就出了名,其实也未见得有多好吃。”历代皇帝总是和运河有不解之缘,直到今天运河沿岸的店铺还多依皇帝取名,杨村滨河街道上一个家具店就赫然挂牌“弘历家具店”。大块头又向我说起运河,说他60年代转业来武清时水还很清,他还常游泳。这十几年水坏得尤其厉害。他认为水坏主要是因为乡镇企业太多了。“过去只有国家的少数工厂,你就敞开了污染又能污染多少。现今到处是厂,村村都有,农民的厂又没多少钱去处理水。”他这话倒是引起我的联想。乡镇企业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道路,但乡企的发展是以高强度地毁坏资源尤其是毁坏水为代价的。计入这个成本后再来计算乡镇企业的收获就不会太乐观了。现在全中国地表几无净水,黑河、褐水成了平

常景象，有净水的地方都是暂时还没开工厂的地方，将来也决然难保。没有净水中国将成为绝望疯狂的国土。西青宾馆餐厅的招待员说滦河水引来之前天津人都尽量不喝水，再渴也忍着，因为水是咸的且有毒。滦河引来之后才喝上了甜水。我想如果滦河水也被滦县的乡镇企业污染了该怎么办呢？一个县的乡企污染一条河真是易如翻掌。天津三汉口金刚桥旁立有高高的引滦入津纪念碑，碑上的上方是一个年轻母亲抱着一个小女儿的雕像，当地都称作“母女碑”或“盼水碑”。没有比母女更弱小、更无告的形象了，天津人就以这美丽、弱小、善良的符号来衬托他们内心对水的渴望和对缺水的无比恐惧。

162
说到了乡镇企业，大块头介绍说武清的乡镇企业主要是两项，地毯和制鞋。“现在武清的鞋厂都不行了，都快关门了，”他说。我问原因，他说是因为南方鞋的冲击。南方的鞋样子新，时髦，但不耐穿。武清鞋厂开始时不信这个邪，认为自己凭真材实料准能吃饭，他们的皮鞋都用好皮子，一张皮只分成两三层，而南方鞋厂一张皮最多可切割成18层。“现在武清的鞋厂也服了，斗不过就是斗不过，真材实料就是斗不过样子货。”我有些吃惊，一张皮怎么能切成18层。这时候大块头又得意起来，仿佛这18层是他亲手切的：“技术高呗！没有高技术怎么能作假！从前没技术时什么都是真的，现在有高技术了什么假不能做！不过，”他解开自己腰上的皮带，“我这皮带可是原皮的，用了20多年了，一点也不坏。”这时候胖小伙子也解开自己的腰带，仿佛是为了证明大块头的高明似的说：“我这皮带就是再生皮。”

大块头无意中说出了时代真理。如今就是一个样子货的

时代，一个快餐的时代，一个包装的时代。变化过速的生活节奏使人们对未来有了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人类的生存心理发生了可以说是根本的改换。百年人生不再是人的计划单位，人们更看重抓住眼前，人生被分割成了一个互不连续的年头和互不相同的工作单位，投机、作假与赌博成了大众心态。于是人们更专注于物质的感官的快乐，因为精神生活总是与某种长远的关怀与期待连在一起的。祸焉？福焉？悲之？喜之？身处其中，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细胞我们真是很难对自己的时代作出彻底的判断。

昨天的中饭我吃在杨村运河边上一家标着“无污染自助餐”的餐馆。一餐 35 元，餐桌是吧台格式，一个涮锅，各种涮菜仿曲水流觞的样式在桌子中央旋转，给人的错觉是菜无比地多样。我涮了一个小时，但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是已在此坐了 10 年，仿佛我已被闪出了生活之外被定格在梦魇里。这类似一种的幽闭恐惧。我赶紧结完帐走出了餐厅，外面蒙蒙的细雨和凉凉的、湿润的空气使我有回到真实人生的欣喜感。我决计不再在餐馆里久久地吃饭了。

中饭后我在运河边上骑车来回行走。发现杨村城区运河的北段绿化得十分经心，有老桐树、老槐树，也有新的绿篱和花坛。在河岸上我遇上一位清秀的少年在玩，他说自己已 19 岁了，在一家较大的饭庄“切堆”儿，他希望将来能爬上“头火”的位置。他是初中毕业即入伙房的，他说学厨就得从小学起，20 多岁再学就晚了。切堆儿工资 400 元，头火可到 3000。他还认为学厨在武清很难学出来，就是学出来也施展不开。他希望将来到北京挣钱。这个纤弱少年的勃勃野心使我微微有

些吃惊。大概一个现代国家管理的关键所在就是如何容纳、安排和发挥大家的野心吧。

今天上午我在天津同一起住招待所的顾问一天津一轻局退休的行政处长老崔谈天。老崔主动要给我介绍了一下天津运河的情况,说他6岁就长在运河边上,找谁都不如找他。他也确实知道一些运河的事情。他说我住的这个旅馆正处在三汉口,过去是天津的北门外,是天津最大的水运码头,商业最发达。而且天津工业的发源地三条石和河北大街就在这里,有名的天津混混就聚居在这里。他讲完运河又讲他自己,讲自己的经历和对腐败的不满。他讲到混混时眉飞色舞,还不时地站起来模仿混混的动作,而讲到反腐败时声音小了下来,几乎附到我的耳边。他在工厂干过30年,性格很开朗快乐。到了12:00快结帐时他还意犹未尽,让我留下电话等他到北京时再接着给我讲。

今天中饭后我在三条石街走了一遍,又看了三条石历史博物馆及一家工厂的遗址,感慨中国民族工业起步的艰辛。三条石的数十家工厂解放初都经过公私合营逐渐变成了国营大厂,而这些国营大厂如今都亏损,工人多下岗。三条石在南运河北岸,而在南运河南路的“大胡同小商品市场”旁就有许多下岗工人在摆小摊。一位大姐的摊上摆着一堆再生皮的黑皮带,旁边的纸板上写着“皮带厂皮带,2元一条”。我上去攀谈,这位30多岁的大姐说她是皮带厂职工,厂里发下这些皮带当工资,3个月发1000条。我问厂里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大姐说她也不知道,“在家听信呗”。我问她厂子是什么原因搞垮的,她也回答说不知道,她只知道天津的好些厂工人都下

了岗：“这一溜摆小摊的都是下岗工人，你看那位卖酸梅汤的大哥，他是自行车二厂的。”我顺着大姐所指望去，卖酸梅汤的大哥马上把头扭开。原来生产飞鸽牌自行车的工人多神气，现在却来卖酸梅汤！卖皮带的大姐的表情和神态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久久挥之不去：她没怨尤，但却很悲哀。

河对岸是天津工人的诞生地，河这岸天津工人已经下岗。这中间隔着 150 年的时间，这一轮古典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就已草草结束。

下午 3:00 许我自大胡同动身西行，溯南运河步行而上，沿河走过 2 路公共汽车的 6 个站，至天津火车西站。路上见著名的隆昌号海货店留下的老楼刚刚拆光，民工正在清理废墟。我抢拍了废墟和附近的已改作服装加工厂的隆昌号原来的仓库。约 5:00 在西站上 153 路公共汽车来到杨柳青，住下后租了一辆红色的女车（车摊就剩下这辆车了）直取运河，至河边天已大黑。问路时杨柳青的老人回答出奇地一致：“南运河？已经没了！”我追问说至少还有河道吧，回答就带着点教训的口吻了：“都是臭水，有嘛看头！”难怪老人们这么痛心疾首。原来杨柳青的运河曾是南运河最美丽的一段。相传“杨柳青”的名字还是隋炀帝给取的。他看见此地为柳树荫掩，灵感顿生，遂取得“杨柳青”这个自然可喜的名字。要知道多水的地方才多柳啊。

今日花销：

中饭 21 元

晚饭 20 元

长途电话 8 元
三条石博物馆门票 1 元
买皮带 2 元
天津至杨柳青车费 1 元
租自行车费 3 元
杨柳青住宿 82 元
天津买水 2.5 元
共计 140.5 元

1997年8月19日：静海

运河的水至静海已断流，河道干涸，绿草茂盛，河道中央有一米左右宽的残积雨水。在杨柳青时水还流得很旺，30公里之遥已判然相别。南运河水在天津市内呈黄色，而在杨柳青已转为绿。而且杨柳青的运河水流向很怪，天津市内为东流，杨柳青境内则已改西流。有水无水，东流西流，忽黄忽绿，之中缘由非徒步沿河探寻不可得。

今天上午在静海宾馆同静海县志办的武巍德交谈。昨天晚上同武在静海运河大桥桥头——这桥有一个学名叫革新桥——相遇。是晚上9:00来钟，我在宾馆不远处的水产饭店吃完一大盆“二红炖牛肉”——其中一红为胡萝卜，另一红不详——，沿大道信步向西寻河。在大桥头的石坝沿上有老叟二人乘凉，听他们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谈，我前去问讯。他们看来很欢迎外人加入。聊到熟处知一位70多岁，是老财政局的税

政科科长，已退休在家多年。当时财政局税政科不过股级单位，管全县税收，而现在税收已有两个局分管：国税局与地税局。老科长比较寡言，多时，才很善良地搭一句腔。另一位还不过 56 岁，是县化肥厂的工程师，现因工厂停产赋闲在家。这工程师倒对运河略知一二，但也经不住追问，正在被我追问得有点支吾的当口，他得救似地向身后招呼，说“老武来了，老武来了，他是县志办的，懂得多”。我回头看“老武”，已立在我们身后，敞着怀，天黑看不清面容，但感到他有点清瘦。我招呼他坐下，他说“我不应该坐，已坐了一天了”。他把不坐说成不应该坐，当时给我的印象是颇有几分书生的文绉。但马上他就又显出了某种只有读书人才有的尖酸。我站起来向他递名片，他立刻表现出一种以自轻来表达的自傲：“你别向我请教，我什么也不懂。我只是县志办看大门的，掏厕所的。”我没有接话茬同他讨论他的身份，开始询问县志是否已编好；他吵架似的回答说什么叫是否已编好，都已经印出来了。我随口答应说：“哦，刚印出来。”老武闻言马上就拿出勃然作色的语气：“什么叫刚印出来，去年就出版了！在天津市志评会上评为一等奖，没有特等奖，一等奖是最高奖。”我马上就从这武老头的语气中感到他一定是一个经历坎坷、长久受压的人，他下意识地把所有陌生人都当成迫害者和敌人，在最平和的谈话中都习惯性地要作出自我防护的姿态。他接着昂起头，像是对着运河和老天说话：“别人干了 5 年，把钱都花光了，一个字没写出来；我们干了 3 年，把志写出来出版了，一分钱没花。”我表示想明天去买一册静海志，他抗声相问是真想买还是假想买，要真想买他现在就可以去取一本来，“138 元，100 多万字。”我当即表示真想买，他二话不说抄起自行车就走。他似

乎是在用立马取得书来的举动来证明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看大门掏厕所的。趁他去取书的功夫我问工程师，这老武叫武什么，工程师也说不知道，他们就是在桥头乘凉搭话，只知道他原来当过右派。“他脾气很怪，你问他什么他不说，你得激他。你说这事儿没什么人知道，他马上就会说他知道；你瞎说一个错的，他马上会告诉你对的。”工程师说。过了约 20 分钟，老武气喘吁吁地骑过来了，他一下车就声言还开了发票。我站起来翻书，老武说桥头的灯不亮，不如往里走走在街上的亮灯下看得清楚。在亮灯下我把书钱付完，打开书页时见里面夹着几张白纸老武解释说带白纸来，是让我作记录的，不过现在已 10:00 多了，宾馆 11:00 锁门，不如明天再谈。白纸后面是老武的名片，我看见他的名字是武巍德。我马上想起我在水产饭店吃晚饭时，餐桌上有一张顾客扔下的报纸《大邱庄信息》，上有“县志办武巍德”介绍静海历史的专栏，当时还动念一定要找到此人，谁知今日竟如此相遇。

昨晚分手时约定今早 8:00 老武来宾馆。今早老武敲门时已是 8:20 了，他一进门就解释说他刚到法院办点事，晚来了。谈得深时我才知他到法院是催促他离婚判决的执行。看来老武是个口无遮拦且也心无城府的老书生，乍识初谈他就如对老友，把他的身世和家世和盘相告。他的曾祖父说是清代宗人府的官。祖父官小，当过昌黎县知县，当年八国联军杀进县衙，他跳窗躲进庙里才获幸免，死里逃生后决意不再做官，当起了教书先生。在苏州某大族家任“西宾”时，把受业弟子招为东床，他补充说：“我二姑就嫁给了我祖父的学生。”抗日时期武家居于天津：“我祖父临死时将我大伯和我父亲叫到床前，叮嘱宁肯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做事。我大伯日文、英文都

很好，但他兄弟俩一生都谨守父教。所以那时候家里穷得住到贫民窟里。我祖父就当过七品芝麻小官，这真应了中国的老话，叫位卑未敢忘忧国啊。我上的是师范，那是 50 年代，师范出来必须教书，就分到了静海县的一个乡下小学。工作不久就结了婚。因为爱人漂亮，所以受到大家嫉妒，1958 年教师中肃反就被抓到了县里。在县里打呀，从晚上 12:00 打到中午 12:00，让我交待罪行。我没什么交待的，我教学最认真，看到学生吃黑菜窝头，因为几毛线学费交不起就退学，我心里难过。不交待就接着打，直到把我打昏了过去，他们抓着我的手用十个指头都盖了指印，那材料上写的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打这开始我就神经有点失常，被放了出来。我爱人是我同学，很有感情，她带我上天津治病，带的钱不够她就上她亲戚家借。她看到我这样子光哭。治病回来教育局又来通知让去局里报到，邻居们都说人都成这样子了还报什么到。我爱人陪我上教育局，到了局里我就会被逮捕了，出示的逮捕证上说我奸污女学生。关进去一看全是熟人，老张、老王都来了。那一次全县的教师被关起来三分之一。公安局让我承认奸污，我不承认，他们说不承认就送到犯人小组帮助帮助。犯人小组围成一圈，将我围在当中，让我认罪，我说无罪，他们说相信你还是相信政府，我说当然是相信政府，他们说相信政府你就是奸污犯，接着就拳打脚踢。越打我越病，打到后来一点儿也不觉得疼了。就这样我被判了 5 年徒刑，发配沧州劳改。在监狱里我想啊想啊，就想两件事，一个是我太冤，一个是我爱人会伤心，伤心就会死的。后来才知道我想得太简单了，受牵连的不仅我爱人，我母亲打我一进监狱就瘫痪了。我爱人在静海呆不下去了，就回东北她娘家去了，又穷又病，得了一

身病，没两年就死在了东北，我是生没见人、死没见尸呀。在监狱里我越想疯得就越严重，有好几次想自杀。后来我忽然明白过来了，我现在第一不能死，第二不能疯，一死一疯可就冤沉海底了，谁来给我辩白呢。就极力克制不去想那些事，不让精神受刺激。这样自我克制还真管用，疯病直到今天没有再犯。监狱里书不少，劳动完了我就读书，读了很多，有孟德斯鸠、黑格尔。后来就出来了。仍回原来教学的村上，不让教学了，让当农民。不过没有被管制，没有戴帽子。1979年县法院把我找过去，告诉我，我的案子他们又复查了，当时没有什么证据，他们决定为我彻底平反。并说我不仅冤，而且家破人亡，是全县教师中最惨的，让我回去将这些年的损失算一算，列一个表。我列完表交了上去，最后他们赔了我300块钱。受了20年冤枉，赔了300块钱。我也没有跟他们计较。

“我又回去教学。打这时候我开始研究静海的地方史。想我受了那么多苦，一辈子太不容易，得留下点东西才对得起自己。就四处找乡下的农民搜集资料。有一次差点儿死掉。那是我夜里骑车往回赶，后面来了辆大货车，我出于本能往边上躲，直躲到沟沿边，再躲就掉沟里了，这时货车开来，有几根大粗钢管就贴着我的耳朵扫过去了。货车上拉的钢管，有几根是横着放的，我要是再少躲一点儿就没命了。货车只顾往前开，司机并不知道。就这样搜集了不少资料，发表了一些文章，就有了点名气。这时候政协要编文史资料，就把我抽去帮忙。我给他们当责任编辑编了两期。有一天县政府来找，让我到县志办编县志。原来县志办的人在全国各地东游西逛，把钱都花光了，志却一个字没写，眼看这批人也不是写志的料，上面又催得紧，无法交差，只好找到我。我要求从教育局

正式调到县志办，政府也答应了。但调动的事教育局却不同意。教育局对县政府说工作需要不放人，对我却说人家县政府怎么会要你。后来县长亲自找到我，一方面是希望我调过来，另一方面是表示他要亲自找教育局要人，‘我想他们会给我个面子’。最后达成协议我从教育局退休，退休后由县志办返聘，就这样到县志办来了。

“平反后大家见我孤身一人，都劝我再找个人组织家庭。我因怀念我过去的爱人，就没有再找。后来经人劝说找了个人，她还带来个儿子，就这样又结了婚。先是把她农转非，安排到县城的学校当工人。但她太凶了，她和她儿子对我说骂就骂，说打就打。弄得在家里根本无法看书写作。我晚上要看书，人家要看电视，也不敢拦。我有时写文章写累了，站起来活动活动手腕，她也骂：‘个小×打拍子气我！’我活动手腕她说我是打拍子。有时我生病，她能坐在床前咒骂我一天一夜。吵起架来她让她儿子拿刀，要把我大卸八块。我就逃了出来，不住家里，借住在别人的闲房里。就要求离婚。她有后门，她在学校同静海镇书记的老婆是同事，就走这路子让镇书记给法院施加压力。法院就拖，一会说等一等再说，一会又说材料在打印时丢了。拖了一年多终于判离了，却判决财产谁实际占有就归谁。她在家当然把什么都占有了。家里有两处房子，楼房两居，平房两间。楼房她占着，平房她也占有一间，法院判我要再给她 11000 元钱她才能让出那间平房。无论如何吧，只要能离了我也认了，钱不钱的都是身外之物。像咱这样的弱者只求不受欺凌，尽快地得到安宁，得到自由。今天早上我来晚就是去法院催他们让他们赶紧执行。”

老武也给我讲了些运河尤其是运河沿岸义和团运动的情

况,但主要是讲他自己了。他讲叙时面上有哀戚认命的表情,使我看到这位初见觉得尖锐倨傲的人实际上是多么驯良。他的一生就这样过来了,先是受党镇压,后来又受老婆迫害。受党镇压还有点悲剧的意味,而再受老婆迫害则使人听来不无喜剧性了。在命运的悲喜交加中,他成了一位功底颇深的地方史家,成了这一地域文化的记叙者与传承者。在古人的观念中这种职事是应天命的,莫非天命真的是有机心让他这样的人穷而文工?他询问我考察的目的,当得知我要写一本运河方面的书时他建议我写得要尽量深一些,要高扬爱国主义调子,并说还可以就运河题材写点诗歌。他介绍说他正在写一个电影剧本,写静海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借此来弘扬静海武术。他说当然写张德成不能只写张德成,还虚构了一个文人给他出谋划策。

中午我提议请他吃饭,他坚拒说我出门在外花销肯定不小,不要破费;并说他要回家去,今天大邱庄报的人可能给他送报纸和稿费,还特意披露说大邱庄给他的稿费是8分钱一个字,而国家的规定是不超过7分5。

附:听武巍德讲运河沿岸义和团笔记

△八国联军中最坏的是日、德、俄。总是日军打先锋。联军到静海独流镇后杀、烧三天,烧毁三分之二。

△张德成水手出身,运白灰、煤。与联军作战义和团拿秫秸棍,认为自然会变神枪。“曹老师(福田)搬大梨——拿着秫秸棍上前敌。”有专职人员背负神像。张德成于1900年7月14日战败后,撤回独流,向西至王口,募集钱粮准备再战。硬性摊派,把红枪会成员刘义和的儿子绑架。刘家家族大,集合

对付,在三口桥北一华里的芦苇、麻田中埋伏。张的募集船在此遭伏,红枪会用打砂子的火枪开火,抓住张乱刀砍死,尸体顺子牙河流至独流,被人捞起。纪念馆将张画成白胡子,其实他死时才40多岁。

△义和团之所以起于天津一带,因天津感受帝国主义压迫重。历史上有人播下反抗火种:1853年太平军最远就打到静海。有愿神保佑家园的传统。1868年捻军又打到静海。加上静海武术普遍,出过霍元甲。宋哲元在此抗日。民间会道门普遍,村村都有。会道门对治癒病很拿手。三佛会正月十五到麦场上表演,一坐就是13个人,轮番一项项表演。吃碗,倒上半碗水,喝水漱口吐掉,然后就把碗咬掉一块,跟吃冰棍似的在口中化掉。然后手握二雷子点着,一手三个,在手里炸响。接着“上发条”,比韭菜叶宽的铜杆子拿着插到嘴里。还用鞭炮绑到光膀子上在身上放,拿烧红的铁索用手捋,“背鞭捋索”。义和团表演用砍刀砍肚子,不受伤即是练成,叫“过刀”。“过枪”就是用火枪打,衣服烧成眼,人不受伤。这前者是硬气功,后者是掌握一定距离。三佛会有点像特异功能。《清代野迹》纪喇嘛在皇宫表演吃玻璃。民间至今仍有吃火柴头的。

△义和团来静海主要是因为水路方便。张德成进出天津就是走运河。

△义和团有些组织只有静海有。如已婚妇女组织“蓝灯照”;寡妇组织的“青灯照”。天津运河西岸乞丐与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组织“砂锅照”,义务募钱粮为义和团造饭。砂锅照总堂在范庄子,离县城7里。1958年最后一个红灯照在静海故去。

△红灯照都是些被视为低三下四不正经的人。独流最初创办者5人名已不传。林黑儿也被视为破鞋者流。独流红灯照创办者有5人,名字不传,只知绰号铁笼篱、海榔头等。

△义和团最初是在本乡杀赶洋教士。张国臣在杨成庄、砖垛一天杀教民200多人。其中有周岁小孩被张国臣杀完大人后夹出村外,用刀片像削面一样削掉。

△此地过去西瓜称“三白”:白皮、白瓢、白籽,吃起来是糖疙疸味,甜得很。现在不行了,水坏了。

1997年8月20日：杨柳青·青县·沧州

176

昨天中午到达青县，住盘古饭店。各县的县宾馆都用本县的古迹、古名或古事命名，青县叫盘古，盖因相传盘古曾在此与人争地盘。武清叫雍阳宾馆，沧州最豪华的饭店则取名浮阳，不知出于河典。唯静海宾馆建于10年前，此种尚古风尚未兴起，还留得直白老实的县名。我住的是盘古饭店的旧楼，约是原来的县政府招待所，后隔出的卫生间，后安的空调。洗澡时水淋下来惊动一群蟋蟀，四散奔逃，抓住两只礼送出房间之外。晚上就伴着房间里的蟋蟀吟唱入睡，真是秋声入梦。

青县县城为一南北长街。因土地碱化，街上种的绿化柏多枯死，挣扎着活下来的也瘦小如蒿。有一段街就干脆以蒿草绿化，种的是扫帚苗，长得倒是茂盛。运河水已干枯。我在政协寻资料时与办公室的秘书聊天，他说他今年23岁，自他记事起运河水就是干的。在政协寻得文史资料两册，第一册

不甚好，其篇幅一半是后人写的演义，第二册就有改进，多为第一手材料，当事人的回忆。县志办推荐我找水利局编水利志的退休老人陶殿忠。我打电话给老陶，他很热情，请我到局里见面，并让我一定给局长打个电话说一下此事。我想大概是他想让局长知道他的知名度吧，我如囑打了电话。在局里见面后他又把我请到家里小坐，后又推着自行车陪我去复印材料，并送我一册他主编的水利志。老陶头半秃，有一张慈善的脸，陪我复印时他同复印室的小伙子、小姑娘显得十分熟络。“这本水利志有人说好也有人说坏”，老陶告诉我。

今天上午睡至 10:00 方起，几天来的疲劳一如水洗。在盘古饭店对面的一家清真饭馆吃饭，要了葱爆肉。饭馆老板和服务员都很热情，有一种对于远行客的亲热。惟菜吃到半截在爆羊肉中吃出了苍蝇肉，叫大嫂模样的服务员前来观摩，她忙不迭地要给换菜。这饭馆的菜份量多，虽仅吃一半我已吃饱，就谢绝换菜，照样付了钱。大家都说吃饭吃出一个苍蝇有多恶心，奇怪我却并没有恶心的感觉；那苍蝇已炸得焦黑，显是爆火之功。我要了几瓣生蒜来，牙捣而食。

中午 12:40 拦上到沧州的长途车，不一时即到了沧州。我在车上拍了几张田野与河流的照片，邻座一位模样快活的中年农民称我为“摄影爱好者”。车到沧州我让司机停到有宾馆的地段，这邻座又笑着插话：“宾馆有的是，别的有没有宾馆、饭店、小姐有的是。”看来海南之风是真地已吹遍了华北。

还要告诉你的是沧州、青县一带书法与武术很盛。走在街道上你到处可以见到敦厚有力的颜体招牌，连种籽公司、加油站、白铁铺这样的地方都挂着一丝不苟的颜体字。沧州有一个颇大的武术院，街墙上还贴着各类武术学校的招生信息。

或许中华腹地文已衰而书存、道已衰而术存。

沧州市区段的运河倒是有小半河的水，但细看有纹而无流，是一沟死水。问在堤岸上捡垃圾的老农，说是市区一段河挖得深一些，所以雨水都积存起来了，往前后再走5里就都是干河了。我前后骑行了五六里，果然皆见河干。这市区的水实际上是段河中湖。紧贴着运河有水的地段建有一公园曰胜利，是纪念沧州解放的，园中有许多战斗和战死的雕塑。正中有墙，上刻朱德的一首七律，结尾联为“沧州战罢归来晚，闲向滹沱听暮砧”，配上颜体书法几近雄浑。沧州运河桥头有一座仿古5层阁楼，暮色中远观颇似古迹，近看才知是新建的沧州棋术社的社址，已被用于综合经营，指示牌上标着一楼舞厅、二楼咖啡、三楼棋艺云，无可观者，惟此仿古阁楼的对联很有气势，叫做“京杭古运长千里，津沧渤海第一楼”。

青沧两日所历已报告完毕。现在时刚10:00，余兴未消，索性将18日杨柳青的观感一并补述。18日中午我在杨柳青南街的一家饭馆吃饭，点了土豆烧牛肉，烧得可真费功夫，看墙上的挂钟时针不觉已转一圈。牛肉终于烧好了，米饭说是还要回热一下。等我干吃完了菜，米饭仍没热好，遂退掉了米饭。同店就餐的还有一伙壮汉，倒像是手头稍宽裕的那种，面土而衣鲜，要起大听的“如梦”饮料价也不问，听口音不是杨柳青人。问起来才知是河北文安搞运输的。虽是外地人看来与这饭馆倒挺熟，其中一个年轻人问少妇老板娘：“毛毛呢？”老板娘回答说：“走了，上市里了。”“咋走了？”老板娘看来是个絮嘴，竟一五一十地讲了一个故事：“咋走了？同我们的客人治气走了。俺们有一个天津的朋友，是外贸上的，老来，总让毛

毛陪。俺们的朋友出过十几个国家，毛毛一听大概有点心动。后来人家又来时带了个小姐，没让她陪，她就伤起心了，说不要我了，没脸见人了，非要走不可。我告诉她在城里客人上歌厅都是有20多个小姐坐那儿，想挑谁挑谁，不是非固定一个。她不听，坚决要走，就走了。唉，毛毛干活真是麻利，就是太犟。”老板娘说着用手点了点脑袋：“她这儿动感情啦！”那个打听毛毛的年轻人听完不胜感慨，过分文绉绉地叹道：“她还真是孩子呀，真是孩子呀。”而同他一伙吃饭喝酒的壮汉们自始至终对毛毛的事无动于衷，不置一词。这时一个老乞丐揭帘而入，老板娘立刻厉声斥叱：“又来，又来！上午刚给过又来！”这才结束了关于毛毛的谈话。毛毛的故事是个老故事，在话本和笔记小说中常读到。但这次在街道小店无意听来却有点惊心动魄。物换星移，鼎革代更，人们的故事却如此顽强地重复着，得无惧乎！

18日下午我沿着杨柳青运河岸骑行，见河边多有烧过的纸灰，不少灰堆周围还划着一个圆圈。在天津的河边也有此景。我知这和请神送鬼有关，却不知是在什么日子送哪家鬼神。在靠河的公路旁我发现有一个小园子，园中有一塔一墓，塔墓四周挂着厚厚的几层红布谢幛，旁边并立着不少白石矮碑，上面都写着话感谢并赞美一个叫“于五爷”的人。我想这大概就是于五爷的墓和塔。墓前有塔应该是位僧人，塔上铭有塔主的法号乃为佛家法号，但称“于五爷”且塔后匾中画像又是道衣道冠，大令人惑。我问园旁卖水的大嫂于五爷是谁，大嫂答曰：“于五爷原也是个老百姓，就是咱杨柳青镇上的人，后来修炼成了佛了。特别灵，你看园里挂那么多还愿的红布，

烧了一批又挂一批。”大嫂还有点文化，也理解我旅行是在“考察”，但她也分不清佛与道。她说这塔是清朝留下来的，我说不像，看起来太新，她说你看仔细，那是还愿的人出钱新刷了一遍浆子。我细看果然，塔砖有古痕，正面记有雍正年号。这还愿的香客真是大煞风景，唐突古意。不过刷新也属还愿正经，古人多有“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之誓。这时有一位老者来这路边小店买东西，我问他于五爷的来历，他说听说于五爷本身是个道士，念的却是佛经，并补充了一句：“道教没有经。”这一派胡言并未能解我之感。我想大概这是个僧人，于五爷是该僧的俗家称呼，而画像上的道士打扮纯属后世愚氓演绎。这时老者问我：“你另外两个伴呢？”我说我就一个人。老者说：“怪了，我刚才明明看见三个人进园。”大嫂笑叱老者：“真是老花了眼啦！”不过老者之言使我有毛骨悚然，匆匆喝完水离去。

离开河边回到杨柳青街道上，下班的人流正涌。忽见前面有人祸，近前见是一群穿白制服的人从标有“综合执法车”的面包车上跳下来，围住了一个在路边耍猴的人，过路人都驻足观看。白衣人要没收3只猴并带走耍猴人，耍猴人拼力挣扎。这时围观的人群都大声劝阻白衣人，颇有不平之音，白衣人环顾四周见势头不对，遂匆忙夺下耍猴人的鞭子宣布没收后上车而去。这时大家都劝耍猴人鞭子别去要了，去要没好儿。耍猴人脸上的表情似怒似惭，又警惕又无奈，连声说“不要了，不要了”。他牵着的3只小猴也瞪大着受惊的眼睛。白衣人和耍猴人都离开了，而打抱不平的路人却还聚在那儿久久不散，互相交流着对白衣人的愤怒，其中以大姐、大嫂们尤为激烈。“坏透了！净欺负人！人家在空地耍猴怎么影响市

容了?”“要是对本地人还可说,对人家外地人这么凶!看人家出门在外可怜巴巴的。”“欺负一个耍猴的算什么本事!真违法的他们敢碰吗?”在大姐、大嫂们的怒骂声中我注意到一个40来岁工人模样的男人,脸黧黑,他倒是没有高声,却在恶狠狠地咬牙切齿,反反复复地低声骂着一句话:“妈那个×,妈那个×!”好半天人才走散。这低声咒骂的男子和他的表情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促使我思考很多问题。

18日约下午5:30我回到杨柳青汽车站还自行车,准备动身去静海。一个开红色面的人告诉我说这个点车站已没有车了,最好的办法是他开车把我送上104国道,在道上等过路车。依他的话而行,付钱10元。在国道左等右等不见长途车过,眼见天越来越晚。这时又一辆红面的在我身旁停下来,见我去静海他以40元的价钱揽活。相距30公里收40元不算宰人,就上了他的车。他把我拉过大发、夏利的厂,当拉到一条村街上时他突然踩刹车停下来,对着路上一个提水的高额头的中年男子喊道:“走走走,跟我到静海玩去!”高额头一听心动,略一沉吟就答应下来,说:“你等我把这壶水放回家好不?”司机连声说:“等你等你!”高额头回去放水,我问这司机怎么认识他。司机说:“他是我们庄的,在这里的学校看大门。”我细看这高额头进去的院子果然是一所学校。一忽儿高额头出来上了车,我对司机说看来你们俩是哥们儿,连去趟静海也要一道。司机笑了,说是铁哥们。车行了大约20分钟,来到一个小镇模样的地方,路旁有装饰俗艳的一家家饭馆。司机在这里停了车,回头对高额头说:“就把你扔这儿等我吧?”高额头边下车边对司机大声叮嘱:“你回来时一定要接上

我，可不能把我撂这儿！”司机笑着说放心吧放心吧。高额头临下车时还向司机借了 50 元钱。车撂下高额头继续向前开，这时候我消释了方才对二人合伙劫道的警惕，问那高额头是不是在这儿吃饭。司机一听乐了，说吃什么饭，他爆锅去了。“爆锅”是天津一带嫖妓的隐语。司机告诉我说这一路的饭馆大都兼营此业，一次 100 元，老板和小姐对半分。说这里的小姐多从东北来。“东北姑娘真能扯，”司机说。我问他“能扯”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浪。他并且分析东北多有小姐外出的社会文化原因，说大概因为那里的风气是笑贫不笑娼。

风气若此，有闻照录。或许民间普遍的道德解禁和欲望表达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紧张情绪、冲淡社会矛盾吧。

车行一小时余，天黑之前抵静海。一路上见夕阳西下，原野莽苍，有宽阔的河流流过，也有干涸的河道上野草丛生。对国土顿生出无限的眷恋。

北上南下

1996年6月14日：大同石窟

昨天下午来到大同云岗石窟，这是中国的石窟之始。在佛堂塑像已不能满足人们对佛的渴望，于是人们把佛像可山壁雕成，这冰冷而巨大的佛雕表达了人们内心按捺不住的激情。佛像在北魏始由寺殿之塑变为山崖之雕，象征着佛教的公开与扩张，可以说是佛教的一次一直被人忽略的转折。45个洞窟中有5万1千尊佛和菩萨的造像，几乎壁上每一个可雕之处都有或清晰或模糊的佛家面容。每一尊佛像后面都有一个世间人可能是曲折而痛切的故事，如今岁月流逝、世道沧桑，这些故事我们只能凭自己的心去想象了，而面对着似言似语的佛像那永恒的微笑你会感到历史与人生的神秘。“紫面佛陀默然在，白发老僧去不还”，同行的刘耕路老师20年前的这两句诗差可代表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毕竟是北魏鲜卑族时代的作品，云岗的佛像都显得清秀、

怡然、喜相。我想那时候肯定也有人间八苦，也有人们对这世间痛苦的深刻体验，不然也就不会有佛教了；但那时的人们虽然经历苦难但还没有去寻找救世主，还并没有把自己得救的希望惟一地寄托于佛的慈悲，所以佛像佛容还远不像后来那庄严肃穆、深挚悲切。人类那时把雕塑佛像当成了一次对自己的重新塑造，佛家那平和而活泼的幸福表情表达了人们对战胜人间苦难的大信心，佛和菩萨那时还不完全是神而是人自身。20号窟露天大佛高17米，目光清亮、表情轻松，与他身旁怡然自得的弟子恰相印证；16号窟中佛像作大无畏状，嘴角调皮地翘起，两眼含笑眺视前方。我忽然想起台湾演员凌峰把他饱经风霜、满脸皱纹和愁苦的脸形容为“很中国”，大概地道出了中国人与中国事的真谛；而云岗的佛像之所以还面有喜色、还没有“很中国”，大概是因为此时的鲜卑族和佛家都还没有完成汉化吧。——不过，也就在此时，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即将拉开序幕。

1996 年 6 月 15 日：书记与厂长

前天上午我们同大同第二发电厂座谈。厂党委书记是一位 40 出头的女性，说一口微带点天津口音的普通话，是从天津市供电局交换过来的干部，已在电力系统当过五六个部门的领导，所以很像个领导，举止从容，说话得体。华北电管局在其所属的山西、河北、天津、北京等地交换干部的力度很大，用陪同我们参观的局组织部干部的话说就是“每月都要动一两个”。而且跨地区换干部都是华北电管局局长焦忆安亲自谈话，所谓的“通不通 3 分钟”，不同意即刻就地免职，所以还没有不通者。我们在北京供电局看见从大同调过来的书记，从承德调过来的副书记；在石景山发电厂看见从天津调过来的书记。大概每个大企业的党政正职中至少有一个是外来干部，这也实在不是一件小事。大同电厂的这位女书记叫安改玲，只身一人自津来同，就住在厂招待所里。她来大同二电一

年有余,主要工作是推行了一种考核中层干部的方法叫“八步工作法”,从群众评议到组织落实共八个步骤。其实这八个步骤本身也无甚新意,无非是各地各单位都在说的考核干部的那些内容,所不同的是其他单位大都不过是说说而已,而安改玲却要真做起来。中国的许多事情做不好并不是没有合理化的条款,而是没有实打实的履行,如果把中国现有的法律严格地执行到位,中国将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国家。难得遇上安改玲这样的实心人,这种人正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中国的革命与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一个远远超前于现实状况的法律体系,这个体系悬浮于我们的生活之上形成了巨大的空隙,我们目前所能做的就是把这些空隙一点点地填实,把写在纸上的东西一点点地实现,这种改造方式、这种对纸上的话信以为真并且要身体力行的实心人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我相信这种方式的有效性,有时甚至想这种一点一滴的填空工作是不是比仓促间再搭起一个纸上谈兵的新的制度架子更有实际意义,更实惠。

安改玲把民主评议、民主选拔干部制度做实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群众评议、职代会投票的结果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公开,使几乎全厂人都知道群众笔下干部的优秀、称职、不称职类别,知道群众对干部提升、留任、降职的建议,这就使得厂级领导中没有人敢于过分私袒。今年考评后对职代会60%以上认为不称职的两名中层干部坚决地实行了降职,一名是车间主任被降成了第三把手,一名是主持工作的职工医院副院长被降成了普通副院长,据说这名副院长还是厂长的嫡系,用大同话说就是“铁股子”。公开而严格的量化是制度合理化的关键步骤,安改玲的举措虽然是局部的且是微小的,

却包含着全局性、本质性的意义。既然党与政在干部任免问题上争执不下,那就干脆将任免交给群众、交给程序:这种干部体制不仅缓解了书记和厂长在干部权限上的矛盾,为中国国营企业的管理解开了一个死结,同时对于中国现代官制的确立也是一次不无价值的尝试,使人看到细部制度创新所具有潜力,看到社会改造保守疗法的某种可行性。

安改玲去年春调来大同,只身一人而无有爪牙,担任的又是没有直接管理权的党委书记,所插手的又是最敏感的人事问题,一年多的时间中能由启蒙到实施一步步地推开人事制度改革,可以想见她是完成了一项怎样艰巨的政治工程。她手下的部长说她得到了群众和大部分中层干部的支持,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民心可用”吧。同安改玲的交谈中也感到她是一个在政治上相当成熟的人。在陪我们去恒山的路上她一路说山西的民间笑话,车中一直欢声笑语,归程中她才有条不紊地谈工作,谈她对干部工作的体验与个人认识。先交深而后言深,这个女人心计颇周。

大同二电厂厂长45岁,与安改玲书记年纪相近,高个,粗壮,声音宏亮,是个很喜欢咋唬但内里又很有算计的人,名叫宋玉洛。他陪我们去云岗石窟,在商品部我们买纪念品,商家要价60元,他的秘书要帮我们砍成40元,讨还半天还砍不下来。宋玉洛闻讯自告奋勇要去砍价:“我去跟他砍!我大生意都做了还做不了他这小生意!我电厂每天进出三四百万,一年成本6个亿,产值20个亿,还砍不了他这60元钱!”果然被他砍成了40元。这个人的豪爽让人喜欢。在座谈会这样的正经场合他一再地夸奖党委书记安改玲,而在饭桌上他却又

不停地用酒令和俏皮话打击她，表现出一种友好的攻击性。安改玲说他太能说话，10个客人也说不过他，他马上反唇相讥：“你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也是个碴子。”他对我们介绍：“安书记别看在饭桌上斯斯文文，一上党委会那也是寸土不让。叫做一妇当关，万夫莫开。”安改玲露出不置可否的微笑，宋玉洛端着酒接着表白：“不过我是真感谢我们焦老板给我派来这么好一个书记，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在笑声中大家干杯。安改玲坚决不喝酒，宋玉洛坚让，安仍喝矿泉水。旁边的党委干部凑趣道：“如果安书记喝了这杯酒，你是不是把党委支配的200万精神文明基金翻倍？”宋玉洛马上答应：“好！一言为定，要是安书记喝了这酒，今年再加200万！”安改玲二话没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宋玉洛马上招呼邻桌主管财务的副厂长：“老黄，听见没有，加200万，党委明年的指标放今年用了！”大家哄堂。宋玉洛颇有几分急智。还不仅是急智，他实在是还很心细。当安改玲说到“我给厂长打工”时，宋玉洛正在旁边与人碰杯，马上回过身来坚决纠正：“你又胡说了！谁给谁打工？咱们俩一起给焦老板打工！”焦老板者，华北电管局局长焦忆安也。

尽管细心人可以发现宋玉洛的细心，但他给人留下的印象仍是豪放。离别那天下午我们在厂门口照相，要拍照时正好厂里的一个中层干部要进厂门，宋玉洛站在老远处向那干部喊道：“武建国，立定！不许闯入镜头！”那叫武建国的干部倒并没有立定，而是急忙地向后退行，正好退到一级台阶上，闪了一个趔趄。宋玉洛也笑了，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我们厂维修公司的经理。”这宋玉洛肯定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人。而且他能容让甚至还支持安改玲改革干部制度限制他自己的权

力,说明他既有几分公心又有几分气魄。厂里的一个中层干部一语道破了他们厂厂长、书记和谐相处的原因:“他们都才40多岁,都正前途无量,犯不着为小事打架断送了前程。他们俩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点他们心中都明镜似的,只是心照不宣而已。”这话虽系私语,但可当公言。宋玉洛和安改玲能有这样的聪明已算是大聪明了。

二电厂的厂区和车间一尘不染,窗台上摆着花盆。而且宋玉洛还会背许多古诗词,随口成诵,在车上提起范仲淹的“塞下秋来风景异”他能背下来,在饭桌上提起苏东坡的“老夫聊发少年狂”他也能准确地背出。——这一切都使他显得可爱。

1996年6月19日：鸡鸣山

190

18日中午，由张家口附近的下花园发电厂请客，在他们招待所的食堂吃饭。厂党委书记是工人出身，长相方正，谈吐实在，名字叫史亮，这名字一听就像个好人。午饭光主食就摆上了3种：荞麦面饺子，莜麦凉面，蛋炒米：是忠厚而殷实的北方人家待客的风格，见出生怕客人吃不饱的朴素心肠。一路接触工厂里的人物，我对工人出身的工厂干部很有好感。相比之下知识分子干部有点阴郁、刻板，多城府或者说是无趣、不生动，往往一副技术官僚的面孔，使人喜欢不起来；而工人干部却更有人情味、更豪爽、更容易流露情绪并且更多地表现出个性。同样是系统中的领导骨干，同样是好人，同样很有能力，毕业于吉林工大的张家口供电公司书记老宋与这位学徒出身的下花园发电厂书记老史就有这样的区别。

席间谈起电厂附近有座山，叫鸡鸣山，山上还有庙，看我

们明显地流露出兴趣，史书记马上提议是不是取消下午的座谈会，由他陪我们上山看看。对于一周来天天开会、从大同一路座谈下来的我们来说，这当然不是个坏主意，于是宾主大喜，碰杯为纪。上得山来才发现山上没树，草却很茂盛，竟是一座草山。原是辽代萧太后的休息之地，所以这地方叫下花园，还有上、中两花园，想来距此也不会太远。旧时的古建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革去，现在补建的萧太后亭仿辽代北方少数民族战帽形状，完全是男性化的气势，看起来多少有点不伦不类。不过亭子青砖青瓦，倒是没有那种雕梁画栋的恶俗。亭边的解说牌上说山上原有参天古木，可惜在解放前就已大都毁于火灾。牌上还说萧太后乳名燕燕，使这千年之上异族的贵妇人听起来同邻居家的姑娘一样亲切。燕燕显见是个汉名，但这鸡鸣山当时却非汉地，非我中国之土。古时候张家口一带就是边地了。“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无定河就在这里由桑干河和洋河（不是洋河大曲的洋河）交汇而成，如今改名为永定河。择石而立，山风扑面，眺望山下升着炊烟的汉家村舍和工厂的红砖楼房，一派平常无奇的俗景，不禁对这里古代的边塞胡地风光，对这里曾经有过的异乡情调生出无限的向往。

山上的庙也是新修的，是个一进院落，正堂是“三教堂”，南屋是僧寮，只住着一个 75 岁的老僧，法号不详。他不是住持，而是看护。这老和尚手拿一根树枝比划着给我们讲三教的来历，说“道教是金木水火土，佛教是生老病死苦，儒教是仁义礼智信”，虽俗俚却倒也不错。中间的佛教堂供的竟是弥勒佛，老和尚对此大不满，认为这是损害释迦牟尼佛，“他们还要灭和尚哩！”老和尚说到这里用树枝敲打着砖台上一口扣着的

破锅，很激动。佛经上的确说过释迦牟尼涅槃 500 年后其法度灭，按时间推算现在也确实该弥勒佛掌教了；不过，佛理深邃，非我辈常人所能彻悟，所以不可偏执字句。老和尚用政治化的成语说敬弥勒佛者是“反动会道门”，听者莞尔。

老和尚当我们进庙时正在干活，他端着一大碗和好的水泥在堵一个墙洞，我看见他的手正是一双粗壮的劳动者的大手，一双农民的手，端着沉重的水泥碗手在剧烈地抖动，他毕竟是高龄了。禅宗认为日常的劳动中有禅，这和尚堪称身体力行。然而这老和尚还有更深一层的尘世修炼，那就是他居然当过几年解放军。陪同我们上山的当地人显然早知其人，张口就问他是否真的当过解放军，他说是。“您在解放军里当过什么？”“臭班长呗！”老和尚用很平和的语调说起他从军的经历。他先是村里农会的组织委员，还乡团来了，农会的主席、副主席被用刺刀挑了，第三个就要轮到，他跑到庙里躲了起来，顺便就出了家。过了一段解放军路过，他就被部队带走了，成了小和尚兵。在部队很和善、忠厚，所以打太原时战士选他当班长。指导员不同意，说他虽然会团结人，但不一定会打仗。班里老兵火了，替他申辩：“谁会打仗？毛主席会打仗，让他一人打能把天下打下来？会团结人就会打仗。”于是当班长。打下太原班里的人快死光了，他心中不忍，所以部队往西南开时他找机会跑了，跑回张家口老家。老家的农会已是新人，对他不太热情，一气之下他又跑到庙里当了和尚。这几十年他多数时间呆在正定，正定庙多，好容身。近两年想家了，才回到老家的庙里。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向政府报告自己的革命经历，他倒是挺明白：“报告什么？没问你个叛党罪就算好哩！”想不到在这山间小庙我们又一次重温了中国人的啼

笑人生,老和尚命运的戏剧性对于中国人来说正是平常故事。好在和尚对这一切都能够淡然闲聊了,他脸上挂着一种老年人的轻松愉快甚至还有几分孩子的顽皮。据说文革前这庙里的住持是一个逃亡的国民党兵,这大有深意的巧合使人心中凛然地感到佛法无边。

临下山时我们问老和尚住在这里生活好不好,和尚连声说好:“只要心里开怀住哪儿都好。一有贪心,有了白银想黄金,有了黄金想万两,就不好了。”我看出这和尚有些慧根,想不下山在山里住一夜,但被陪同者坚劝下山去洗温泉,只好作罢,心中不无遗憾。

1996年9月21日：上海重游

194

旅行使人的生命延长了，以小时和分钟计算的日程表让人觉得一天的光阴竟会这样经得起消耗。上午我还在家中书架前从容阅读梅特林克的剧本，下午就已在上海虹漕路的市委党校吃与江豆相配的红烧肉了（的确好吃），并与同桌的陌生人亲密交谈。京沪之间只隔一小时余，走下飞机见西天仍是夕阳依依，这是我刚才在北京看见的夕阳。

同行的是我校经济学部的王东京，他居然在厚衬衫外边穿着一件皮坎肩，在皮坎肩外又套着毛料西服，乍一看我还以为他是要上哈尔滨。上海地面温度26度，据说这已经是夕凉了，中午热得大家穿短袖衫。王东京也是一个媳妇儿给什么穿什么、给什么吃什么的人。他刚从太原归来，他帮着太原市政府制订了国有企业改造计划，8月定稿，9月展开，现在已展开得6000工人请愿了。不过东京信心很足，他认为请愿是暂

时的,等工人弄清道理和利害之后就会高兴起来。他给我讲了半天这其中的道理我也没弄得很清楚,不过他的信心还是有点感染我的。太原市委书记听完王东京的课后请他参与企改,说非得把乌纱帽放在一旁真干一场了。其实如果不改听任企业坏下去也终究乌纱帽不保,与其守而死不如战而死。英雄和出路就是这么逼出来的,陈胜、吴广的故事道尽了天下英雄的秘密。对实际经济的参与与作用使王东京精神振奋,中央党校的教员深入实际的社会生活走实学的路子乃是一种恰当的学术定位。但这实学也远不像许多人说得那么简单。大家都说党校的问题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我反驳说首要的问题是理论的问题,许多人不读书,没有把原著读通,没有把书本上的东西吃透,没有丰富广博的知识,说他们理论脱离实际是太高估了。先要坐冷板凳读书,先成为理论家再深入实地社会去经验、参与,这样才能达成对现实的深刻理解,达成对理论的有效修正从而成为成熟的学者。这样的实学才会成为真正的学问,行万里路必须得是读万卷书之后才有学术上的意义。王东京先是学院派,译过书也写过书,以学院的腔调同地方官接触后才发现实务者对他们的书生议论无以借用,他们对解决使地方官食寝不安的实际经济问题也束手无策。这才是应了“下笔千言而胸无一策”的古讥。遂发愤格物,致有今日之成。中国的第一批专家型的实学学者或许不出自学院也不出自政府的政研机构,而是出自党校——但愿如此。

今晚9时打的去逛徐家汇,太平洋商厦与东方商厦对门而立,颇成龙虎相争之势。看见太平洋导购牌上6楼是文教,遂生看看是否有书可买的侥幸之念。在6楼电梯口就问小姐

有没有书卖,小姐居然指示说一直向前走到底。果真有书,不禁大喜。这里的书还堪称丰富,分类之规范赶得上图书馆的水平了。买《上海人物史料》及《历史学家的技艺》(马克·布洛赫/上海社科版)计两册,泉10元5角。两书10元许,在上海居然得占这样的便宜不禁小有得意,本来来上海是准备吃亏的。我所居宾馆客房浴间放的是整块的力士香皂和整支的中华牙膏,这也颇使我惊讶现在连以厚道著称的山东人的宾馆中也只放仅够一次之用的所谓“旅行”膏沫了,独在上海见这样的古风,与从前对上海的印象大相径庭,好像这家宾馆专门要为上海人平反似的。这宾馆还有可陈之善即是房间可以从里面锁死虽然我并不准备在房间里有不良之举,但这种住遍大江南北都难得的信任我仍然心领了。上海的电视有英语台,一律的英语念白、中文字幕,影片、新闻都是如此,这使人想起鲁迅陪许广平在南京路看外国电影的年代。

上海市委党校我10年前来过,住在招待所的二楼,隔壁恰好住的是北大中文系50年代的校友,攀谈相识后他絮絮叨叨地给我讲当年他们班上的恩怨故事,说他被同班的某某(名字我已忘)打成了右派,发回老家湖南在中学里打了十几年的钟,文革后才调到地区师范,这次是因一个偶然的时机来运转:他在北大时与一位匈牙利留学生关系颇洽,后来就多年未联系,现在忽接匈牙利来信,原来这位异国同学已当上了匈国社科院院长并邀他前往做访问学者,他这是正在赴匈途中。至于为什么赴匈不径自北京出发而要经过上海,他好像告诉我一个什么原因,现在已经淡忘,但他讲起旧事时那昂首扬眉、激动不已的神态我却记忆犹新。后来还接到过他寄自布

达佩斯的明信片；再后来苏东事变，他的朋友不知命运如何，他也不知回国也未，有时我想到上海、想到北大和反右运动时会冷不丁地想起他。我还记得那次我在上海党校院子里散步，见路旁的黑板报上写着学员的学习成绩，还有一首抄录的朱熹的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大概是比喻马列主义丰富了武装了人的思想吧。我这次在校园散步似乎还能依稀见出 10 年前的影子，但陪我吃饭的这里的教务处副处长朱华却告诉我党校的这个校园是 89 年才新搬来的，在上海的西南，而原来的党校则在上海的东北。但我还是觉得似曾相识，大概是新党校的设计者难脱老党校的窠臼吧。

朱华是我这次来沪愉快相识的人。他曾是华东师大历史系研究生，专攻上海史，是中国解放后第一部《上海史》的主撰者之一。他认为 40 年前上海以它无与伦比的城市功能吸引并容纳了海内海外众多人才，成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1949 年后户口制一下子锁死了上海的大门，上海人在封闭的环境中生活几十年后素质显著下降，上海也蜕变成为单纯的制造业中心。“30 年代上海的名作家没有一个是上海人。没有人口流动一切都谈不上。”或许上海还想恢复它过去的地位，据说浦东新区建得很好，可惜这次来不及去看了。13 年前我第一次来上海，作协的李子云派人介绍我住在一家弄堂旅馆里，早晨被窗外天井中“阿拉”“阿拉”的童声吵醒。那一次上海给我的印象是一座被雨水洇黑了旧城，街道杂乱而不洁。10 年前第二次来的那次对上海印象还算不错，盖因在舟山、宁波一带喝了许多糖精和色素调成的所谓“桔汁”，心情颇恶，而在上海一下火车买了一杯冰桔汁解渴，竟是百分之百纯正的用树上的桔子榨成的汁，还漂着可爱的桔肉的细屑，当时

一下子觉得上海真是个好真价实的好地方。尽管那次差点同一个馄饨摊主打起来也没有败坏这种美好的印象。这一次我感到上海的街道好象宽了许多,在想象中似乎可以容纳骑自行车的人了,而从前我想起上海就总感到那是一个车辆拥挤得无法骑自行车的城市,虽然这印象也自知不一定对。今天晚上我还打的到南京路、外滩一带游逛数小时,南京路上竟给我以东京的感觉。

我之所以给你写了这么多可有可无的闲话是因为我其实并不了解上海。有空让我们一起研究研究上海吧。

1996年9月23日：衣着与故人

上海是出漂亮衣服的城市，很少有哪个城市比上海更讲究衣着了。上海的衣着时髦而不奢华，即使奢华也不村俗，在消费的炫耀中有一种淡然而现的文化与雅致。于是这个城市的女性就可观起来。那年我到西北的小城酒泉，在街道上看到许多“上海服装店”“上海裁缝店”的招牌，姑娘们的穿着样式大约也的确取自上海，但却不知在什么地方总透出夸张与走形；加上血淋淋的浓妆艳抹，遂使西北小城酒泉成了东南大城上海的戏拟。或许文明的细部是无法模仿的，能够模仿细部就不再是模仿了。今天在地摊上买到一册上海出的杂志《文化与生活》（1996年第7期），头条文章即是写上海女性的消费的，当然主要是服装消费（龚静：《都市女人的消费行动》），说及“她们还很注重细节，袜子、围巾、头饰甚至手表、戒指的购买都是要细心但又不落痕迹地搭配整体的。这些小东

西倒不一定能在大百货店买到,一些小店或许会让她们得来全不费工夫,所以,她们很喜欢看一些风格小店,偶尔路过或者朋友介绍。”我很喜欢“风格小店”这个词,风格小店大概可作为一个城市成熟的标志。酒泉能有上海的“风格小店”吗?走在南京路上我很喜欢上海姑娘的穿着在随便中表现出的妥贴、在潇洒中暗含着的处心积虑乃至苦心经营。这篇文章写道:“她们的薪水并不高,够不上人们通常所说的白领,但她们在一个比较小的伸缩空间内也是一样的山青水秀。”这真是长期的上海文化所涵养的功夫。如此的“风格小店”和这般的“山青水秀”,确实在无意中活画出了上海和上海人。

上海当然也是个出领袖的地方,近年来更是层出不穷。“治大国如烹小鲜”,古代以厨师喻帝王,当代可将帝王喻以裁缝了。

昨晚晚归,走出地铁站时洒水车已开始洒水,上海环卫局的洒水车竟一边工作一边播放着《好人一生平安》的曲子。上海的地铁列车中也贴着各种各样的伟人格言,是由第一百货公司制作赠送的。不同车厢的格言竟不重样。昨天我的座位旁贴的是司马光的“学为化原,法为治本”,真是何其典雅深奥。上海的商店还有一处地方给我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许多商店门厅里都有一个一脸和善且精神矍铄的老人在服务,或应客或导购。由老仆应门服务是欧洲贵族的传统,上海不知何时习得并保存下来了。与此相比那些只知堆砌妙龄小姐的城市就显得有点起哄、玩闹和资历浅近了。

上海的确同欧洲有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且不说那在城市的每个缝隙中至今还依然存在的旧日的欧风建筑,但看今

天许多店堂的命名仍然表现出抹不去的欧化记忆。前天我“打的”去徐家汇，问司机徐家汇有什么值得一逛的大商城。司机答得一个名字，我听成是“东方红”，心中还微有惊讶，想上海还会有这样的名字。到徐家汇一看却原来不是“东方红”而是“东方”，才恍然悟到“东方红”的招牌也只配挂在我的家乡郑州（郑州火车站附近有“东方红影剧院”），而上海却是必须挂“东方”的。“东方”、“远东”这样的牌子在上海随处可见。这种民间的亚文化无意中点到了上海的本质。上海就是东方，只有上海才是东方。说到底“东方”是西方人的概念。西方人不远万里来到上海通商建埠，按照他们的口味建成了一个异国城市。对于西方人来说“东方”是一个甜蜜而又神秘的梦；如果不欧化就不会甜蜜，如果不在异国就不会神秘。上海恰恰是既甜蜜又神秘的，所以它是“东方”。北京会是“东方”吗？延安会是“东方”吗？它们当然不是西方人的东方，然而却是中国人心中真正的东方。因为欧化，所以上海得风气之先；因为贴近本土，所以延安成风气于后；这就是中国革命为什么来源于上海而却成功于延安的原因。这个历史的经验在今天还值得深思吗？

今天在上海会见了两个故人。一是研究生同学陈卫平，他毕业时没有被严家炎老师通过论文，至今耿耿。他现为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的系副主任，且古怪地加入了“民主党派”之一的民主促进会，更加古怪地是他还以“民主党派”中青年干部的身份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学习过。他住在淮海中路附近的一所弄堂房子里，23 平米的一大间被他隔成了两小间，同别家共用厨卫；古旧的木地板擦得油亮，倒是显得很清爽。

他说如果到郊区去住可分得两居或三居,但他不愿离开市中心,所以情愿住小房子。这又是上海人不可思议的秉性之一。惟不愿离开上海到外地,甚至不愿到郊区享福而宁愿在市中心受苦,对城市的向心力可谓甚矣。不过卫平倒是指点我明白了什么是亭子间。所谓亭子间并非一定是阁楼上或门侧的耳房,大凡是阴面、稍狭小些的非正房都被称为亭子间,也算是正式的房间;且亭子间须得在二楼以上。至于“亭子”是个什么样的建筑术语,卫平说他也不知道。卫平还抱怨淮海路东西太贵,尽是高档货,平时的日用品都买不着。他请我在楼下的肯德基吃辣鸡翅,相对坐于一张袖珍的肯德基餐桌,桌很小,使我们这多年未见的老同学显得格外亲密。卫平说他近年一般不看书和学术杂志了。一看就想写文章,而天天忙于事务又没时间写,干脆就不看了。说书店也不逛了,一来书太贵买不起,二来买来家里也没地儿放。每学期讲200节课,月收入2000余元,日子还过得去。卫平精神仍不错。他比我大一轮属相,该算是步入中年了。

另一个故人是姚献民,他刚从市新闻办公室调回百家出版社,告诉我说已新定为正处级调研员。他一见面就说夏克强在中央党校学习,说得很亲热,我还以为是说哪位北大校友,也不好意思直说不认识,只好唯唯。谈下来听话音才明白夏克强是谁了,原来是上海市副市长。献民又说起另一位副市长有职而无实权,且被怀疑能力不行,“远看像部长,近看像处长,一开口像科长”,我也姑妄听之。他可真是以全市为己任啊。他把他新近填的两首忆秦娥给我看,他的诗词确实还写得不错。当然谈诗只不过是一笔带过,他便又谈起另一位从政的人潘维明,这人倒真是一位北大校友,曾任上海市委宣

传部长,后因嫖娼被捕,现已获释赴美。献民说潘很仗义也很跋扈,做了不少好事也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出事后没有人保。“有时候得罪了人他不一定需要说你坏话,只在关键时候不说你好话就够你喝一壶了,”献民这样评论说。这倒是得了官场三昧。听说我要去苏州他坚持要为我派车,被我谢绝,遂定明天自苏返沪后去他家里“喝一壶”。送我下楼时见有一人坐在传达室同门房聊天,献民赶紧介绍说这也是北大校友某某,现在上海文化出版社工作。这校友称呼献民“秘书长”,我问是什么秘书长,答曰是上海北大校友会秘书长。

今天晚 5:00 我乘沪宁高速客车来到了苏州,住在平江桥旁的旅园饭店。下午至晚上去了枫桥、石路和观前街,买了不少关于苏州的书,准备写完信后细细读来。

山水人民

1993年8月10日：河边生意

204

1993年8月9日晚，我萌动了沿京密河（京密引水渠）步行的想法。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这条河游泳。每天傍晚的河泳成了我的一种寄托，成了我对自己的一种奖赏。每次先逆水而上，在国防大学门前的石阶回头，顺流而下。出水后赤脚沿着河岸北行，一直等阳光和风把身上的水吹晒干。脚下踏着草、泥土、树枝和碎石。

这沿着河岸的行走是一种真切的观察。真切得连肌肤都在体验，自然的光景贴近着赤裸的头发、脸、腹部、胸和腿。我看着公路上的骑车人匆匆而过，汽车里的人们从车窗向外面张望。低下头看见草丛中活动着各种各样的昆虫，蚂蚱、蚂蚁和蝴蝶。一次我蹲下来观察一个蚁窝，看见一只蚂蚁探头探脑地从窝里出来，寻寻觅觅地东游西走了一阵，又张张惶惶地

回到了窝里。这似是兵蚁中的侦察兵，大概是执行什么不为人民所理解的特殊而秘密的任务。又一次看见3只奇怪的蝴蝶，黑色，长长的腹体，窄窄的翅膀，整个形体极像蜻蜓，但那种忽忽闪闪、悠然起落的飞行姿态却又非蝴蝶而行。它们在河中的一丛蒲草里游戏，两只似为情侣的黑蝴蝶上下翻飞、左右追逐，十分亲热；而另外一只则落寞地落在蒲叶上，时不时地为保持平衡而扇动一下翅膀。还看到许多的钓鱼的人，把钓线甩出去，把钓竿支在河岸，然后坐在小凳子上吸烟或者什么也不做，静静地注视、等候。钓竿有灰蓝色，有枣红色，有明黄色，漂亮而精致。京密河在夏季里多鲫鱼，也有少量的鲤与鲢。有时游泳时都能感到有游动的鱼碰着腿，使人既高兴又有几分惊惶。

京密河是一条年轻的河。没有传说，没有故事，没有与战争、英雄和王朝兴废连在一起的往事。这反而更使河显得新鲜、纯真而且生机勃勃。这是生命的本色，是流动的真态。我喜欢这条年轻的河。这河不令人想到遗迹、史书和古诗句，它向人提醒和展示的是河边的树木、鸟、虫和正在河边浣衣的妇人。看看活着的、正在飞翔和鸣叫着的生命吧，这令人想到自然和神。暂时忘掉人类和民族那点微不足道而又顾影自怜的掌故吧。

鲁迅在死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表达了一种留恋世界、贪欲生命的拳拳之心。那文章叫《这也是生活》，是说病危时忽然半夜醒来，叫醒许广平拉开灯，“我要看看”。就这么看看，摸摸，“这也是生活啊！”他已经不能走万里路去看海、看云、看城市和人文了，但他还要看，哪怕是只看看这小小的房间，看

看书桌、书架和窗户。这使我非常感动。我想起了小时候读高尔基的《我的大学》那三部曲，高尔基说他要走遍国土，“看看俄罗斯人民怎样生活”。年长的鲁迅和年少的高尔基代表了人类一种共同的精神，这种精神通过各民族的先知向人们提示着并演示着。

我们要看一看世界啊，尤其是趁我们年轻的时候。看一看，这是一种仪式，一种象征，一种宣布。

这两天我读美国的蒂尔(Edwin Way Teale)的《春满北国》(*North with the Spring*)，十分鼓舞。他不是文学圈里人，他似乎是一个旅行的生物学家，但他在美国春野上的行实被他写成了一篇篇自然而美丽的散文。读他的著作使人觉得那种匠气的玩弄词藻的小聪明的泛滥是一种怎样的病态与罪过。

206

“多尔伯把那条生气的响尾蛇放在地上。那只小猫一看大为高兴，立即跳跃而前。它的世界是一个游戏的世界。它蹲伏下来，作势在要向那朝它游来的丑恶的矛形的头扑去的时候，幸而有一个大孩子用赤脚把它一踢，它像皮球一样翻落在一堆西班牙苔上，没有受伤。对于毒蛇，它并无本能的警觉，没有这种遗传。”(《春满北国·钻石背响尾蛇》)。

“狗扑上去又赶忙跳开。鬃毛直竖的猪则用它有力的肩膀来挡退狗的攻击，用嘴凶猛地咬。在这荒野中，在阴暗的天空下，我们就像在看一场史前动物的战斗。”(《春满北国·苏汪尼河上之春》)。

为什么写动物、写野兽比写人本身更能赢得我们的心？现在这个时人号称的“信息时代”，人们每天从铺天盖地的传

媒上接受那么多信息，而关心蛇、兔子和白杨树消息的人怕是不多了。这是人心的一种进步还是退化？或许当人关心周围的生态胜于关心自己的时候，人是健壮的、年轻的，是这世界的主人；而当人汲汲于自己的生活琐细而不能自拔时，人成为他自己的老朽的奴隶。而蒂尔们的记述与表达就如同启示录，隐约地打动着我们、刺激着我们。

我爱河流。河流使人想起炊烟、人民和人生的流浪，我要沿着中国的河流步行。

就连缺少少肺的美国幽默作家马克·吐温，写到密西西比的时候也变得很深情，写小坏蛋汤姆在密西西比上漂流时那河的夜景与夜声使我很感动。

这种对河的深刻情感并不仅仅是因为水是我们生命之源，也不仅是因为水是我们生命的故乡。湖很美丽，海很壮阔，但都不可能像河流那样使我觉得无比地亲近。为什么？

京密河的河堤被利用作公路。公路两边生长着很有成色的高大的白杨树。是那种长势很旺的毛白杨。在北京大学读书时骑车去稻香湖、去大觉寺、去妙峰山都从此路过。有一年10月骑车从稻香湖回来，看见金黄色的秋叶映在水里有一种浓重的色彩感，蓝天与黄叶叠印在清澈的水中又有一种鲜明的层次感。还有一年初冬经过这里，杨树上的秋叶已快落光了，只有枝梢的叶子还挂在那里显得很玲珑。可惜深秋落叶正盛时没有专门来看过。我想起南京有座山叫清凉山，此山属金陵一景叫“清凉扫叶”。我很喜欢“清凉扫叶”的意味，但清凉山毕竟是一座庭园山，被圈在围墙里头像一个大盆景。

围墙里的山林落叶再美丽也不过是美丽而已，哪如田野、河岸和荒山里的落叶那样显示出一种浑然天成的质朴的造化，没有一点儿表演性，因而不禁使人生出一种肃然的喜悦。

而现在白杨树绿色正浓，是夏天。

1993年8月10日8:30自中央党校出发。校园的草坪区蜻蜓已成群地在阳光下旋飞，建筑物门口的花池里白玉簪花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南门外警卫连的武警在训练，一张张挂着稚气的娃娃脸。谁也没有注意到，路旁的黄杨树篱上结满了蛛网。

走出中央党校南门，从丁字路口上了那条贴着颐和园北围墙的路西行，看各种车辆已经开始了上午的繁忙。走在路侧国槐树那斑驳的荫凉里，迎面会走来一两个穿着列兵军服的战士；这附近有好多个军队大院。在北宫门口卖冰葫芦的妇女们也已经推着车就位了。一家地毯铺门口挂着一排排地毯晾晒着，深红底、粉色底的剪绒地毯。

再拐过一个弯就是京密河。但这些在自己家门口忙碌的人们，未必想到了自己是住在河边。

我拐过了弯，经过了白柱蓝棚的北安河桥，它架在一条废河上，接着就来到了同样的白柱蓝棚的新安河桥，这是京密河上的桥。1990年我因违犯交通规则受罚，曾在这两座桥之间为亚运会值勤。

沿着河东岸向北，河岸的老柳树梢不知怎么的都枯死了，下面的横枝却葱茏。枯死的树梢给人一种饱经风霜的感觉。

河堤的东面是人家，谁家的小院里一院的核桃树，树冠把

小巧的院落篷严了。有几座名头很大但规模很小的工厂坐落在这里，“北京长虹电子仪器厂”、“北京清凉喷雾器厂”、“北京望川制衣有限公司”。制衣有限公司的大院最洋气，漆成白色的小楼前停着一辆枣红色的桑塔纳，一个女工背着背包提着网袋正走出门来，大概要出远门。

居然还有一座小小的清真寺，过去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完全是北京平常的建筑格式，顶部也是汉民族的方阁楼。不知为什么寺顶的新月朝向天空的而不是朝向麦加，这若是个疏忽那这个疏忽也太大了。寺内悄无一人，礼拜堂青砖红棂，大门紧锁，教教室开着门却没有人。

这一段河流是砌成的水泥岸。把一条河关锁在水泥岸里真是太委曲了。我喜欢在原野上自由流动的河，随意地一转折就闪出一片辽阔的河滩，一群马悠闲地在河边吃草。那才真是河岸啊。

河岸的水泥砖缝里疯长着苍棵、灰灰菜、不知各的野菊花和粉色的牵牛。即使人工覆盖之处自然也无处不在，你看这水泥岸面上的绿苔，你看城里在立交桥缝隙里生长的荒草。

蝉声在头顶的树上不停的噪聒，从河里飘来了水草的腥味。这是河的气息。

河堤与河岸之间有数丈宽的隙地，长满了茂盛的蒿草和不成材的河柳。柳行里只听见蝉鸣不见禽鸣，偶尔才能看见一只孤零零的麻雀在柳枝间跳行。鸟们都哪里去了？这扑天盖地的蝉声对鸟类肯定是一种痛苦的压抑。

河对岸的水泥台阶上有人在起劲的涮洗着一个人造革黑

提包，有人在台阶上坐着，手托着脸对着河面发呆。

10:30 分我来到了我惯常骑车来游泳的地方，水泥岸自此完了。这时没有人游泳，只有几个半大孩子在浅水里嬉戏打闹。两个胖孩子打着打着就真打恼了，咬牙切齿地在水里搏斗起来。

河水很清很绿，清绿得甚至有几分脂感。河水宁静而缓慢地向南流动，人几乎看不出水在流，有时还会看见向北的回波。但水确实是在劲流，只要你一下水游泳你就会强烈地感觉到。

河面如湖面，给人增加了几分悠闲散步的情怀。

我又在河边的茅草与蒲草丛中看见了那种奇怪的黑蝴蝶。现在我有点怀疑它是不是蝴蝶了，它那细长的腹体确实不像蝴蝶。那腹体是绿色的，我站在河岸边探身看得很清楚。但它确实又不像蜻蜓。蒲草丛中我发现一只少见的蜻蜓，它的腹体是鲜红的。我发现蜻蜓停落在草叶上时那翅膀是展开平放着的，而那黑蝴蝶却是收拢上举着的。

我想起世纪初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给他一个生物学家朋友的信，说：“我刚从白宫草坪散步回来。我多么希望散步时你在身边啊，那样你就可以告诉我那鸣禽叫什么名字了。”我现在也多希望身边有一个生物学家啊。

那只黑蝴蝶仍停在草叶上纹丝不动。一只栗色蝴蝶从草从里飞出，翩然而去。

11:10，来到了海淀乡种鸡场附近。河对岸的坡岸上长着丛生的灰荆。此岸的小路上遗落着火腿肠衣、饮料的软包装

和天坛雪茄烟盒，河里时而看见漂流着一块白色的泡沫塑料，像游动的浮标。时近中午的太阳照到河里，才看见河水有一种黄蒙蒙的浑浊。有时看见小鱼欢快地一闪而没，似乎很喜欢这浑浊。柳影在水波间弯曲了又复原，复原了又弯曲。

自种鸡场而北，河岸陡峭不可行走。于是走上河堤，在河堤的杨树行里北行。河堤的东面是稻田，无数只燕子在紧贴着稻秧飞行盘旋。麻雀飞得高，匆忙地来往于杨树梢和稻田里的电线之间。一只白色的大蝴蝶在田里自在地飞着，乍看竟像一只小白鸟。杨树行间落了一层星星点点的黑色鸟粪。东边的远处是农业大学的楼房。

河堤上5行大杨树蔚然成林。地上长着各样的野草，其中有我少年时代习见的星星草、艾草、曲曲菜和七七芽。在一片黄色的矢车菊中翻飞着一只花蝴蝶。

11:50，来到未名山庄十字路口。路口停着一辆冰棍车。卖冰棍者是一个一脸喜相的中年人，戴着眼镜，一副乡村秀才模样。他的冰棍车格外地复杂，是我所见过的冰棍车中最繁琐的了。是把一辆三轮和一辆加重二八永久自行车用斜梁连在一起，上面的箱子叠床架屋，装冰棍有两个箱子，汽水一个箱子，上面还有一个箱子专装小吃；装零钱、整钱、杂物和冰棍纸还各用一个小箱子。这个人肯定是对木工有一种浓厚的爱好，忍不住要把木工活儿往复杂里做，看他的冰棍家什简直是在卖弄。把车停在这么一个荒僻的路口肯定顾客寥寥，对他那煞有介事的装备是一个讽刺。

问：“你怎么不进城去卖？”

答：“那城是随便进的？谁想进就进？起哪儿的照在哪儿

卖。我起的是温泉的照。进城去不要说工商管你，光城里卖冰棍的就不让。”

问：“这么笨重的家伙你怎么弄来的？”

答：“骑来的，像骑三轮一样骑。”

问他是哪村的，他往附近的一个村子一指说：“不远。马莲洼的。”马莲洼属东北旺乡。

从此处往北的河堤东面有一个小河沟，死水，里面长着芦草和马莲。所以叫马莲洼。河沟边的一棵构树让我觉得亲切。小时候屋后的空地上长着构树，一到夏天构桃红时就上树摘着吃。构桃是一种甜中微酸的浆果，一嚼就嚼着了里边的籽，有点硌牙。想不到这构树还长在这野外。构树属桑科，叶子有点粗，多毛，不像桑叶那样明亮剔透。

麻雀常常从草棵里惊飞而起。有人坐在草地上打扑克。蹬板车的民工垫着麻袋打，城市的骑自行车来的孩子们垫的是电视报，但他们玩的是同一种扑克，同一种游戏。

一个小伙子在垂钓，用的是买来的豪华钓竿，身旁停着一辆贵重的山地车。而许多赤着脊梁的钓者用的则是自制的渔具。底部是一个圆筒，旧饮料罐或者装洗发精的塑料罐，从圆筒上竖起一根铁丝，很粗的铁丝，铁丝的顶端装着—个彩色的香皂盒，权当浮标，钓丝从铁丝的上中部伸到河里。底部的圆筒靠什么东西固定在地上没有看清，为什么非得用圆筒也不得而知。这种自制的钓具很原始也很有趣，赤膊的小伙子钓得津津有味。没准儿土钓具比洋钓具钓的鱼多呢，我希望是这样。

河堤的公路比较窄，是危路。这路充分地体现了城郊公

路的特色。面的很多。331 和 330 路公共汽车笨重地从路上开过。骑车人有的带着煤气罐,有的带着啤酒箱,有的带着孩子。有一个骑轻型摩托车的年轻女人蹙眉而过,没戴头盔,风吹起她的头发,很长。有人驾着残废人用的机动小三轮车载着妻子,不很优雅,但也很实用。有马车。你正在仰头看树梢的鸟,就听见身后响起清脆悦耳的马蹄声,是马车经过。北京郊区的马车多为大平板,很不耐看,不像我老家的大马车,两边有车栏,前后有装饰,很经心的样子。马车多是马驾辕,骡拉边套。马车上套的已多是快牲口了。

12:45,我看见一只蝙蝠飞过。大白天居然有蝙蝠。蝙蝠在白天飞得很谨慎,似是思索着一下一下地扇动着肉翅,不像夜晚飞起来那么自如而自得。蝙蝠是盲者,它也能感觉到白天黑夜吗。

草丛里有细小的绿色草蜢,很纤细。在北京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在家乡黄河滩上看到过的大蚂蚱:绿色的“老扁担”,栗色的“大老飞”。蚂蚱是家乡好。

在我抵着杨树作记录的时候,棕色的树蚁爬到了我的笔记本上,一只小小的、带点绿色的蜻蜓落到近处的树干上观看。

稻田里的垄沟流淌着清水。垄沟埂上长着两趟黄豆,油黑油黑地旺,已经挂果。这里的豆叶尖而长,不似河南一带浑圆而厚实,有一种毛茸茸的感觉。这里的黄豆长得有点像绿豆。

路旁停着一辆脚踏抽水车,蹬车的农村民工仰躺在杨树

下的草地上睡着了。他的衬衣很脏，脸上有灰，睡着时露出了黄黄的牙。大概是很累了，他才在这车喧蝉噪的河边睡着了。正是这些肮脏的农村民工承担着城市的繁重的劳动。这个民工就在这郊外的河边露天而眠，城里人骑车路过没有人多看他一眼。

不远处竖着一个铁质的，漆成白色的告示牌，上面的红字已经在风雨锈蚀中变得模糊了，依稀可辩的是3行字：“禁止//捕鱼游泳洗衣//北京市京密引水管理处。”一路上到处是捕鱼洗衣的人，人们还天天在这里游泳，这告示无奈而孤单地立在那里。告示的背面贴的是江湖郎中的广告，包治阳痿早泄，包治萎而不举、举而不坚、坚而不久云云。有一张计算机打的寻物启事似是刚贴上去的：

寻物

214

我单位司机在本月7日下午(大雨过程中)，不慎将汽车行车执照丢失，内有保险卡、车辆购置费与93年养路费等物。有拾到者请与6687711呼1560或9444045(电话)联系，失主定有重谢，急切！

联系人：王福海

1993年8月8日

车号：北京01-10263。

这倒是一则很见时代气息也很明白的实用文。且没有错字，没有把“启事”写成“启示”之类的错误。大雨中有人丢了一个汽车执照，他很着急。平常的大雨，平常的丢失，平常的一个叫王福海的人：这一切都很平常，却让我很牵挂。

一只镶着金边的臭虫。背上有两排各七颗红星对称排列，中间一道金线。近尾的背部有一块黑亮的斑，斑上又有两点红星。头顶的触须顶部是白色的。背部的底色是绸缎一样的灰。总之这是一只颇华贵的臭虫，雍容地在杨树干上爬上爬下，差点儿爬到我的笔记本上。

树干的裂缝里还伏着一只大臭虫，栗身白点，无甚可观。伏在那里如眠如死。一只大黑蚂蚁自上面蜿蜒而下，爬到这臭虫身边从前后、左右对它做了几番试探，臭虫岿然不动，蚂蚁无趣的走开。当这只蚂蚁返回时，因匆忙而与这只睡觉的臭虫顶头相撞，臭虫恼怒地抬起头来，蚂蚁赶紧走开，臭虫又接着睡觉。

我非常喜欢从我眼前飞过的这只淡绿色的蝴蝶。时为下午 1:35，腹中微馁。

下午 2:00 整，来到了一个叫唐庄的村子。这里有一条向东的路，大概是通往清河，路口有各种各样的路标，指向“中国银行培训中心”、“中国棒球场”、“中国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路口有一个卖西瓜的，两家卖桃的。卖桃的大嫂一口四川音，一问是四川达县人，嫁到了这里。我买了 3 个桃子共一斤，想到河里洗洗吃，走下河岸发现有人在那里洗裤子，遂罢。卖桃大嫂去附近一家饭馆给端来一盆水，很清。桃子放在水盆里，大嫂把坐着的丈夫从椅子上赶起来，让我坐下吃。桃不甜，但倒是也不酸。

同卖桃大嫂的丈夫聊天。是一个有点赖相的短汉子。看

我穿北大背心，遂称常去北大。“去卖桃子？”“不，是去玩。”“跑那么远去玩？”“不太远，骑车一会儿就到了，从西门进。”他倒挺有雅兴的，也挺熟门熟道。问我那年在不在学校，去没去天安门。“现在学生是屁了。也不是屁了，谁受得了那玩艺儿，”他做出手枪状，“那玩艺儿给一下，吃什么都不香了。”

路口旁有一片长得不很好的柳林，立有东北旺乡政府不许放火的告示牌。问柳林里有什么鸟，那丈夫回答：“没什么鸟，就家贼。没有老虚子。”北京话把麻雀叫家贼，但我不知道“老虚子”是什么。“老虚子长得跟家贼差不多，脑门上有一红点，好看。逮住了它就在地上装死。”那丈夫让我一支金丝猴烟。旁边还有一个卖桃的姑娘，跟那四川媳妇一比简直是粗坯。她要取过我的记录本看，被那丈夫喝住。

烟未抽完我进了村头的一家饭馆，紧挨着一家“河东饭馆”的“白云快餐馆”。里面的老板娘 30 靠下年纪，长得很端丽。有一个穿绸衫的小伙子边喝边倾诉，桌子上一排空啤酒瓶，一只绿色的塑料啤酒杯扣在一个空瓶上。有一个白胡子白头发老头邻桌坐着，边听边开导小伙子。

小伙子：“大爷，您给我说说，说说。”

老头：“小伙子，我刚才不是给您说过了，您前途有量没有？”

小伙子：“无量，无量。”接着又喝酒。喝光酒又感慨：“我们结婚都 4 年了，就是一块冰，也把她捂化了吧，可到头……”

老头：“小伙子，怎么又提起这话了？我刚才怎么给你说的？你就是太把自己的那点小事当大事了。你小伙子哪差了？才 28 岁。她离了咱咱再找！3 条腿的哈蟆找不着，两条腿的人不有的是！”

小伙子：“就是，就是！她找一个 50 多岁的给人家寻欢作乐去了，我在这里单相思有什么用！没用没用！”说完他出去上厕所了。

在他外出的这当儿，老板娘、老板娘的娘、服务员都和老头议论开了。我听出这小伙子刚离婚，家住东郊，经常从东郊到这西北郊来借酒浇愁。“这人八成有点神经吧？”老板娘的娘说。老板娘赞同：“有点神经，不过不太严重。”

小伙子又进来。屋子里的人似乎都成了看热闹的同谋，小伙子一说话就互相递着眼色，抿嘴笑。小伙子有所觉察，说：“你们看我很幽默吧？连名牌大学的都笑我。”大家就赶紧说：“不是笑你，不笑你。”

老头接着开导：“你才 28 岁，年轻啊，着什么急呀。鲁迅 46 岁才结婚。鲁迅知道吧？”想不到这个乡村老叟还知道现代文学掌故。北京人真是不可小觑。

后来这一老一少又讨论小伙子新找的对象，是一个大他 4 岁且带一个 9 岁孩子的寡妇，老头认为不妥，小伙子说他是老脑筋，“跟我爸爸一样。”

这小饭馆一地的骨头和烟灰，但的确很有几分亲切气氛。我猜小伙子不神经，他的心思肯定用在老板娘身上。这大概只有小伙子和老板娘心里明白。

2:50 我过一座有绿铁栏的拱形木板窄桥。有一排身穿着同样花泳裤、同样个头、发育得很好的半大小伙子齐齐地戳在桥中间，凭栏看水，一时谁把谁推下桥去，一声尖叫之后是一片哄笑。

我来到了桥西。沿河西岸北行。自唐庄开始东面河堤变

窄,没有了人行道。

西堤上长着大片的狗尾巴草,密集的草穗随风摆摇。草丛中我看见了小时挖来喂猪的银苋菜。还有一种蒿我小时见过,叫臭蒿,叶子紧贴着茎长,细小的紫花和白花就开在叶与茎的交叉处。小时候我们常掐臭蒿的梗做成小小的飞车,一吹就飞转。臭蒿并不臭。

西岸的草丛中也有人钓鱼;有人坐在那里默默地吃东西,身旁放着自行车。一对母女模样的女人坐在草地上百无聊赖地打扑克。

下午3:50,来到京密河向西拐弯处。有一道水闸。岸那边有一个村庄,不知其名。

对岸贴河长着芦苇。芦苇在风中,所有的苇叶都朝向一个方向,很有态度。

218

路过村庄的河流不再是一条野河,平添了几分生活气息。对照地图,这个村庄可能叫西北旺。村头临河有一个杂货铺叫“亿兆综合商店”。一对父子站在石阶上用一条毛巾擦洗身体。这里是真正的石阶,是用一块块青石垒起来的朴拙的阶台。不远处有一块似是浑然一体的粉红色大石头,妇女们就着那石头洗衣,在石头上搓,然后涮涮拧干放到一个大红色的塑料盆里。妇女洗衣的下游一个老头扯着皮绳洗他的狼狗,黄中杂着黑毛的狼狗。岸上有一只黄色纯毛犬在村边散步。黄狗是村庄的风物,村庄的象征。想起李斯就刑前对儿子说:“现在想在上蔡同你牵着黄犬去捉野兔,但也不可得了。”黄狗是平民生活美好的标志。

有孩子戏水。小小孩在水里出洋相,大小孩在岸上嘲笑。

一个壮小伙子提一桶水从荒坡直接上堤,看见他背面很发达的肌肉,绷紧的肌肉。

一家门户临河而开,门外一片空地,几棵大树,一张小桌。母亲在埋头做针线活,两个小孩子在围着母亲打闹。时而母亲抬起头喝咤一声。母亲很年轻。

4:30,已经有点夕阳依依的感觉了。只有蝉声依旧,如同早晨一样大聒噪。我现在停留的这个河南岸的村子叫傅家窑。

我正在河边一个用木板搭成的洗衣台上写字的时候,被后面的一声叫声惊动。回头看见一个年轻妇女拎着洗衣家什站在身后。听口音不像本地人,一问知是四川内江人;其妹妹夫在这里做裁缝,她来帮他们照顾孩子。四川女人真是走遍天下。你听北京民工不同的口音,你就又一次意识到这乃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我以为你是在画画呢,原来是在写字,”洗衣妇女失望地说。

河南岸与公路的中间,是一片点缀着些微杂木的椿树林。不知种植椿树林是何用意,椿树既不成荫也不成材。但椿树的确不是野生的,一行行排得很整齐。许是椿树皮或者椿树籽有什么药用价值?肯定是什么地方要有价值,农民不会无缘无故地做什么事。

稚小的椿树林在两排大杨树的夹持之中。

河对岸的树很好看。临路的大杨树笔直地挺立着,而临河的、如用村里一样的一排柳树却向河面弯腰,低头低脑的样子很可爱。

5:50,我走在南岸杨与柳相夹的小路上。近路是杨,近水是柳,杨白柳黑,相对成阵。

公路上有一个站牌,我走过去看看,这一站是回民公墓。往南望,不见公墓,只见一片果园。大概从前的公墓已变成了今天的果园。

一路上已碰上两个木器厂,一个在东北旺的唐庄,一个在傅家窑。都是一个用油毡搭成的房子,用竹片围出一片空地即是车间,堆着待用的木料和已加工好的粗木箱。唐庄木器厂还堆着一方本地并不出产的毛竹,在篾成竹片不知要做什么。想一想我们平常用的木器竹器大都是在中国河岸边一个又一个简陋的场地做出来的,真使人有一种难言的亲切感。

站在河堤看公路上蹬着菜车飞跑的农村小伙。早晨他们蹬着板车往城里卖菜,傍晚,他们又蹬着板车往家里赶。都是弯着腰玩命儿地蹬,有的赤着脊梁,有的敞着怀,风把他们的花衬衣往后卷,鼓起很高在背后飘着。不亦乐乎。

在韩家窑附近,河边公路上朝南伸出一条又宽又亮的柏油路,饰着迷彩的卡车、装满了女人和孩子的豪华大客和各种各样的小轿车都从这条路上向南插,到前面拐个弯就看不见了。不知里面是住的什么人。看一个路标“佳友木器厂在部队大院内”,上画一个往南指的箭头,才知里面是一个部队大院。可能还是一个大单位呢,在这荒野的、被人遗忘和忽略的去处竟还隐藏着一番也许很红火热闹的生活呢。

自回民公墓到大舟坞有3站路。想不到驰名北京的绅士衬衫厂竟在这里,一个路标把绅士衬衫厂指示到了河北岸视

野之外的地方。这里还有几家什么股份有限公司，居然还成了一个小小的工商区域。

在一座水泥老桥下面看见有两个姑娘游泳。在水里仰泳的两个姑娘显示了那样的顾长而丰满的身材，或许她们是衬衫厂的服装模特。无论如何在这荒郊野外看到这样成色的姑娘使我有点意外，她们在这连汽车站牌都歪着的地方出现确实有点扎眼。

河北岸有一个木牌，上写着“海颐花园”。一眼望去确实看见里面有一片开败的月季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夏花，再往里是一座小房子。“海颐花园”不知何意，是卖花的呢还是一个小小的乡村公园。

离河北岸不远有一个矮围墙的院落，是一座小学校。从半掩的校门口探头望去，校园寂无一人。操场上长满荒草，如果荒草里有一只野兔跳出也一点不会感到奇怪，这太像一个废园了。一个短短的暑假竟能把校园荒芜成这样。东面的房屋门口搭着红红蓝蓝的衣物，大概是住校的青年教师吧。这如同旗帜的衣物方才使人感到一点人气。

再往西走，看见河南岸是一大片荷塘，河北岸是一大片稻田。这种大片的、旺盛的结果实的植物使人感到了水与土的丰饶。

在大舟坞小镇的镇头，依然是那几家冷饮和食品，依然是那个修理自行车的白布大篷，已看不出大篷的本色了：一切与4年前我经过时一样。只是物是人非了。

从330路公共汽车上下来不少小镇美人。穿着挺入时的，也都挺好看，却总在哪里带着点小镇气息。小镇其实有什

么不好呢,那小镇气息中自有一种让人觉得家常而亲切的东西。

航空航天部的一个研究所座落在这里,有几个高围墙的大院。小镇的街道是两边的高围墙相夹而成,很令人气闷。

大舟坞,为什么叫大舟坞?这里原来是一个造船厂吗?原来曾经有过大船和大水吗?或者只是因为——那也未免太糟人了——这里的山势像一个船坞?附近的地名叫黑龙潭,使人不由地认为这“大舟坞”一定是和水有关。

自回民公墓到大舟坞那一段河岸不知是什么年代用水泥板砌了一下。如今水泥板已在水浸风蚀中变黑,甚至一块块都有点破败了,被绿色的蒿草遮掩着。使你觉得这河岸的水泥板被年年岁岁的荒草生生地给揉碎了。若全是土和草的岸那是自然,若如城中河那样的水泥岸那是人工,只有这样荒草夹着破旧而破碎的陈年水泥板那才叫历史。

222
到了吃晚饭时。不禁想起了中午在那个“白云快餐馆”吃的一碗面条。那面条很筋道耐嚼,那汤很有味,那肉丝也份量挺足。不在乎有多少肉丝,但足量的肉丝确实给你一种货真价实的地道感,让你感到人与世界的可信与可靠。出城十里,即有乡风。我喜欢这乡风,喜欢这如今在乡村也很难找到的乡风。

自大舟坞坐 330 路公共汽车返回。在汽车上看到沿途村庄的农家小院。院落的围墙上多用水泥蒙顶;即是这水泥墙顶在夏天的蓬勃的气息中也生出了黄乎乎的苔藓。

公共汽车上空空如也。两个女售票员坐在一起聊天,不知在背后议论谁:“他给了他妈 100 块钱,他媳妇儿的脸马上

就拉下来了。”真实的生活无处不在,随便一走就走进了生活之中。

1994年4月30日：浮生半日

224

今天是大礼拜的星期六，又是五一节3天休息日中的头一天，心里十分轻松。休息日一定得是3天。再长就麻木了，再短终嫌仓促，3天假日才会使人既珍惜又从容，真正把假日过成假日。

今日早起决定登山。远方的山总是使人向往，近旁的山则往往被人遗忘。我外出旅行每到一处逢山必登，而与我一河之隔的几座山我却10年没有问津过。每次路过时都想闲时即来，但真到闲时则又想远足去了。今早醒来时决定，就在今日登西邻的山。

过京密河的青龙桥，迎头见山，名曰“红”；自红山向北，又有山脉凸起，名曰“黑”。“红”、“黑”二山的名字我觉得绝佳。红山脚下有车站叫红山口，黑山脚下有村子叫黑山沪。沪即捕鱼的竹栅，多指海滋之渔。红、黑二山是燕山余脉，西望连

绵,说猎估计无人怀疑,说渔如今已无对证;而黑山有村既云“沪”,定是曾有人居于此以渔为生。不过现在除了有京密河路过之外别无河湖,而这河的修成也是近20年的事,不知这古老的村名缘何而得。但查海淀之名近水,或许早多少年西直门外至西山脚下都是一片荒凉的水面。与黑山沪相印的是红山口下有地方名青龙桥,也近水。

有水无水暂且不论,我今天的计划是登山。黑山再往北有诸峰曰望儿山,相传佘太君在此西望杨六郎。六郎出征久久不归,为母心忧,登山望眼欲穿,所以又叫百望山。百望山已经被有关部门用牌楼拱卫,称“百望山国家森林公园”。好好的一座真山称为公园,真是罪过。

自写着“百望山”的山门进入,看出远处有3座高峰自南而北一字排开。南面峰上有亭,中间峰上有座铁塔,最北峰大概是主峰,修着一座不知何用的建筑。我不喜欢在山上建亭台,不过也承认亭台有时确实有招引作用。比如你路过一片山峰,上不上、上哪一座你一时拿不准,这时恰好那个山顶有一个小亭子,“就上这一座吧”,你会顺水推舟地这样决定。山顶有亭翼然,是一种提醒,是一种邀请,是一种诱惑,使路人顿生攀登之意。

我打算自最南的山峰攀到山顶,然后沿山脊北行到达北峰。

山中花已谢,叶正绿,已是初夏景候。山中没有太大的老树,多是毫无章法的乔木与灌木,凌乱而不成气势,偶然遇上几株茁壮的半大油松已算是英俊之材了。但这山林虽不成样子却相当茂密,各种肯定长不大的山老树们长得都十分努力,颇有生机;而且这种针阔相邻、乔灌相偃的杂树林也使我觉得

很入眼，不像清一色的松林那样阴森，也不是东北成片的桦林那样单调。这山上的树种有枫、栎、槐、松、柏，都是北方干燥地方的树。桑科的构树多长在背阴的谷地，这季节正排满了桑椹一样的青穗。槐花很稠密也很秀气，不是谁家庭院里那种怒放得近乱的家槐花，是花朵很少、花串很瘦、花香很幽的山穗花；但它们多么稠密啊，在槐叶疏朗的枝头呈现出浓重的青白色。我第一次注意到春末夏初的黄栌树，每枝梢头竟都开放着一蓬锈色的绒花，远看像云。桃树枝已挂上毛桃，是那种如算盘珠子一样的桃种；碧绿的杏树叶中可见青杏，杏树树干在积年的雨水濡染中已变得墨黑，黑树干与绿树冠相映，成一种鲜明的对比。还有遍地而生的山枣。我没有想到，到春天山枣的刺会变得如此地锋利，挂住你的衣服是如此地纠缠。到处是山枣丛，我还看见枝头多挂着去年的红色果实，圆圆的，表皮稍有皱枯，但很好看，姑娘们喜欢用红山枣串成项链戴起来。

在山上攀登你会觉得自己其实很矫健。在山上攀登能给你帮助的是那些无名的灌木。这个季节许多灌木还没有转绿，因而你辨不出它们的种与名，就是山枣也还不过刚刚生出绿芽。登山时能让你一把抓住的是那些灌木枝条，紧握之下你才会知道这山间的灌木扎根是那样地坚固，枝条是那样地坚韧，你对它们生出无限的信任。山枣枝照例是不能抓的，但不得已时你可以用手指捏住它无刺的地方借以攀援。山枣又称酸枣，其实它的果实是涩而不是酸，名为酸枣大概是取其非脆非甜，很不适口之意吧。

在山谷的一片深林中忽听见在鸟翅的窸窣之声，寻觅中看见一只黄绿色的鸟从我头顶的树枝上飞起，头上有绒冠，疑

为戴胜鸟。附近的一株松树杈上有蓬松的鸟窝，不知何鸟所筑，筑窝很低，大概恃山高无人。山中的鸟不太多，傍晚时分有鸦噪。林中有白色的兽粪，不知何兽，似为狼。这山站在山顶向西望峰峦起伏，深得很，林也很密，有狼是不奇怪的。

今日山上倒是没遇上狼。人也不太多。一条窄径旁有一男一女坐在低树枝上亲热，因路只有一条，我绕不开，只好从他们身边走过。竟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穿得土洋土洋的，很像两个外出偷情的大队干部。他们看见有人过就分开。我走过一段回头看他们又在亲吻，见我回头又马上分开。我再走一段再回头他们仍又从亲吻中分开，主要是那女士机警，总在目送我的行迹。两个不很老练也不甚坦然的偷情手。在一个小亭子处遇到一家人，夫妻忙于互相拍照，都没注意那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在爸爸妈妈拍照的空隙正忙着搬一块沉重的石头往崖下扔。有夫妇双双牵着一个女儿走路，小女孩好奇地问妈妈“是这山高还是喜马拉雅山高”。另一家的小孩在平坦的山顶路上跳跃着奔跑，口中念念有词：“山高坡陡，十分好走。”更远处有女声与童声合唱“潇洒走一回”。

在一处密林中看见有工人在施工，建一个亭子。亭子已成，脚手架上的女工正把亭檐漆成妖异的鲜蓝色。亭前立有新碑，刻石已成，看起来亭子却是日本人所建。碑的正文是“赞乡爱林”4字，落款是“日本国田栗荣太郎”。我以为是日本人忽发热爱自然之心，但看背文却见另有用意。背文是诗体：

东南人自古慕河江之地
西北民也曾有东迁之迹

上古以降互相使节往还
日中友好亲善自是当然
倭人汉族本为同文同种
愿此小亭为中日友好础

这用意在于友好。诗很一般，但意还是挺诚的。诗的落款是“一九九三阳月荣泉”。“荣泉”约是此君号。这是一块私碑，田栗荣先生大概也是个普通的日本人。抚摸着光滑如镜的碑面和深刻有力的碑文，我心里忽然挺感慨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人出资在中国的荒山中修一座亭，立一块碑，提醒人们中日应该友好，这之中包含着一种拳拳愿望，包含着对祥和与幸福的祈祷，包含着对自己国家的忠心，以及对整个人生的虔诚。我们中国人就很少这种消弭危险、保护生活、造福子孙的念头和责任感，从来没听说过哪一个中国大款在日本国的山中或路边修一座什么建筑提醒中日友好。中国的山中有日本人的碑，中国的家庭和情侣在山间沐风而行时遇上这些建筑这些文字，心中不禁会生出善意。虽然它地处偏僻，看见它的人会很少，并且在一座平常的山上立此碑未免突兀，但越偏僻越突兀给人的印象就越深刻。日本人多有这种宗教性的自发的参与精神。我看过一套精美的画册，是一个日本人自费印制的，辑有春夏秋冬四季鲜花的照片，精致而美丽。书中夹着出资印制人的一封短笺，说自己已届老年，人之将死，遂倾其资产，将一生简朴度日留下的积蓄用来印制这画册，以使人看到上帝造物的美好，增进人们对世界和人生的爱。别人对世界对人生爱不爱与他一个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小民小人物有什么关系，而他的确认为有关系，而且尽自己所能唤

醒别人的这种爱。在他认为有关系时这关联也就真的出现了,这就是生活中的一种善缘。我很敬佩这种精神,也很惋惜我的同胞缺少这种精神。

我几乎走遍了这几座山峰。有时在一处山角落我会看见一棵细小的、可怜楚楚的桧柏苗,根部围着水围子,有浇过的水迹。我惊异于人们在这样不为人知的见脊里默默地绿化着。往西面山峰正在修一条片石铺成的山道。我看见有一棵大槐树不偏不正就长在石铺小道的中间,很是旺盛,想是修路时正冲着这棵大树,绕不开,而石匠又太爱这棵喜人的树了,舍不得砍,就把它一反常规地保留在小路的中间。这一切细微处的经意所为都使我心中喜悦,使我在无言中看到了人们的心之光。

1995年8月23日：秦皇岛

230

中央党校的学术活动中心在黄金海岸的密林中，房子是7层的宫顶建筑，有点像北京的王府饭店。这里海滨一带全是“北京××”的字号，实际上也多有北京各单位在这里设的休养所，南北戴河和黄金海岸一线堪称是北京的大别墅区，我校的房子带点王府样式只不过是此地北京风之一例。相比之下名曰“学术活动中心”算是最有书卷气的了，听说中国作家协会在此地有“创作中心”，这两家堪可配对。此外的名称可就直白了，“疗养院”、“休养所”之类，顶文雅的也就叫“培训中心”、“会议基地”而已。叫“疗养”、“休养”的是老实人，而“学术中心”、“培训中心”云云何尝真搞学术和技术培训，亦不过擅立名目。名目学的确需要一定的聪明和幽默。不过，需要挖空心思去巧立名目也还是因为有所惧而不得自由，真正自由的是干脆不要挂任何牌子，围墙一圈、哨兵一守了事。在这

里旅行看见小楼华屋觉得自然，而看见用红砖盖成的粗陋的当地民居反令游人有点怪讶，觉得不真实起来。秦皇岛人习惯地把自己的家乡称为“夏都”，确实颇为贴切。然而，当夏天一过，各个大院人去楼空，仿佛一个热闹的都城在从天而降之后又不翼而飞，这里又重归为老百姓的天下，那些夏天里在各个角落里叫卖的农民和市民又回到了天地的中央，在这个美丽而空旷的地方活动起来。1992年秋我途经北戴河，看见一块一块金黄色的稻地和收割过的有点纷乱的玉米田，以及一群一伙地在田里劳作的村民，心想那个充满着炎热和欲望、文明和纷争的夏都终于在这些农夫农妇手里变得纯净而澄明起来了；这成熟与收获的万古景象，对那些江山易手、人物改换的匆匆场面乃是一种无意而无言的嘲笑。“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难道那些自以为天降大任、顾盼自雄的人物们所演出的悲剧故事真的只不过是这些下层百姓劳作之余、茶酒之后的谈资？“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历史因这笑谈获得了一种收束、一点依凭，世界也因此而增加了几分轻松、几分从容。

回乡琐记

1990年1月23日：回乡

232

火车路过无数院落。看见一个坍塌的院落。大门楼是砖砌的，写着“为人民服务”，颜色仍见；但紧连着门楼的却是半颓的土墙，已被经年的雨水粉蚀，东倒西歪。

每个小站都有一间黄色的房子，孤零零地紧傍着铁路。每个小房子前面都松松垮垮、似立正非立正地站着一个铁路值勤，身着灰色而黯淡的铁道服，却戴着鲜艳的红帽子或黄帽子，垂下的手提着红黄两色指示旗，迷茫地望着过往的火车。

原来，邛山脚下的黄河中，公路桥和铁路平行而过。同样地破旧。现在新公路桥已在东线通车，这边的公路桥已炸掉。坐在火车中西望，只看见一个接一个的桥墩废茬触目地排列在河中央，荒凉得毫无诗意。

在郑州下车后找旅馆。先找到一个“长城宾馆”。登记大厅兼作对外营业的售货场，热热闹闹，让你觉得在这里住宿你将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睡觉。

总服务台没有服务员。服务台的进门锁着，只有一身份不详的老太太用河南话和气地接待我。她告诉我宾馆从明天起放假，所以今天就不接待客人了，不过一两个客人或许可以住。当我惊讶的问起宾馆为什么还放假时，她的回答也同样惊讶：“干吗不放假呢，都干了一年了。”并告诉我说服务员解手去了，一会就回。我耐心的等了十几分钟，服务员仍解手未归。老太太终于觉得对不住我了：“你先登个记吧！”但是又找不到登记簿。老太太贴着服务台的玻璃隔扇侦察了半天，终于发现了登记簿，从远处搬来一个凳子，吃力地爬到凳子上，把半截身体从问讯窗口探进去，终于将登记本取出。

登记完毕，老太太如逢救星地喊了起了：“你终于回来了！”一抬头，见一个不好看的妇女走进来，该是服务员了。她抱着一抱藕，似乎不是从厕所来。服务员语气远不如老太太热络，不耐烦地说了句：“明天放假，今天不营业了。”好说歹说，她绷着脸答应我住下，但必须得是明天8:00钟之前离开，不耽误她们放假休息。当我终于决定不住此地时，服务员和老太太显然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经人指点又来到了一个叫“华原”的饭店。这名字乍听起来有点像“花园”，或者“化缘”，多少有点柔和气息。但走近一看，原来是“华原”，粗而楞，带着河南气。是炮兵学院开的宾馆。总服务台值班的服务员为男性，少校军衔。告诉我宾馆放假，大部分房间封存，只留下少数几间，故须等一会儿有人

退房后才能安排。因而他建议我先去吃饭，并热情地指点餐厅方向。餐厅的服务员都是军人，说午饭已客满。我望着空空如也的餐厅，不知客满是什么意思。只得出门到对面个体户的餐馆去。

吃饭回来约是两个小时以后，少校热情地迎出大门，告诉我他一直是在等我，连饭也没顾上吃，弄得我十分感动。“远道的客人嘛，”少校谦逊着，并且特意叮嘱一声：“我们宾馆的条件不好。”

上去一看，条件果然不好。一间客房两张床，床头灯有一盏是坏的。觉得很冷，本能地寻找暖气，走上前一摸，冰凉。电视怎么打也打不开，怎么掀开关都不见动静。只得退房。从服务台到总服务台，听说退房都连眉头也没皱一下，顺理成章地办好手续，似乎他们对客人中途退房早已经习惯了。

我走出大门，门口竖着一块黑板，一个穿战士服、满脸稚气的军人正吃力地在黑板上写美术体的粉笔字：“宾至如归。”他正写到那个大大的“归”字上。

后来找到黄河饭店。黄河饭店大厅极漂亮。总服务台煞有介事地挂着十几口钟，指示着北京、东京、华盛顿、巴黎、堪培拉等世界名都的时间。但这个饭店没住一个外国客人。不要说打国际长途，连市内电话也拨不通。在客房中看书，就听见走廊不时传来儿童游戏的喧哗声。不用说，是服务员的孩子。

什么叫落后？落后是一种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活习惯。人的生命的能量在散漫中浪费着，得过且过。没有谁警醒。即使有人振奋一下，但过不

了多久就又疲劳下去了。没有凄厉的喊声。没有奇人——奇男子和奇女子。睡眼惺松的警察提着黑色警棍在街上逛游，看见违章破口大骂的那一刹那眼睛才一亮。

河南人的面孔。总的来看河南人的轮廓和细部都给人一种粗大的感觉。脸很方正。个头较大。大的个头加上方正的脸，外面再穿一件整齐的深蓝或灰黑的中山装：这就是河南人的标准形象。头发常常较短，因而隐隐地露出几分狰狞。

河南官——大官、小官和“普通干部”——似乎都很善于说新名词。说新名词就像娴熟地摆弄着别人家的东西。自己觉得很娴熟，外人看来终有些不像。这些人脸上都刻着被政治驯化的深刻痕迹。没有比河南人用河南话重复报纸上的政治语言更像那么回事、更进入角色的了。河南人是政治动物。每个人外表都很敷衍，但内心都有一套自以为得计的待人韬略。一个个胸有成竹的样子。

河南人——城市里中上层的河南人，大都很世故。长期的穷困养成了对利益的高度敏感和极度重视。出卖人格的吹和拍；卖友求荣；划清界限；一阔脸就变……这些中国人共有的国粹，在河南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河南人社会化程度极高。青年人大多很乖，很懂事，对尊长很有礼貌；很会来事儿；很谦虚谨慎。并对一切出风头的异端极尽打击之能事。

河南人爱问别人“有对象没有”。把结婚称为“个人问题”。两个人一见面，熟识或者不熟识，就会漫不经心、理所当然地问起“个人问题”、“对象”。平淡中有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河南人都想当官。因为穷、因为受欺压，所以养成了对富、对欺压的崇拜。从事科学和艺术的人在河南是个悲剧。

河南人一个个自以为是，虽然是平原，虽然是交通枢纽，但却有一种不可理喻的封闭性。对外来的一切都有一种本能的敌视和防范。村子里谁要是从外头来，说普通话而不说河南话，就会受到一致的恶毒嘲讽和无情打击。据说原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就因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拒绝中国科技大学办在郑州。据说 80 年代省委书记刘杰曾请温元凯来郑，有意请他出任新建的黄河大学校长，结果受到了有关部门满面笑容的排挤。温元凯住在黄河饭店，服务员在有关人士的指示下把房间的地毯都撤了。拒绝一切外来的东西。

郑州及河南每一个大小城镇上都流行一种食品：羊肉烩面。巨大的海碗，一碗盛 4 两。上面撒满了红红的辣椒。所谓面，也不是面条，而是嚼起来很上口的厚而不规则的面片。吃起来极刺激。面片极有嚼头，加上那巨大的碗所带来的视觉鼓舞，十分气魄，煞是豪爽，吃起来豪气顿生，豪情满怀。最有诱惑的是那汤，被辣椒面染得红红的，看起来是一种挑战，极想喝下去，真喝一口又辣得流泪，唏嘘半天；但仍不想善罢干休——直到象搏斗似地把那半碗汤喝完为止。吃烩面就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大概那些生活中缺乏色彩的平民百姓可以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

羊肉烩面是我这次回乡在郑州街头感到的光明面。在街头的小摊上吃羊肉烩面使我感到了乡情，使我想起了在底层艰难的生活中顽强地生活着的人民，那是我热爱的人们，我的血脉相连的乡亲。

1990年1月24日：敝乡风(上)

河南人信服看风水。我的家乡的县里关于看风水有许多传说。说某村有一家财主，请了一个风水先生看坟地。风水先生对财主说道，选中了一处绝好地方，在该处扎坟可世代为官；但因为看了这块坟地，自己的眼睛要瞎掉，因此必须与财主签约，包养后半辈子。财主满口答应。风水先生指示地方后眼睛果然瞎了。财主开始时尚能守约，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善待风水先生。但天长日久，渐渐不耐，常给风水先生冷面。后来干脆赶出家门。风水先生不忿，招来自己的徒弟，吩咐报复计划。令徒弟于九月九日子时三刻伏于坟地云云。徒弟依师嘱备下桃木橛和铁锤，于是日是时伏于坟地。果见一队人马，明灯朗烛，军马随从，自远处遥遥而来，至坟地遁于地下。徒弟奋起，把桃木橛钉到坟地正前头，匆匆离去。不想队伍中有一个迟行的掉队者，之后才急忙赶到，见到桃木橛，大

惊失色，转身仓促逃离。桃木橛是破法，那队人马是财主家将来要做官的子孙。桃木橛钉下去，人马就再也出不来了，于是这家的风水就破了。那位落后者侥幸逃脱，所以财主家后来就出了一个做官的。

这个故事到处流传，小时候总听老人们讲起。听时总被故事的奇诡和陡然转折所震慑，未暇推敲。尤其是“九月九日子时三刻”所表达的确切无疑，“桃木橛”所带来的不解其意的神秘，使人不禁肃然。为什么要用“桃木橛”？为什么不是柳木、杨木或者柿子树木？所以以后看见浅红色的桃木总有几分不自然，总觉得那带有些许邪气。

这个故事无疑是一个悲剧故事。失明是一个痛切的悲剧情节，复仇又是一个悲剧高潮。但因为最后的悲剧起因是个人饭食问题，把这一切都消解了。不过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有一种连讲述者也未必意识到的内在因果逻辑：因为财主家忘恩负义，所以其风水被破，子孙受损；但因为其忘恩负义的情节不甚恶劣，而且日久不耐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只受损而不受害；且又因为其家毕竟侍奉风水先生有日，所以还留下一个掉队的避开法网。仿佛是一个不露痕迹的道德设计，在人之常情的顺理成章中暗含了倾向性与分寸感。

但好像老人们讲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道德训诫，而是为了说说痛快。这个故事夏天的夜晚在场院中讲来自有一种魅力，听起来和讲起来都不觉得生出一种凛然，被那种环环相扣、不可思议的情节所吸引，陷入那种浓厚的气氛之中。

黄河的乡村流域突兀地修起一座大桥：郑州黄河大桥。这桥给一直很平静的生活气氛顿添了几分神奇。深夜，一盏

盏明灯在被夜色遮住的桥上排成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长的线，于纯净的乡村夜色中显得格外醒目。

我出生的村子就正好赶在桥头。大桥修成，桥头的公路两旁如雨后春笋般地生出无数饭馆。饭馆从外乡请来了许多女服务员，服务员又招来了许多路过的外地司机。“司机”和“服务员”的故事于是就成了沿路村庄街谈巷议的话题。饭馆老板对这种交易睁只眼闭只眼。不到一年，这一带就被称为“二香港”、“二深圳”。这里的人对香港和深圳的理解就是一个大妓院。开饭馆兼拉客，正应了孔家门徒“食色性也”的教诲。

派出所抓嫖成了一项重要工作。抓到外地司机可罚款数千，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所以乡中贤者建议派出所把服务员赶走，被派出所坚决拒绝。派出所定出规矩，不许服务员向过路司机招手，招手者罚款 50 元。这么订是因为要招徕顾客非招手不可。

饭馆里有许多稀罕事儿。有一个名叫老黑的农民开饭馆。老黑过去没作过东家，这次可要过当东家的瘾了。他严格区分自己和服务员的伙食，自己吃好饭，却只许服务员吃白面和黑面混做成的“花卷馍”和老咸菜。服务员每天和大鱼大肉打交道，自己却只能吃咸菜和花卷馍，就千方百计地浪费东西。不到半年，饭馆全都陪了进去，只好关门大吉。东家就自行免职。

饭馆老板自然都很巴结派出所。但有一个不信邪的主儿。一日正在与朋友喝酒，派出所所长莅临。客人们纷纷起立让酒，该老板却头也不抬。所长面子上很挂不住，转了两圈，很没意思地走出去了。客人们开始劝老板，“在人屋檐下不得

不低头”云云。老板有老板的固执：“我理他干吗？他不就是条狗嘛。”所长出门后不甘心，猫在一个角落挑毛病。见服务员向客人招手，所长又回到饭馆，趾高气扬地宣布罚款。老板面不改色，问：“罚多少？”

所长回答：“50。”

老板回头命令服务员：“去，把盛钱的抽屉搬过来。”

服务员默默地搬来抽屉。老板对所长以命令的口吻说：“拿钱！”

所长马上就成了一个可怜角色。不拿不行，拿也觉得面子上太难堪。而且所长从来没遇过这阵势，不知该如何应对。手足无措之中顺手端起桌上的一杯水去喝。

老板见所长端起了水，马上又对服务员命令：“来，把这桌子搬走！”

所长手中的杯子立时成了无处可放的可笑的东西。经过这番羞辱，所长发狠：“治不了你我就不在这儿混了！”

果然所长又找了一个由头罚了老板 4000 元。老板眼都不眨就把钱拿出来了：“不就是要几张臭钱吗？咱有。看你还能怎么样？”

不能不说这老板不是个人物。

我家二叔爱算计人已成嗜好。和人家搭伙播种，他摇耧，给自己家的地摇得很密，而给别人家的地则摇得稀稀拉拉。后来和自己儿子合伙，仍然不由自主地犯同样的毛病。出苗后堂哥和堂嫂气冲冲地去找他，一进门气氛就紧张起来。堂嫂质问：“爹，你干脆把我们一家杀了算了。给我们的地种得那么稀，想叫我们饿死？”二叔辩解说是他们的种籽不好。堂

嫂接着问：“麦地你说我们的种籽不好，死无对证；但种油菜咱两家可是买的同样的种，为啥还是你的稠，我们的稀？”问得老头哑口无言。

二叔和别人说话，同别人做事，举手投足、张口闭口都是圈套，至少也得对你说几句无害的谎，要不这样就觉得对不起自己。村里同宗的三哥总是说起他一件事。赶集日三哥吃过饭，在门口碰见二叔。三哥问：“叔，去不去赶集？”二叔马上矢口否认：“不去。没啥可买，去赶那王八孙集弄啥？不去。”三哥收拾停当骑车去赶集，在半路正遇上了步行去赶集的二叔。当场质问，二叔支支吾吾。连去不去赶集这样无关大体的小事都要掩掩藏藏，这种人的算计已经不可救药。有名为“北大堤说话南大堤听”。他已完全丧失了说真说的能力了。人们对他都敬而远之。过分聪明的人，也许是最不聪明的人。大家都知道所谓“农民的狡黠”，可作为一例。

241

村子里建房这些年变了许多样式。我小时候还有许多草房，土墙，茅草盖顶，上面糊泥。一旦下雨，泥顺水流下来；一旦刮风，风把房盖常常掀掉，一家大呼小叫地上房，往房顶上压石头。不过住在草房里的孩子们有乐趣了。厚厚的房顶里面住着很多麻雀，一到天擦黑时，小孩们常常拿着水电、搬着木梯或搭起人梯到草房檐里掏麻雀蛋和小麻雀。麻雀在那里叫“小虫”。常常掏出刚出壳的小麻雀，我们叫“小虫娃”，浑身秃秃地没有毛，因乍受风寒在你手里可怜地打战。有时掏出来大一点的麻雀，黄黄的嘴角，扑楞起来十分好看。大人们看见就骂，不许“害性命”。最令人恐惧的是人说掏麻雀时，有时手伸进去会掏出一条蛇，也就是“一条长虫”。虽然我从

来没有掏到过蛇,但想一想手伸进去碰到冰凉的活物的那种感觉总有点叫人心惊。夜晚到房檐里掏小虫是先用手电照,把里面的小虫照迷糊,然后再掏出来。一到冬天,房檐的一根根茅草垂下无数条冰凌,一折断发出清脆的响声。孩子们无法理解大人们住草房的忧愁。

后来就开始住薄皮瓦房和里生外熟的瓦房。当时最高级的是浑砖到底。

家乡的房子总是以单数的开间为习惯:三间或者五间。很少看见两间或者四间房。盖房过去一直不习惯盖平顶房,总在房顶上起很高的脊。山墙的顶上立着几头叫不出名字的怪物,统称房兽,大概是守房护家的意思。山墙上写着“泰山石敢当”或者“姜太公在此”等标语口号,也是为了吓唬可能来找麻烦的鬼祟。

盖房有许多讲究。北房称为堂屋,村子里一般多盖堂屋。讲究的是盖南屋不吉。说是村子里曾有牲口屋是南屋,结果屋里的牲口全都失火烧死了。有两户南屋居民见状大惊,赶忙把南屋朝北的门堵死,改成堂屋。其实迷信中也许有些道理,北为阴,多风多寒,南屋门窗朝北,于居民多不利。北屋门窗向南,阳光充足。许多迷信和禁忌实际上是生存技巧的一种隐蔽形式。

房子后墙一般是不开窗户的,一色的砖墙。这一带过去土匪横行,半夜常有敲门敲窗的事,后墙不留窗才会给人那么一点安全感。就是前面的门也要小,门板要厚;窗子是粗笨的木格子棂,并且也安着厚厚的门,可以在里面插死。房屋不惜以牺牲平时的满足与方便来保证安全。

盖房如同建坟,都是充满禁忌的。路即是一种充满神秘

感的形象。阳间建房，路为刀，如果路直达谁家的山墙，即是把一把刀插到谁家的身上；在阴间，路为河，谁家坟前有条路，就会平添几分风水，大吉。路与河的形象是如此接近，你会常常想起或者幻觉出在一片莽苍的坟地之前，一条路那淡淡的白色会忽然流动起来变成一条河。小时候在梦中就常常见路突然或者慢慢地飘浮起来、流动起来。

与邻家的住房形势也是一种极为有趣的忌讳。如果邻家的房比自家的高，则称为“压一头”，将永世不得抬头，日子过得永远要比邻家逊一筹；如果与邻家的房一前一后错那么一码，没有取齐，则称为“相咬”，则两家永难平息词讼相争之事。两家的房子必须坐直，一道边，同样高，才能相安无事。否则将遭到邻家的干涉，直至大打出手，正坐实了相咬相争的征兆。

如果一家人前面邻居的房子低，后面人家的房子也低，这家人独独地住在中间的高岗子上，则被称为“挑担”，意即像一个挑担的人一样挑着前后两家，那不压死也得累死，不吉。这完全是望势生意了。

乡人在长期生活中感到，住宅或者坟地的果报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完成的，所以显得更加可怕、更加不可逃避，就像一种铺天盖地的弥漫一样。如果报应就是那么突然的一下子，毕竟好躲，实在躲不了时挺那么一下也就过来了。而沉默的、缓慢而坚决的果报则让你觉得走投无路，让你觉得人的力量的渺小和单薄。或者是人亡，或者是家破，隔几年出那么一件可怕的事，这一辈子就过得够糟心的了。

神秘有时是靠虔诚培养出来的。大城市里都住楼房，谁家都顾不上讲风水了，也忘了有这么一码子事，似乎也都还过

得平安。

我家乡酒桌上的风俗也许可以列为中原酒文化的一例。河南人喝酒堪称野蛮。喝酒不是一种生活富裕之后的奢侈，而是成了一种精神和身体的必需。就是在没饭吃的年代里，家乡的壮年汉子还扛着一布袋一布袋的红薯干到县城去换酒，换来 65 度的老白干，喝完后头疼欲裂，人称“拿头酒”。现在生活好了，酒风自然更盛。尤其是一到春节，村里的头面人物自然就天天花天酒地，这家叫罢那家来请，由这个酒摊下来到那个酒摊，整天喝得昏天黑地。这里把喝酒简称“喝”，“喝”就是“喝酒”。或者更简称“坐”，“你来家里坐吧”，“又去谁家坐了”，就是又去谁家喝酒了。喝酒已经像坐地一样平常了。而且酒摊上极耗精力，一坐下没有三五个钟头起不来，夜里一坐就到 12:00、1:00 一点，从街上走过常会听见谁家屋子里传来“魁魁魁、六六六”“哥俩好、爷俩好”的扯嗓子行令声。喝到后来，围桌而坐的汉子们一个个红头涨脸。

酒桌上人对关系变得格外敏感。“你非得喝了这杯酒，不喝就是看不起我！”如果你喝了一个人的酒就得喝下所有人敬你的酒：“咋，喝他的不喝我的，看他看不起我？”大有不喝就跟你拼命或者死在你面前之势。常因喝酒闹得心里别别扭扭，河南说话就是“谁和谁又在酒摊上弄不得劲了”。以酒遮脸，人变得无所顾忌，三杯酒下去，人又变得非常偏执。所以常常有人喝着喝着就掀翻酒桌，闹得不欢而散。

酒摊上常常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不露声色，自然地控制着全桌的喝酒形势。如果他输了酒，自有人替喝；如果他要坑谁，稍一暗示大家就群起而上；他要保护谁，大家就得立刻

罢手。这个中心必须是日常生活中的权力中心，还得会猜拳、有酒量。说话常常是软中带硬，谦和的外表下掩着威严。

酒摊也必然会有一个被捉弄的对象。这个对象常常是一个生客、外来者，一个平常就地位不高而又自不量力的人，一个在酒摊上吹牛说大话的人。几个人轮番与他猜拳，常常使他喝得满口胡话，大家取乐。在酒摊人和人的等级差别常常变得赤裸裸的。

河南人喝酒多喝白酒。猜拳一摆就是一趟酒，一趟就是7盅或者9盅，盅里的酒多倒半盏，排成整齐的一排放在那里，谁输拳谁往自己的面前端一盅。别人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猜，称为“观枚”，因猜拳又叫“猜枚”。等一局下来，各有输赢，两个都把自己面前的酒合二为一，合成满盅，一一地一饮而尽，然后，拿起桌上的筷子夹几口菜。有时一个人和桌上的其他人逐个猜，称为“打关”。

还有一种行令方式就是猜火柴棍，河南人称为“猜洋火把”。或者伸指头，大压小。或者喊令“老虎、虫、鸡、棍”，棍打老虎，虫蛀棍，鸡吃虫，老虎吃鸡，相生相克。

喝酒常常是一种交际手段，更是一种办事方法。有事直接找人托办，叫做“空口说白话”，双方都会觉得很窘迫。必须准备一摊酒席，几个人先胡吃海喝，天南海北地瞎扯一通，然后等上汤的时候开始说事。那时候大家都晕晕乎乎，懵懵懂懂，正是满口答应的好时节，“你就别管了，保证如何如何”，“你放心吧！”然后皆大欢喜地散摊，由客人先提议：“天不早了，那咱就这吧？”主人再客气一句：“都喝好了没有？”客人再证实一下：“喝得可得劲。”于是纷纷起身。客散后女主人开始进屋收拾残局。

黄河在冬天里顿失滔滔。一层厚厚的泛青色的冰，既平且静，把河封住了。冰凝结成水流和旋涡的形状，好像是突然之间停止住了。黄河像是睡着了。

但你仔细谛听，你会听到从冰下传出的哗哗的流水声。哗哗的声音越听越响亮，越听越真切，使你感到黄河那有力地流动着的生命。

我每年回乡一次来同黄河会面，就沿着小时候看河的路来到黄河边上。走过那平坦而辽阔的雪野，来到河边那厚雪也覆盖不住的、莽莽苍苍的茅草地。仿佛来到了生命的发源地。会感到一种顿开心怀的壮阔，把城市生活带给你的庸琐与苟且一扫而光。

1990年1月26日:敝乡风(中)

乡村教师是乡村社会的素食者。一个个文文弱弱,和和气气,在乡村粗鲁而蛮野的气氛中越发显得文质彬彬。斯文的腔调和语言总是和乡村的风气不合,所以说起新名词和文语总让人感到不自然和刺耳。

当然最可笑、最缺乏现实感的是那些入迷的语文教师。读到一篇得意的课文就忍不住啧啧称道。还有不少语文教师想在文学上成功,下苦功夫写了不少诗与小说,四五十岁的人了还整天价写“我爱你”之类的酸味很重的东西,搞得神经兮兮,津津乐道于辗转听来的文坛轶事,很唐突地激赏某一篇并不怎么样的作品。更兼一次又一次的投稿,但一次又一次被退回,弄得很泄气。但这样的老师又不能把退稿的事告诉学生,学生听了以后肯定会大喜,并且为自己作文写不好找到了充分的理由。

一位中学教师把他写的小说拿来请我看。因为小说写得无法卒读地糟糕,看过以后无话可说。而他则主动提示:“我的小说触及到了当前社会的弊端……”。然后问起我的写作情况:“你写作的条件很好,可就是创作素材有点局限……”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议论一些言不及义的问题。

有时人的谈话会极为吃力。双方都极力寻找可谈的话题,找到以后又一下子谈完了,还得继续寻找。边提起一个话头边担心对方是不是能够领悟,因此每番谈话都是一次冒险。

冬天正是邻里街坊串门的好时节。尤其是冬天的晚上。来串门照例不敲门,推门就进,边进边问:“××妈搁家没有?”或者(若是找男的)问:“吃罢了没有?”妇女们是边纳鞋底边东家长西家短地闲扯,男人们则边抽烟边讲一些陈年故事、国家大事或者村里政治。冬天照例要请客人上“煤火台”,即做饭兼取暖的炉台上那一小片空地。一般这块空地是留给家里的老头老太太的,如果没有老人或者老人不在则要让给比较重要的客人。或者在屋中的空地方燃起一堆火,冬天常用于室内燃火取暖的往往是玉米芯,将晒干的玉米芯摆成很规则的易燃的堆,点燃起来。

现在条件好了,许多家庭有了取暖用的轻便炉,烧蜂窝煤。冬天常见的谈天也被男人的喝酒或者看电视取代。

电视把城市生活的光与色唐突地引入了乡村。农民有了钱,大都买电视,结果买来了这么一个怪物,把让自己大吃一惊的陌生的东西一下子带到了面前。

农民对电视中城市男女的大胆爱情自然地表示了某种理解和容忍,好像城里就应该是一片淫乱,不如此就与想象中的

城市不符。农民对城市人最不接受的就是跳舞,称为“拧屁股调腰”,特为之羞。好像农村对性的实质性行为是理解的,而对于性的展现则是抗拒或抵制的。

乡村学校常常有一些草包教师把持,既令人发指又令人失笑地误人子弟。一老师将“蜘蛛”读成了“蛛蛛”,“蛛蛛”乃本地土语;一学生的起来纠正,该老师大怒,摔书本,不再讲课:“谁要是会谁来讲!”如同所有无能有权的人发怒一样。结果该老师担任哪个班的课,就遭到哪班学生家长的一致抵制,只好赋闲。而且学生中有调皮者,把该老师家的树削掉皮,露出白干,用钢笔写上“小安(该老师小名)吃屁”之类的孩子骂人语。小安就追查,让每个学生写两句话,一句含“小”字,一句含“安”字,想过过公安局对笔迹破案的瘾。无奈侦察能力有限,终于没有查出,成为笑柄。

还有一小学校长深为学生所恶,有学生在校厕所砖墙上用刀刻下“这是校长的食堂”,校长从此不在此解手。

学童的反抗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无能无学的老师使学生调皮起来,这在河南乡下称为“不压台”或“压不住台”的老师。乡间舆论有时也很同情受学生欺负的老师,有谚曰“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有时乡民也很头痛于学童的捣乱,又有谚曰“宁和鳖结邻,不和学对门”。

许愿是乡村人向神祈告的一种方式。过去许愿是烧香,许下一口猪或者一身纸糊的衣服,现在许愿也现代化了,多是许电影。神也开始看电影了。一家还愿演电影,邻里街坊都送几挂爆竹来助兴。

“大队干部”现在改为“村干部”，“村”比“大队”听起来顺耳一点。村支书被称为村里的“老灶爷”，大事小事都得经他的手。大到为人家点划“庄户地”即宅基地，小到家里兄弟因养活老人问题打架，都得找到门上。

村里现在土地分开了，生产上的事不用村里操心，两件最大的事就是宅基地和计划生育。宅基地有好有坏，划好划坏依人家的地位、势力、与支书村长和村干部的关系、送礼的多少定，但人道主义的是不管你多“没成色”，总会划给你一块地，否则家族势力和村里舆论就会出来干涉，认为做得“太过”、“太绝”。

计划生育是一件最让人棘手的事。现在规定不许生第二胎，但一般的变通措施是默许你生一个男孩。如果你先生一个女孩，二胎、三胎仍然是女孩，甚至会允许你生第四胎。一生男孩，就得马上结扎。村干部考虑自己终究得在这村里扎根，官不能当一辈子，而不让谁生男孩就和谁结下了深仇。所以计划生育问题是上下心照不宣，下对上连唬带骗。人口一直上升不降。更有不少乡村干部将对超生者的罚款当成财政的重要来源，对超生纵而养之。

计划生育使乡村中性问题的神秘性得到了部分消解。“上环”刚刚流行时曾是一个很猥亵的词，现在已变得普通又普通了。“结扎”、“怀孕”、“大小月份”、“流产”、“引产”都上了文件，成为干部口中的公文语言，念这样的文件、谈起这样的话题不再有人窃窃私语、掩面而笑或者神情不自然了。政治使性变得枯燥起来，把性行为机械化了。

黄河对住在河滩里的农民究竟有多少影响？我发现心理影响极小。家乡的农民基本上没有多少河文化意识。对捕鱼很陌生，只有一种笨拙的捕鱼方法较为常见，即“戽鱼”，发现哪个小沟中有鱼就几个人联合用抽水机将水抽干或用脸盆把水戽干，然后再捉起鱼。即使这样的捕捉也不常常遇见，因为这样的机会毕竟不多。至于使用鱼网如流网、撒网捕鱼，更是一些不务正业的乡村二流子偶一为之的勾当，多是用来消遣。

很少有船，也很少有船的概念。耕种上也很少动黄河的脑筋。

黄河除了每隔几年的“塌河”（即塌方）和发大水之外，几乎对家乡人的生活未发生什么触动。人们好像对眼前偌大的一条河视而不见，从来没主动想过这条河的事情，没有打过这条河的主意。乡亲们大多没有去过河对岸，没有沿河上下去看一看。没有关于河的传说、故事和歌谣。那点与河仅有的联系方式也是受到河水侵犯之后被动而本能的反应。黄河对于家乡来说是一个不祥的过路客。家乡人不了解它，不亲近它，对它只是敬而远之。

这也许可折射出河南人的一点心理状态。理解了这一点也许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郑州人身处交通中心而内心那么封闭保守。河南人从来就拒绝环境的积极影响。

“光棍”是一个多义的河南词。一义为没有老婆的汉子，一义为谁也惹不起的人。大概这两义之中有某些相通之处：没有老婆和家口的人无所顾忌，谁也惹不起，故有此引申。

家乡每个村都有几个光棍。这些光棍的兴起大抵有两

种：一是当过村干部，二是能打架，是个恶人。前者是政治背景造成的，或者家中有在外当官的，或者因为会“混”，在上上下下都有很“铁”的关系网，所以能当村干部。越当干部关系越多，关系越多越当干部。这是比较高级的光棍。后一种光棍是从小就调皮捣蛋，无恶不作，不愿拚命的人谁也惹不起，自然就成为说话办事都十分霸道的人。这两种光棍往往互相勾结，一文一武，联为一气，很像是官和匪的关系。官和匪往往有勾连。

光棍们往往把持着村里的政治、经济命脉。现在光棍们大都做生意，或跑运输，或开饭馆，不一而足。邻近几村的光棍互相结拜，把持一方，使乡里的干部也不得不让避三分，仰仗三分。光棍往往与派出所、工商所、税务所、银行、公路管理这些基层的国家职能机构联结很深，成为互相照应的酒肉朋友。往往又有拐弯的关系与更大的单位有牵连。所以可以安心在一方呼风唤雨了。

大概古时候乡村的恶霸就是这么产生的。光棍大部分与乡亲们还能和睦相处，叫做“顾外场”，做事太露骨的是少数。由于大家的主动退让和容忍，与光棍们直接发生利害冲突的毕竟不多。

光棍们现在大有洋化的趋势。由于外出较多，兼做生意，思想较在家老实种地的农民毕竟开化得多。现在他们动则汽车、摩托，穿则西装革履，气度自是不凡。但终归他们是乡村不合理状况培养的畸形儿，且社会限制又使他们很难往积极方面发展。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现行体制的寄生者，带有很大的封建性与破坏性。和那种靠自由地开大工厂或办实业而富甲一方、势倾乡里的外国小镇上的大户人家不同。

每个村子里总有几个在城市工作的人，村子里叫做“在外面跑”或“在外面混”的人。农民子弟离家到城里工作，无非有两种方式，一是从部队转业，一是念大学。还有很少一部分是接父亲的班到工厂做工人的。

乡里人对在外工作的这部分人既保持着几分尊敬，又保持着几分警惕。对他们回乡以后的一举一动极为敏感，自尊心此时也变得强起来了。如果他们回乡后见人先打招呼，按乡亲辈份叫叔喊爷，过年时到长辈家登门拜年，那就受到好评。如果稍有优越感，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纷纷议论的对象。有许多嘲笑工作人回乡后表现得与众不同的笑话。

说有一个姑娘，离乡去焦作工作。回家拜年，爷爷问：“妞，啥时候回来了？”姑娘撇起了“洋腔”（把外来的话称为“洋腔”）说：“昨夜晚上。”爷爷勃然大怒：“你咋不坐你爹的碗上！”这个笑话风行一时。也许姑娘确实有意“显摆”，并且洋腔也撇得半生不熟，但乡里对这件小事的反应却过份强烈了。

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小伙子去当兵，才走了半年多，回来后就故意摆摆架子。和爹去出蒜，指着蒜问：“爸爸，这是什么瓜果？”故事说爸爸“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提起一颗蒜当头砸去：“妈那×，你说这是什么瓜果！”关于这故事还有一个版本，说不是问蒜，而是指着楝树上的楝子，问什么瓜果。可见这件事本身未必实有，而乡亲们对这种事的深恶痛绝则是千真万确的。

乡亲们对自己村子出去的工作人总有一种过高的期待。认为他不当大官就不稀罕。他们好像忽略了外面还有许多普通市民的事实，认为在外面当个大官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因而

总是迫不及待地打听工作人的“职务”。

对于从外面来到本地的统治者，乡民们是越陌生越崇拜；对于从本地出去到外面的人，则是只有亲近才接受。“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包含着一种不容背叛的亲近和占有观念。

嘲讽总是无情的。而且被嘲讽的对象一旦确定，常常终身不移。敝乡一所中学的校长胡福民即是一例。村中和邻村的人都知道胡福民的小名叫留定。叫“胡福民”挺像那么回事，但一说“不就是留定嘛”立刻就显得不那么体面了。此人三代贫农，靠热爱党参加了工作，并成了党员。没有什么文化，水平欠佳，常常拍着胸脯自诩：“我是凭党员吃饭的！”

五七年反右时，因揭发右派有功而提拔为中学校长，从此更加洋洋得意。五八大炼钢铁，领着全校师生烧土高炉。饭前，他在大喇叭中为大家鼓劲：“快点干吧！再有半个小时就开饭了！”过了一会，又在大喇叭中喊：“加劲干吧！离吃饭只剩下50分钟了！”就是这种水平。

因为从小挨饿，所以他对吃饭看得特别重要，不自觉地吧吃饭当作鞭策手段。后来，在某校当校长，看见学校食堂泔水扔掉很可惜，就每星期用一个大桶带回家一桶泔水。附近的几个教师总看见他带一个大桶回家，私下议论：“胡留定带的是什么？”大家猜测不一。一个深知胡为人处事的人阴险地一笑：“我知道是什么。准是泔水。不信你们上去问。”当留定用自行车带着大桶匆匆赶来时，几个人一涌而上，强行打开桶盖检查，果然是泔水。“胡校长贪污泔水”遂成为全县教育界的“美谈”和笑料。

更有嘲讽他没出息和小气的故事。说他家里盖房，去请

人帮忙，先抽出一支烟，再问人去不去帮忙；如果人答应去帮忙，就敬人一支烟；如果人家去不了，就再把烟装回盒子里。

说他听党的话已成为不可更易的习惯。他娘死了，他去找村党支部书记，问准不准哭。村支书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看着他，回答说：“你娘死了，你就是笑也没人管你。”

每逢批判，他总是上台扯嗓子挥拳头，跳得很高。本来他可以跳得更高，但终于受到了自身条件的限制：他是个瘸子。他的外号叫胡瘸子。

乡村自有闻问国政的老头、老太太。闲天时候，常常围在一起，一本正经地讨论谁谁应了哪颗星星云云。

枪是河南农民并不陌生的东西。河南过去土匪多。穷的地方土匪都多。财主家都以几十石粮食换一杆“快枪”——快枪就是半自动步枪。人还以“长枪”、“短枪”来称呼“步枪”、“手枪”。当地老百姓最崇拜盒子枪。“腰里挂着盒子炮”是描绘一个人凶狠或有权势的典型语言。

共产党执政以后，几十年间“洋枪”在民间绝迹，剩下的只有土猎枪。土猎枪被用来打兔、打雁。村子里有一个人叫金保，解放前是一个黑枪手，专受雇代人杀人，与西方社会的职业杀手庶几相类。解放时镇反，他痛哭流涕地认罪逃得性命。枪被收缴，人也老实了很长时候。但过了一段终于技痒，想再操起枪。那时的社会下不可能再当杀手，所以就当起了猎人，以杀动物聊替杀人。他常常身背一个很脏的帆布挎袋，肩扛着一杆自制的霰弹猎枪在河滩、坟地转悠，打兔、打獾。此人眼睛总眯缝着，耳有点聋，但枪法极好。因为打猎，常常在家

中挂着野味，村子里谁被火烫着了，就到他家去讨点獾油，人们坚信獾油性极凉。但有时他打着谁家房上住的鸽子了，谁家的女主人就会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他，“心黑”、“弄种”等等不一而足。人们还传说他黑夜外出打猎，曾在月明中下看见一只老狐狸在拜月。金保一枪打过，老狐狸一溜火星飞快隐去了。从此这只老狐狸和金保结下了仇气。老狐狸已修炼成精，道行很深，要报复金保。有一次金保在河滩打猎，一扣板机，枪“笑”了，也就是枪膛炸开了。乡间把枪膛炸开呼为“枪笑”，一个“笑”就好不让人毛骨悚然。但金保居然没有伤着——看来金保道行也不浅。这件事是真是假，我从来没有当面问过金保，但越不问，越觉得有些神秘，每次碰见金保都不自觉地多看两眼。金保平时除了见面打打招呼，从不和人多说话，在村子里对小孩们来说他是惟一的一陌生人。村子那时候才 200 多口人。听说这几年金保似乎又活跃起来了。在苹果园守园，夏天凉棚下他向年轻人吹嘘他从前怎么杀人，“像咱庄上谁谁，要搁是早先，早就毁了他了。”有一次他居然扬言要干掉村长。村长的儿子登门拜访：“金保叔，我来问问你啥时候杀俺爹？”金保的回答也爽快：“等我想杀的时候。”

现在各村的小青年开始置买机制猎枪了。汽枪只能打鸟，已经不过瘾了。猎枪又变出了许多花样，有双筒枪，有转轮枪。猎枪多产自东北，百米以内能打死人。人也是动物，可猎。

炸药在民间也很普遍。那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乡下二流子总爱用炸药炸鱼。自制的炸药，从厕所中刮下茅池边上的白硝，用三种原料配方，然后放在锅里炒。没有

比在锅里炒炸药更危险的炊事了。有一家炒炸药，锅太热了，忽然炸药在锅里“轰”地一直炸开了，火苗一直窜到屋梁上。

用炸药炸鱼是一种最缺德的捕鱼方法，但最好看，最刺激。把雷管扔到水里，听着一声巨响炸开，看水里掀起冲天的水柱，过一会儿鱼就一条条白肚朝上浮了上来。村子里有个叫二孩的电工已经 50 多岁了，酷爱炸药，不幸在一次炸鱼时把一条胳膊炸飞了，至今还垂着空空的衣袖。但仍不戒炸药，尽管不再炸鱼了，却在家里开了一个作坊，专制造鞭炮。看来人们爱一样就是爱一样，本性难移。今年过节，他还打发孩子给我家里送来了一对巨大的红色炮仗，大得看起来瘆人，点燃后像铙一样响，声沉而闷。

1990年1月29日：敝乡风(下)

258

针炙在乡下称为扎针。我家乡最初没有正式医生，附近只有一个叫胡老标的人会扎火针。扎火针治病真如受烙刑：老标先把针在火上烧热甚至烧得半红，然后朝他自己认定的地方一下子扎过去，鬼知道是不是穴位。倒是常常有扎火针扎好的，但我更相信那是把人吓好的：先大吃一惊，出一身冷汗，发汗清热解表，有个头疼脑热不信你就不好。

后来扎针文明起来了，用的是放在药棉中的银针。扎针总说是特别治“邪病”。“邪病”即是有鬼或仙作祟的病。传说扎针的人常常伤着仙鬼，所以往往没有好下场，不是自己暴死，就是生个傻儿子。查附近一生扎针治病的土医生，果然如此，也真是怪了。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说有一个扎针的先生，半夜有人拍门来请，一顶小轿放在门口。先生迷迷糊糊上了轿，轻便小

轿一溜烟地抬到一座青堂瓦舍之前，进门后见青砖铺地，一张八仙桌，桌侧的椅子上端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见先生到，老头朗声问：“×先生，你知道这次把你请来的是谁吗？”先生一看大势不好，夺路想逃，却见出路早被人守死。只得镇静下来，强装不解。白胡子老头告诉他自己是仙家，住何处何处，几年来有多少家口被这扎针先生毁掉，今天是算帐来了。先生说：“我明知这一次是必死无疑了，伤了你们的人，冤仇相报，我也没有什么懊怨。我只要求死前能让我喝一碗水，我现在渴得厉害。”死前的要求总是无法拒绝的，白胡子让家人立即端来了一碗凉水。先生双手捧碗，喝一口，然后向前那么一喷，脚向下一跺，青砖瓦舍顿时烟消。趁月明一看，先生才发现自己骑在一棵大杨树的树杈上。盖喷水跺脚是乡下相传的破邪法术。

这种扎针先生与仙鬼你死我活的故事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则是和平相处或好说好商量。说有一个扎针先生夜黑时分应邀去给一家人扎针，路过麦田间的小夹道。老远就看见前面卧着一只大狗，两眼瞪得像发光的银球一样，目不转睛地瞅着他，身体横在那里挡住了道路。扎针先生心里一激灵，但还是跨过那条狗继续朝前走。可走了半里多路，远远看见那条狗还是那样卧在前面的路上。扎针先生硬着头皮来到病人家，病人病状稀罕，表情古怪，刹那间先生无意中看到了病人那双眼，闪闪发光如同路上那只狗一模一样。扎针先生于是收起了针，开始祷告，劝告来作祟的那只狗精，不可因仇报冤，冤冤相报无了时，不若请病家多烧纸钱，多供香火，以善心息仇隙，皆大欢喜。随后又指点病家如何供奉狗仙。病家叠纸元宝，糊纸衣服，扎纸房子，在某月某日子夜村头十字路口焚

化,与狗仙求和修好,之后病果然霍愈。狗仙后来又托梦给扎针先生,感谢他从中调停的好意,并告诉他与病家结仇的前缘后果,保证此事从此了结,还告诉说自己就要搬家到远处去了,请先生往后多保重。

扎针总扎一些怪病,如眼斜、嘴歪等。村人有谚:“嘴歪眼斜心不正”,谓得此病者多不是好人。

乡村社会中神秘气氛很浓重。早年文化大革命时,庙被砸,下神的人被斗,信神的人受批判,不许烧香磕头等。整天价满街贴红色标语,游行喊革命口号,街头的大喇叭天天播放样板戏。一时喧闹之下好像乡村的鬼气被赶跑了似的,果然是朗朗世界,荡荡乾坤,抬头看见日头,伸手见得五指,神仙都离得远去了;大队支书的话显得那样真实和现实,说斗谁就斗谁,说扣谁的口粮就扣谁的口粮。近年来,神秘气氛又恢复了,尤其是深夜。月照当头似乎是隐含着某种不测,一只黑狗悄没声地从你眼前走过也使你疑神疑鬼,鸡窝里的公鸡不期然地夜啼一声,会使你想到会不会有某种不祥。

乡村的老秀才们常常在一起闲扯议论国事。从朱洪武坐南京到老包下陈州,讲凡是大人物的“犯星星”,都是天上的一颗星。凡是“星星”都有神人保佑。说蒋介石在峨眉山时,碰到了一个老道。老道送给蒋介石8个字,叫“胜不离川,败不离湾”。抗战胜利后,蒋却还都南京,“胜而离川”,故败。说大陆失败后蒋又去峨眉山求教老道,老道闭门不见,托词方外之人不问红尘中事,其实是心衔蒋介石不遵所嘱。蒋到台湾后,则依其所嘱,不离开台湾,虽败终吉。故事是这么说的,听者

也就这么一听。其实所谓“败不离湾”倒是不劳老道吩咐，蒋先生就是想离湾也离不开，因为他无处可去。

据乡人说推背图上有许多话应照世事。如推至 20 世纪 40 年代，有“口上口，天上天，这个局势要扭转”的诀词。一般人认为“口上口”是“吕”字，其实不是。“口上口”乃是“日”，“天上天”乃是“美”，日本走，美国来，但最终共产党控制大陆，“局势扭转”。还有人用推背图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说是有一幅图，一只狸追一只猫，猫不得已爬上了树才得安全。“猫”者“毛”也，“狸”河南话读作“Liu”，“刘”也。树则是指“林”。毛本来受到刘的威胁，得林才能以保全。华国锋与叶、邓同时执政时，乡村就有人断言：“瓶里插花不久长”，不久华果然下台。毛与江的夫妻关系，人用“猫不吃姜”的谐音比喻来推断毛、江终将不和或终要相克。

人事繁杂，大千世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各执己见，各信其理。乡村社会对高层政治的关注和研究显得既离奇又似乎自圆其说。不过，我也看过推背图，上面好像并没有乡人所传的诀和图。

看宅院的阴阳先生如今都是业余的了。郑州市有一人，先办了一个经济开发公司，后到司法局任职，都是现代性的职业。但其人却会看阴阳。说其家祖祖辈辈精通此道，数其远祖“爷爷的爷爷”曾是清光绪皇帝的宫廷医生。相面，看宅，点坟等事说起来都头头是道。

光是看宅就有许多讲究。说一村若是东西向，则西南角旺；是南北向，则东北角旺。村东是文气所在，村学应设在村东。凡村东设学的，学校就会人才济济；凡村西设学的，学校

就会一塌糊涂。东是“文仓”。还讲究“阴阳形势”，一进村，先看有几条街，几眼井，几个大坑，知道了这些也就掌握了阴阳形势。村西北角是绝地，凡是哑、病、疯、夭折之事往往出在西北。留院门要“顺形走”而不能“背形走”，应自然地在前面留门，不能留一个拐弯门，走起来别扭，又逆阴阳之理。

河南乡下把几种职业看得很低贱：理发、唱戏、割脚、吹响器（指红白事的乐器班子）。这些职务是服务性行业，直接的服务性行业。商店营业员虽然也是服务性职业，但卖的是东西，不是买艺。农民的等级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种地人在农村被称为“老实人”或“下力人”，在农民看来虽然苦，但无损人格。农民最崇尚的就是官，虽然他们最恨的也是官。他们欢迎好官，恨坏官，但他们见到坏官则更加毕恭毕敬。他们也崇尚学问，尤其崇尚医术很深的大夫和会看阴阳的先生。总之他们重视的是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人。别的学问他们也不懂。

谁从事过下九流的职业，谁就一辈子成为贱民。儿子婚事，女儿出嫁，一打听对方父亲是吹响器或者理发的就退婚不送。村子里有人原是县某局局长，后来下台后其子与邻村某理发匠的女儿结婚，全村人都指指戳戳地看笑话，人心大快。盖此局长从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现在与理发匠成了亲家，村子人谓之“说嘴跌嘴”。

理发匠不务农事，所以性格性情较整日埋头田事的老实农民要开化一些、轻浮一些。理发匠、响器班走东乡串西乡，见多识广，心眼活泛，人物也显得干净、俊俏一些。到哪个村，每每勾搭这村子里的姑娘。小时候记得有一个理发匠小胡，

小巧、白净，穿着一件总洗得很干净的土色夹克式外套，说话文雅，这在乡村姑娘眼中已经是很夺目的如意郎君了。只是因为他从事的职业低贱，谁家的父母都不许自家的姑娘寻上他。但终于李滔庄有一个姑娘和他私奔了，一时在东西几村盛传。也有些理发匠自暴自弃、破罐破摔，衣衫不整、目光呆滞。马庄的老剃头匠叫刘金，目光迟钝得有点凶狠，拿起剃刀向头而来，真像是要取你的首级。所以方圆几村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刘金剃头——死一式”，意谓其动作呆板。

井历来是乡村人最看重的物事。常常一村有一眼井，或者村西一眼、村东一眼。井水清而甜是一方人生活和顺、人性善良的象征。甜甜的井水永远是一村人的骄傲。村中的废井是一个村庄古老历史的标志。“这眼井是你爷爷那一辈上挖的”，一下子这个村庄就显得很有古气。我村村后的废井中井壁半坍，长满了星星草，使每个路过村子的人都觉得有几分惆怅。

井有最简陋的，就是赤裸裸的一眼井放在那里，挑水的人用一根长长的粗麻绳把桶送下去，很艺术地摆动几下，马上就桶满了，沉甸甸地提上来。

还有一种辘轳井，上面架着辘轳，用绳头将桶的提手煞紧，呼地一下坠下去，然后再慢慢地绞上来。我小时候上姥姥家总是路过一个村庄，叫胡庄，胡庄的当街就有一眼这样的辘轳井。往后走遍中国，一看见辘轳井就想起那个种满石榴树的小胡庄。

还有一种井架式扎得极大，用一根大吊车一样的长而粗的木杆架在井旁，长杆可以转动，杆的一头会正转到井上方。

用这样的井打水很像做一种大幅度的体育运动。先把桶绑到杆头上,再跑到长杆的另一头,像转机关枪一样把桶转到井口上,然后松手,松松握住穿在杆头的一根长索,看着长杆在桶的压力下向井的一头倾斜,桶就到了井里。等水桶一满,再用力拉索,使长杆系桶的一头翘上来,水桶就自然吊出来了。这种打水运动煞是壮观,非妇女儿童所能及,身小力薄的人望而却步。但这种吊井也许就是村子里最吸引孩子们的设施了。即使我小时候这种吊井也少见,哪村有这样的吊井哪村就被孩子们称为“吊井庄”。

较先进的吃水井要算是车水井了。上面安着一架水车,一推就可以把水推上来,眼看着薄薄的水流急促地流过水斗,打着流涡,在太阳的照射下透出一种金黄色的水亮。当然机井是机械化的了,可以安抽水机;但机井多打在田间,离村子远,完全是大田作业的工具,已不像村子里的井那样有诗意和风情了。每天早上,勤快的男人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挑水,挑着满满的两桶水还抄着手轻松地走路,扁担在肩上忽忽悠悠,碰见人还随口打着招呼。女人们挑水则要沉重得多,一手搭在肩头的扁担上,一手急促而大幅度地摆动,脚步一溜风地向前走。每天早上,点点滴滴的水迹自井旁东西南北地通向家家户户。

现在各家各户都能自己打一眼小压井了,就在自家的庭院中,要吃水时往井里灌点引水,几下就能压出清冽的新水了。总吃新水的人们是幸福的。